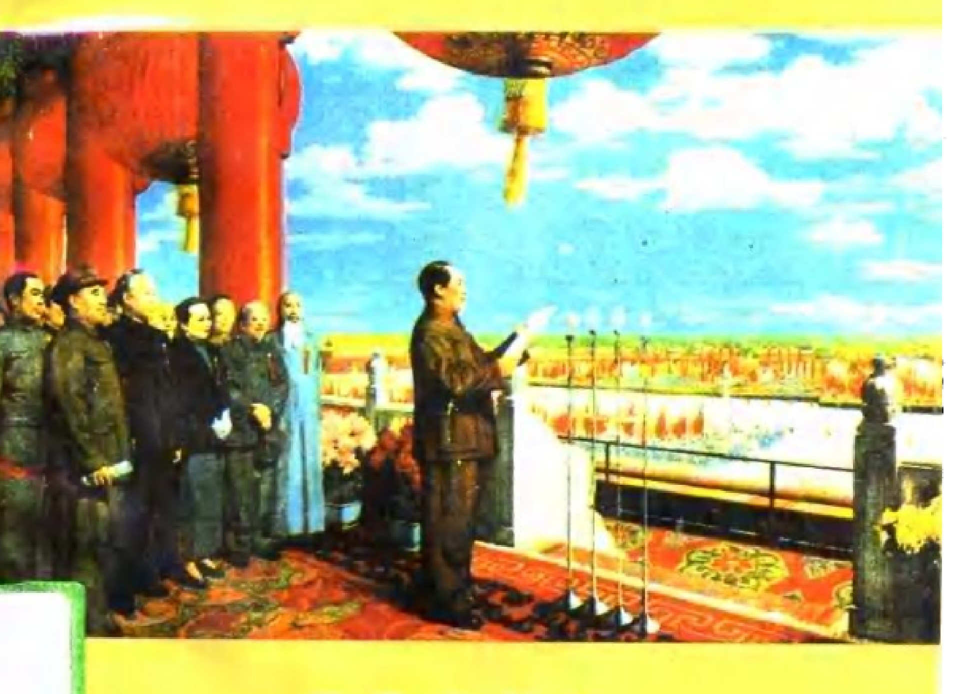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史

基本问题



中国现代史基本问题

主　编　张思恩

副主编　阎惜民　王燕梅
　　　　张　媛　李　岩

三 秦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第 006 号

中国现代史基本问题
张思恩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莲湖区友谊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1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46—571—1/K・182
定价:5.00 元

说　明

《中国古代史基本问题》、《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自出版以来，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许多高校文科学生、电视师院、脱产或函授学员热情反映，以上两书的内容和体例，对帮助学习很有助益，殷切期望继续完成《中国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编著出版工作。在师友们的热情关怀支持下，《中国现代史基本问题》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中国现代史基本问题》约20多万字，全书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与国民革命、国共两个政权两条道路的对峙与斗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五个部分。各部分又分为：一、概述。叙述本部分历史的基本线索，提出学习重点。二、基本问题解答。对中国现代史中基本的、有代表性的重要名词和问题，作系统的、简明扼要的回答，帮助读者掌握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培养综合分析能力。三、学术研究中一些争议问题简介，综合近年来中外学者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新资料、新成果，以便读者了解学术信息，扩大知识领域，开拓思路，掌握进一步钻研的线索。同时，本书编写中，又注意与新出版的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呼应配合。全书纲目分明，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实用性强。适用于高等院校文科、师专、教育学院、党校有关专业学习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

史时使用，也可作为电大、电视师院函授、成人高教自学考试和中学政史教师的学习参考书。

本书由张思恩主编，阎helpers民、王燕梅、张媛、李岩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单位和人员（以单位笔画为序）有：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华强；中国人民武警专科学校马全印；西北电业职工大学周可能；汉中师范学院强志华、韩新路、蔡云辉；汉中市委党校张茹芬；西安公路学院何海峰；西安医科大学孙宝玉；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张天社；河北唐山师专杨耀柜；西安教育学院叶世南、朱立；河南教育学院张媛、康之国；青海师范大学王燕梅、石志新、纪宁、赵晓燕；延安大学马广荣；陕西中医学院阎helpers民、杜义朝；陕西师范大学赵晓林；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薄济源；陕西教育学院张思恩、李岩、李建国；咸阳师专黄振平。

本书编写中，陕西教育学院和参编院校领导，给予热情关怀和支持，三秦出版社总编辑杨健禧先生、文史编辑部主任李郁先生，对本书编写和出版给予热情指导，对书稿提出了宝贵建议，西安友谊印刷厂领导、职工，为本书印刷多费辛苦，我们谨对以上关怀支持本书的领导和有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时间仓促，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祈各界师友们批评指正。

编者

1994年6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国民革命

第二部分　国共两个政权两条道路的对峙与斗争

第三部分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四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五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一部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国民革命

概　述

本部分可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1919年5月到1923年底)和国民革命时期(1924年1月到1927年7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但它的爆发是有其背景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尤其是皖系军阀的统治,对外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权益,对内进行军阀独裁统治,大肆扩充自己的军队,进行军阀混战,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为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要求进步,追求解放的热潮,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人民增强了要摆脱被压迫的

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的勇气和信心，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积极分子和进步刊物不断出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以及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论争，通过论争，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以他们为桥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正是在这种基础上，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二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23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随着帝国主义之间在华矛盾的加剧，各派军阀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接连爆发了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北京政权落到直系军阀手中，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幻想通过改治上的改良，谋求中国的出路，于是各种政治改良思潮纷纷出现，如好人政府、联省自治、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结果没有一个取得实际效果，这再次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 1922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

了工人运动，如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及京汉铁路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1920 年 11 月，孙中山又在广州揭开第二次护法运动。由于陈炯明的背叛，1922 年护法运动再度失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并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大"、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及 1923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制定了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决定在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国民革命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至 1926 年 6 月北伐出师前夕。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大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国民革命高潮的开始。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样，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联盟。"一大"后，工农运动、爱国反帝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很快兴起。1924 年 7 月爆发的广州沙面租界工人罢工，是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涨的起点，五卅运动的爆发则表明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经过武装斗争，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与统一，为北伐战争打下基础。此时，北洋军阀各派势力继续发生分化和演变，1924 年爆发了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直系冯玉祥倾向革命。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吴佩孚败后逃到汉口，纠集反动力量，东山再起。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自成一个体系。最后形成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势力统治中国，分割各主要省区的局面。但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加剧，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逐步激化。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正是这种斗争的主要表现。国民革命在胜利发展中潜伏着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共产党人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探讨，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

第二阶段：从 1926 年 7 月北伐出师至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6 年 7 月，国共两党联合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以西、中、东三路出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在共产党员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下，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有力配合和支援下，在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取得胜利，占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南京市，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广到长江流域，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反帝运动、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全国处在人民大革命的高潮之中。尤其是 1927 年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及上海工人阶级的三次武装起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工农运动的大发展，是北伐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这时，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破坏。它们在采用武力镇压的同时，又采用软的手段，分化瓦解革命统一战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很快投入帝国主义和中

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国民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失败，出现宁汉对立的局面。

第三阶段：从“四·一二”政变至“七·一五”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地区一时掀起轰轰烈烈讨蒋运动，工农运动继续高涨。1927年6月取得第二期北伐胜利。由于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使武汉和两湖地区的革命危机也在日益加深。从5月中旬开始，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事件接连发生：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和朱培德的“遣共”事件，使工农运动遭到极大摧残。由于帝国主义和武汉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压迫，武汉政府中号称“左派领袖”的汪精卫等人逐渐右转，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和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由于共产党忽视对军队的掌握，当昔日的同盟者叛变革命之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最后失败。

基本问题解答

重要名词：

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和会（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参加者有英、法、美、日、意等27个战胜国，中国亦参加了和会。会议完全被英、法、美三国操纵，通过《国联盟约》，并签订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主要内容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如何瓜分德国的海外殖

民地。和约无视中国主权，竟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交给日本，中国人民因此而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会议还秘密拟定了武装干涉苏俄，瓜分苏俄领土的计划。这次会议实际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世界的分赃会议。

五四运动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 1 月，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对讨论战败国的处置问题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力等要求，遭到了与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而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 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5 月 4 日，北京 3000 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示威学生火烧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了 32 名学生。次日，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并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领导斗争。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的学生和留日、留法学生以及一些华侨也纷纷游行，声援北京学生。6 月 3 日、4 日，北京军阀政府又逮捕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各界人民强烈愤慨。5 日，上海工人首先罢工声援北京学生，商人亦进行罢市，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向上海，并迅速扩展到全国 20 多个省，150 多个城市，使五四运动发展成为有广大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运动。6日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主编。初名《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从1920年9月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1925年4月起改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停刊。

《每周评论》 五四时期著名刊物。1918年12月22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刊于北京，周刊。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发表反映当时现实问题的政治文章，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是五四时期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一个指导性刊物。第26期(1919年6月15日)起由胡适主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受到李大钊等批驳。共出37期。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军阀政府封闭。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为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而赴法国进行的半工半读活动。辛亥革命后，蔡

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为“兴勤俭乐学之风，”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于 1912 年相继在北京、四川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1915 年蔡元培等又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到五四运动前，收效甚微，先后仅有近 200 人赴法留学。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已成为中国青年的迫切愿望，李大钊、毛泽东等积极组织与促进这一活动，很多青年赴法留学。自“五四”到 1920 年底，各地青年先后有 20 批约 1600 余人赴法留学，以四川、湖南去的最多。留学期间，很多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技术，造就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他们回国后，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祖国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时期中国著名的社团。1918 年 6 月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筹备，1919 年 7 月 1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总会初设在北京，1924 年迁至南京。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主要活动为出版刊物、讲演、学术讨论等。出版会刊《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会员 120 余人，成分复杂，会员有着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1925 年因内部发生分裂而停止活动。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社团。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一个进步学生团体。1919 年 3 月，北大学生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开始在街头、寺庙作不定期讲演，以后则利用官立的讲演所并在北大校

旁设点定期讲演。讲演内容有反日爱国、民主自治、反对封建家族制度、破除迷信等。1920年4月开始深入到工厂农村，普及平民教育。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演变为其外围机关，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打下了初步基础。

新民学会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五四时期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1918年4月在湖南长沙成立。初有会员20余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定其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讨论时事，研究俄国革命，寻求改造中国之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和领导了湖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以及湖南自治运动，并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1918年夏开始组织部分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到1920年下半年会员达70余人。此后，许多会员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学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湘江评论》 五四时期著名期刊。1919年7月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在长沙创办，周刊。毛泽东主编。每期四开四版，以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束缚，寻求真理为宗旨。主要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统治，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曾在该刊上发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共出版5期，第5期未及发行，于1919年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

觉悟社 五四时期的重要社团。1919年9月由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等创办于天津。以“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得“自觉”、“自决”为宗旨。主要活动是组织讲演、出版《觉悟》杂志，研究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曾邀请李大钊到天津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后因形势变化，主要成员赴法勤工俭学，于

1920年11月停止活动。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一个理论性刊物。1920年11月创刊，月刊。李达主编。主要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大量介绍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以及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和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中国第一次树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1921年7月停刊。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1922年秋在巴黎成立。负责人为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下设旅法、旅德、旅比3个支部。出版《赤光》半月刊。主要是在旅欧留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如朱德、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1924年后因主要负责人陆续回国，逐渐停止活动。

华盛顿会议 又称"太平洋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召开，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参加者有美、英、日、法、意、葡、比、荷、中九国。会议表面上是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实际是帝国主义各国根据战后力量对比，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一次再分割。会议签订了《四国公约》、《五国海军协定》和《九国公约》等协约。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九国公约》宣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实际出发点是要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的殖民地，变中国由日本一国独占状态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向导》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周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任主编。全国各大城市设分销处，公开发行。以系统地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党的政策为主要内容，报导各地工农运动的情况并对国民党右派活动进行尖锐的批判，阐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927年7月停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1922年总部迁到北京，在上海、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有分部。张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主要任务是在各地建立工会组织，举办工人业余学校和出版校刊，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领导和发展工人运动。1922年5月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撤销。曾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工人周刊》。

香港海员罢工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罢工斗争之一。1922年1月，香港海员由于资本家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等要求，在中华海员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先后参加罢工的海员达两万多人。港英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并玩弄"调停""谈判"的骗局破坏罢工，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反抗。3月初，发展成为有十多万人参加的香港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回广州。3月4日，当步行回省的工人队伍行到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制造了死6人，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后，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使香港成为"臭港"和"死港。"在全国工人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下，罢工斗争坚

持了 56 天，迫使港英当局取消了封闭工会的命令，答应增加工资 15%到 30%，罢工斗争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罢工斗争之一。1922 年 5 月，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的领导下，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1922 年秋，路矿当局拒发拖欠工资，并阴谋解散工人俱乐部，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刘少奇去安源，与李立三、蒋先云等共同领导工人斗争。9 月 14 日，发动 1 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调来大批军队企图镇压，由于工人组织严密，斗争英勇，并注意斗争策略，迫使路矿当局于 9 月 18 日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达成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十三项协议，罢工取得了胜利。

二七大罢工 又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罢工斗争之一。1921 年以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各站陆续成立了工会。1923 年 2 月 1 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于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阻挠破坏，总工会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制军阀武力压迫，并移到汉口江岸办公。2 月 4 日，在总工会统一领导下，京汉路全线 3 万多工人实行总罢工，3 个小时内，长达 1000 多公里的京汉路陷入瘫痪。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号召工人们为反抗军阀，争回人权为自由而战。2 月 7 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死 50 余人，伤数百人，40 多人被捕，1000 多人被开除

的“二七惨案。”共产党员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惨遭杀害，罢工斗争坚持到2月9日结束。此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这次斗争的事实也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强大敌人的。只有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才有取胜的可能。

西湖会议 1922年8月，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及翻译张太雷等7人出席。马 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与会大多数人起初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表示怀疑。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党内合作的决定。会后，李大钊最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进程。

《孙文越飞宣言》 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关于中国革命和中苏关系的联合声明。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俄为师才能取得胜利。1922年8月，苏俄政府派特使越飞到中国与孙中山交换有关中国革命和中苏关系的意见。次年1月26日，双方在上海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声明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的真正独立与统一，在实现这一事业的斗争中，中国将得到苏俄人民的真诚援助。《宣言》表明孙中山正式确立了联俄政策，是其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黄埔军校 即“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革命时

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建的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5日开学，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担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萧楚女等担任政治教官。黄埔军校一共办了六期，并设立分校，学员除学习军事外，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开设《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等课程。早期的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丰硕成果，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培养了一批政治和军事骨干力量，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和北代战争的进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完全了控制了军校，并以此培养了一批亲信，形成所谓黄埔系。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教育机构。1924年7月，由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创办。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先后任讲习所所长。教学内容除马列主义理论外，还学习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研究农民问题。至1926年10月共举办六届，共培养农运人才770余名，其中规模最大的第六届由毛泽东主办，学生来自全国19个省区，共300余人。很多人成为农民运动和大革命中的领导骨干，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北京政变　1924年受吴佩孚排挤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南方革命的影响下在北京发动的政变。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正当直奉两军在前方相持，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秘密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11月5日，国民军驱

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下旬，冯玉祥会同奉系军阀张作霖，成立了由皖系段祺瑞为执政的临时政府。北京政变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武装政变，为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的日商纱厂工人先后举行大规模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万余人在南京路游行示威，英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残杀10余人，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立即号召全市人民罢工、罢课、罢市来抗议英帝国主义。31日晚上海总工会成立，6月1日全市三罢实现。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近500个城镇 人民，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或罢工，罢课，罢市来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全国投入声援反帝斗争的群众约达1200万人，这是“五四”后出现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由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威胁利诱，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动摇，单独宣布停止罢市，中国共产党改变斗争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工人于8、9月份相继复工。

省港大罢工 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政治罢工。1925年6月19日，香港10余万工人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继之，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也开始罢工。6月23日，广州10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帝国主义

军队的开枪射击，当场死亡 52 人，伤 170 余人，造成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香港罢工人数激增至 25 万人，并有 13 万人陆续回到广州。省港罢工使香港成为死港，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罢工坚持了 16 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西山会议派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政治派别。1925 年 11 月 23 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林森等 10 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反动议案。之后，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从事反共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斗争下，1926 年 1 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人。

中山舰事件　亦称"三二 0 事件。"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制造的的阴谋事件。1924 年国共合作后，蒋介石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1926 年 3 月 18 日，蒋为排挤共产党人，进一步篡夺军权，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侯用。当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 介石等随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擅入黄埔，共产党阴谋暴动，并以此为借口，不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于 20 日晨擅自宣布戒严，以阴谋叛乱罪名逮捕了李之龙，并派兵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强迫共产党人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不但没有追究蒋的罪责，反而完全满足

了他的要求。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特别是篡夺军权的关键的一步。

整理党务案　国民革命时期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1926年5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幌子,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任职和活动做出种种限制,如: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以上;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发给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方针,提案被通过,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为他后来发动政变打下了基础。

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公使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20余艘群集大沽口进行武力威胁。3月18日,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学生、工人、市民万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队伍行至执政府前广场时,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打死群众47人,伤200余人。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五原誓师　北伐战争期间,冯玉祥部在绥远五原进行的

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的誓师大会。1926 年 7 月，冯玉祥 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整顿，9 月 17 日，从苏联访问归国的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改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会后冯部即进军陕甘，与北伐军南北呼应，参加国民革命。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中国人民第一次收回外国租界的斗争。1927 年 1 月 3 日，武汉各界为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庆祝大会，英国水兵竟用刺刀驱赶群众，刺伤数人，各界群众对此怒不可遏。当晚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领事提出抗议。5 日，武汉 40 万群众在汉口举行反英大示威，并冲入英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收回了英租界。6 日，九江人民集会游行示威，声援汉口人民的正义斗争，也夺回了英租界。2 月 19 日，英国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正式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巨大胜利。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 1926 年 10 月、1927 年 2 月、3 月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足，敌我力量悬殊，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镇压下失败。第三次起义于 1927 年 3 月 21 日发动。事前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另有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组织了拥有 5000 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21 日，80 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经过 30 小时的浴 血奋战，打败了军阀部队，占领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临时市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

利，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1927年北伐胜利进军和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而中国共产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却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辨护，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处于无戒备状态。4月12日，蒋 利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队部。国民党第26军周凤歧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纠察队缴械，纠察队员死百余人，伤200人。13日，上海20万工人举行罢工，数万人集会示威游行，当队伍走到闸北宝山路时，遭国民党军队屠杀，死百余人，伤无数。旋又封闭上海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仅三天内，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著名共产党人汪寿华、赵世炎、陈延年等先后牺牲。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了重大失败。

马日事变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日益动摇。在国民党第35军军阀何键的阴谋策动下，5月21日，长沙驻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突袭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等20多处，杀害共产党员和群众100多人。在此后一个月中，共产党人和军部群众被残杀者达1万多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蒋介石、

汪精卫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流的信号。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和对共产党进行攻击。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冯玉祥、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仅不加强工人武装力量以应付突然事变，反而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等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所发动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廖仲恺(1877—1925) 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广东惠阳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出生于旅美华侨家庭。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19年与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阐发和传播孙中山学说。1921年在广州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22年参加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会谈，竭诚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身任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还曾担任广东省长，中央农民部长。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发展工农运动、统一广东根据地，做出了重

大贡献。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三大政策。1925 年 8 月 20 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彭湃(1896--1929)　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广东海丰人，又名天泉、汉育。1917 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救国活动。1921 年回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并出版《赤心周刊》。1922 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同年 7 月，在海丰县创建全国第一个农会。1923 年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任会长。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第一届和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1925 年，任广东省第一届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后至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同年 10 月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当选 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 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同年 8 月 24 日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30 日在龙华英勇就义。

问　答　题：

1. 试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了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看到了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新希望。开源煤矿工人了解到俄国工人革命后的状况，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孙中山先生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

第二，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是西方国家，效法的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开始由效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效法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第三，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逐渐认识到必须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第四，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在劳动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发表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更多的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

2.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分水岭，它划分了中国民主革命两个不同的时期。五四运动以前是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呢？这是因为：

第一，时代不同了。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宣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业已开始。五四运动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就不能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带有新的时代特点；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第二，革命领导权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五四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运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第三，革命的彻底性不同了。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即具有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这种革命彻底性的不同，表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道路。

综上所述，由于五四运动后所出现的政治上、思想上一系列新变化新特点，即中国民主革命所处的时代不同了，革命领导权不同了，革命彻底性不同了。因此，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

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3. 简述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的情况和结果。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论战。

(1)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919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五四”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这使笃信实用主义，主张改良反对社会革命的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他借杜威来华讲学的声势，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奉劝人们不要高谈主义，而应多研究问题如何解决，其用意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把人们引向改良主义道路。针对胡文，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李大钊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在遭到李大钊驳斥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继续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李大钊撰文《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从根本上批判了胡适的观点。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争论，争论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规律，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张东荪等人利用罗素来华讲演的机会，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章，公开宣扬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即发展资本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挑起争论。次年2月，梁启超也发表文章，对张东荪的观点加以支持和发挥。张、梁等人，表面上研究社会主义，实际上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借口中国产业落后，否认中国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与阶级基础，攻击和诬蔑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反对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张、梁的言论，立即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反驳。李达、李大钊、蔡和森等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张、梁的反动谬论，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取得了胜利。

(3)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在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取得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又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从1919年到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发表了《谈政治》、《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文章，公开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批驳了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把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明确区别开来，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上述三次与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大论战，驳斥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扫除了马克思主义前进中的一些障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

党的创立。

4. 试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演变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从社会经济方面看，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始在中国兴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到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开始创办军事、采矿、炼铁等工业，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中国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中国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是，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小，依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其次，从政治力量方面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增长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到 1919 年已达 200 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优点外，还有一些独特的优点：如身受压迫最深革命性最坚决、高度集中、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易与广大农民结成联盟。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如果它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并且不断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来

领导，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基础。

再次，从思想演变方面看，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大变化，就是发生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研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表了许多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并组织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为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促进了运动的胜利。这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在五四运动后，他们开始到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于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开始酝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工作。

1920 年 8 月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城市以及法国、日本的留学生中先后成立了。1921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了新的理论武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即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

社会而奋斗；有了新的革命方法，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的力量；有了新的前途，这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5. 说明中共二大制定的革命纲领的内容和意义。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12人，代表党员195人。大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并初步解决了革命的动力问题，这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初步结合，为以后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奠定了基础。不足之处主要是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

6. 简述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形成的历史过程。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

站在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不断进行反对军阀势力的斗争。但屡经失败和挫折，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使他开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在孙中山的奋斗历史中，曾多次向帝国主义国家呼吁援助，而其结果总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军阀反对他。从1919年起，孙中山开始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方面的有关人士接触，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先后与中山举行会晤，建议他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并同中国共产党结成民主联合战线。孙中山从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进一步了解和过去一再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和破坏的痛苦教训中，深切感到只有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

1922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遭到陈炯明袭击时，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赞扬国民党在中国现存政党中，是一个“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会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1923年6月，党的“三大”制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次与孙中山接触，说明中共主张，商讨国共合作事宜。1923年1月，苏俄代表越飞抵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揭示了联俄政策。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922年9月至12月间，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三

次召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党务会议，制定了改组计划。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政策，是他在晚年作出的合乎民意，顺乎历史潮流的伟大决策。

7. 列举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了哪些著名的罢工斗争和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 年 8 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从 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领导了多起大罢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四起：

(1)香港海员罢工。1922 年 1 月 12 日至 3 月 8 日，共坚持 56 天，罢工人数最多时达到十万并取得斗争的胜利。

(2)安源路矿大罢工。1922 年 9 月 14 日—18 日，1 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3)开滦五矿大罢工。1922 年 10 月，开滦五矿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迫使矿务局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

(4)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1923 年 2 月 4 日至 9 日，京汉路全线 3 万多工人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最后被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

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主要有：

(1)浙江肖山的农民运动。1921 年 9 月，肖山县的衙前村召开了农民大会，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了减租、反对奸商垄断米价，取消地主苛利等斗争。

(2)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运动。1923 年 1 月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由此发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进而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广大农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3)湖南岳北地区的农民运动。1923 年初，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衡山县的岳北、白果一带，农民运动开始兴起。成立了农工会开展斗争。

8. 简述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及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它对推动全国工农运动发展有什么影响?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 165 人。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于树德等出席了大会，共产党员约占大会代表总数的 14%。

大会最重要的议程是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次大会取得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成果。

第一，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二，大会坚持联共方针，决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努力在工农中发展党员，并根据这一精神，整顿各级组织，从而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直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国民党一大以后，发布了一些有利于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工人组织的法令，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广东，1924 年 3 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工人党员大会，广州全市 600 多名工人党员中有 170 人参加大会。7 月，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制订新警律，妨碍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举行罢工。罢工斗争坚持一个多月，取得完全胜利。这次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的沉寂局面，成为全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在军阀统治区，工人运动也开始复兴。1925 年 2 月，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恢复了被吴佩孚封闭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此后，各地罢工斗争相继发生。

在农民运动方面，1924 年 7 月，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先后主持了六届讲习所。学员毕业后分赴各地指导农民运动，农民运动有了迅速发展。在 1925 年，广东省 37 个县有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 62 万人。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和中心。此外，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都有发展。在广西，韦拔群从 1925 年冬至 1927 年前后办了 3 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数百人，使该地区农民运动有了较快发展。

9. 何谓“新三民主义”？为什么说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基本内容

是：

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可见，这种民族主义不同于过去那种单纯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

关于民权主义。宣言指出：民权主义也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给反帝反封建的人民以自由权利，一是剥夺“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的政治权利，实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政。可见，这种民权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主张，它不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而为人民所共有。

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民生主义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是指：将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政府照价征税，或收买、征收；对缺乏土地而沦为佃户的农民，由国家给予土地，资其耕作；后不久，孙中山又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节制资本”是指：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对于工人，则由国家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其生活。

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同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在民主革命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有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的内容，所以，新三民主义就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当然，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新三民主义的

政治原则还是有区别的，二者的指导思想即宇宙观和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10.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经过几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上的探讨，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

中共"二大"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奠定始基。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作了最早的，也是最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了革命的性质，划分了敌友，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中国革命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思想。

中共"三大"进一步认识到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提高了无产阶级寻找革命同盟军，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

中共"四大"正确估量了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比较早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思想的是瞿秋白和邓中夏。他们在其文章中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国民革命的领袖。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胜利。大会还把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与农民同盟军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如果不发动农民，"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

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中共“四大”以后，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社会各阶级在政治斗争舞台上都做了充分表演，为党深入地本质地分析社会各阶级，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制定正确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在新的形势下，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等先后发表文章和演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正确主张，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杰出的代表。

1925年冬至1926年夏，毛泽东先后发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著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更深入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的路线及民众联合政权的思想，即“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这就是后来所总结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雏型。

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不仅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方向，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并且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11. **简述北伐战争的经过。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的原因是什么？有何重大历史意义？**

1926 年上半年，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革命。当时，全国主要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①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东三省为基地，拥兵 35 万；②亲英美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盘踞湘、鄂、豫等地，拥兵 20 万；③原属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在英、美支持下，盘踞长江下游地区，拥兵 20 万。1926 年 2 月，吴佩孚和张作霖拟定"联合讨赤"计划，孙传芳也联络各省地方军阀，组织"讨赤联军"，围攻广东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趋激化。

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做出准备迎接北伐的决议。在中共和工农群众的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加紧进行北伐的准备。6 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先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以及安徽、浙江、江苏几大战场展开。

（1）两湖战场。这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自 7 月 9 日出师北伐起，到 10 月 10 日攻克武昌止，前后经历 3 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其间主要进行了长沙、醴陵、平江、岳阳、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等战役，其中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最为激烈。在战斗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该团所在的第四军被人们誉为"铁军"。

（2）江西战场。江西战场的战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在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北伐军先后攻占了一些城市、并一度攻入南昌，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又被迫退出。第二阶段从10月10日开始，由于两湖战斗结束，主力投入江西战场，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反击孙传芳，形势发生了有利变化，11月初，北伐军再度发起总攻，11月8日再克南昌，孙传芳败逃南京。

(3)福建战场。由于北伐战争的主战场在两湖，孙传芳主力又集中在江西，因此，福建战场北伐军进展顺利。当福建周荫人部发生分化时，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部自粤乘机入闽，12月2日攻占福州，周荫人残部逃往浙江，北伐军占领了福建全省。

(4)冯玉祥五原誓师。在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退驻绥远一带的国民军加入革命阵营。9月17日，从苏联访问归国的冯玉祥在绥远五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誓师参加北伐。11月，占领陕西全省，在北方策应北伐军的进军。

(5)苏浙皖战场。随着江西、福建战场的胜利，北伐军主力遂转处苏浙皖战场。1927年初，北伐军兵分三路继续进军。2月19日攻占杭州。3月取芜湖、安庆，3月24日攻占南京。这时，已进上海附近的东路北伐军，乘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进入上海市区，至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部处于北伐军控制之下。

总之，北伐军自1926年7月出师以来，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数十万敌军，占领了拥有1.5亿人口，12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地区，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极大地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北伐迅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

(1)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发动和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自始至终获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发展。

(2)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成为这支革命军队的中坚力量和突击队，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3)苏联政府在物质上和军事上的有力援助。苏联政府对北伐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武器，苏联来华的军事顾问在协助北伐军制定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兵无斗志，不断发生分化、倒戈，也为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北伐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极大地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在工人运动方面，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会会员迅速增加，工人的政治斗争不断加强。其中最突出的是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和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史上的壮举，对全国反帝爱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创造了国际工人武装斗争史上的范例。在农民运动方面，农民的组织力量迅速发展，斗争区域逐渐扩大，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北伐前，农民运动仅在广东一省有较好的开展，北伐出师后，农民运动的中心逐渐由广东移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河南、四

川等地，农民群众同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根基。

12.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试分析它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陈独秀把中国民主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否认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早在我党"三大"时他就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会上，由于陈独秀的软弱不争，结果选举的36名委员中，我党仅占7人，蒋介石当选为中央委员。

(2)放弃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陈独秀一贯看不起农民，他说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当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兴起时，他不仅不去支持，反而跟在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后面责难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认为绝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极力压制和破坏农民革命斗争，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

(3)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陈独秀不懂得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因此，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武装，反对共产党员做带兵工作。他容忍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阴谋，限制农民武装，下令解散武装工人纠察队，最后竟交出了工农群众武装，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反革命进攻面前处于无力组织抵抗的境地。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

的力量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陷于失败。

13. 试分析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得如此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从阶级力量对比来看，敌人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是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使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特别是革命阵营内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从而使敌强我弱的局面更加严重。

(2)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发展和危害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统一的认识，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这个时期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后期(1926 年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以致在反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组织有效抵抗，导致了革命的惨重失败。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主要是：

(1)国民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它的最终失败，雄辩地证明：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也关系到两党自身的发展。国民党一大后，中国

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革命逐步走向高潮，直至北伐战争迅速取得重大的胜利，这正是国共两党在新三民主义政治基础上合作的结果。而到后来，国民革命由局部失败发展到最终失败，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裂国共两党合作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

(2)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必须充分发动和武装工农大众，使革命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五卅反帝大风暴的出现，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以及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都是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而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则是同国民党右派势力仇视工农，镇压工农运动，以及共产党内犯右倾错误的领导人压制工农运动分不开的。事实证明，离开广大工农群众，中国革命就将一事无成。

(3)国民革命的失败还表明，在民主革命中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务必注意保持自已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4)无产阶级只有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战胜反动派。中国革命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武装镇压革命是敌人的主要斗争方式，没有武装的群众运动，在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前，只能束手待毙。因此，必须要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次大演习。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

学术研究中一些争议问题简介

一、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和性质

1、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首先从当时的时代条件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已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从世界革命战线上看，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次，从无产阶级自身状况看，中国产业工人已发展到200万人，具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成熟起来，能够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最后，从五四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五四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集中体现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了推动、指导和组织领导作用。最后，从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来看，无产阶级起了决定作用，它支配着运动的发展方向。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革命知识分子担任了政治指导和具体领导。研究者认为，革命知识分子中既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是极少数，他们不能包办运动。在规模如此大，发展如此迅速，爆发突然的情况下，新文化运动中有过影响或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威望的

人物，运动需要他们，他们也能推动运动。

第三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宣传鼓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它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五四运动中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推动和领导。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及其作用的发挥都是因为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帮助。总之，五四运动的推动者、促成者和领导者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第四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无所谓领导权的问题。持此观点者根据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回忆和事实来判断，五四运动完全是自发的，规模不大，缺乏严密的组织领导。

2、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

第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①五四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引起的，又是在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因此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②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的开始。③五四运动中，中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他们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是运动的主力军。④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和组织的，他们本质上是正在转变中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初步的联系，它已不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已能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者。

第二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过渡阶段。其理由是：从领导权看，既不是属于过去的资产阶级，也不是属于后来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革命动力看，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又不以领导阶级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从革命对象和目标看，它仍是反帝反封建，但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指导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又增加了对未来社会的朦胧向往。

第三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理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是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五四运动的全过程还不具备这一特征。因为，其一，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虽然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对这次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不能把它同政治上的领导作用混为一谈，工人阶级没有提出本阶级的独立要求，它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都还没有真正的独立，谈不上进行政治领导的问题。其二，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没有一个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成长为革命的领导者，这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发生的事情。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间

一种观点认为，早在十月革命前，1898 年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传入中国。1899 年 2 月，广学会在上海主办的《万国公报》卷 121 载有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该文

第一章中提及马克思。同年4月,卷123载《大同学》第三章亦提到马克思。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伯尔纳在《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中说,早在1898年夏,《万国公报》的编者就出版了一部系统地讲解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其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该书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以及他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每一部分都作了评述和介绍,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理论尤为重视,着重加以阐述。《泰西民法志》一书发行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不广,故未引起中国人的很大反响,但这确实是目前所知的在中国国内最早提及过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刊物和著作。

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十月革命前提及,介绍马克思学说者,由于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政治需要出发,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往往是极不准确,甚至是歪曲的。有的还根本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作为社会主义派别之一被介绍到中国,并且只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的一鳞半爪,又主要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影响甚微。列宁曾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从普列汉诺夫1883年建立劳动解放社算起,依照列宁的标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从五四时期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总之,在十月革命前,只能是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介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三、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评价

1、李大钊

史学界一致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由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有一个过程的。但在确定其转变的起止时间上以及最早从哪方面转变的问题上,史学界存在着分歧。

(1)李大钊思想转变的起止时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起于十月革命前夕。

第二种观点认为,起于 1918 年。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起于五四运动前夕。

关于终点:

有主张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为标志。还有的认为《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才是李大钊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2)李大钊思想转变开始的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李大钊的思想转变是从哲学思想开始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大钊的思想转变是从政治思想开始的。理由是:当李大钊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破灭,感到革命前途茫茫的时候,十月革命的爆发,直接推动他去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敏锐地认识到俄国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任何革命。通过对列宁领导的新型革命的考察,他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陈独秀

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虽在理论上高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可是,在实践上所主张的则是庸俗进化论和改良主义。随着人民革命斗争的广泛开展和逐步深入,在实践中具体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原

则的陈独秀，就越来越暴露了他固有的资产阶级立场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冲突，终于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后期成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

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是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 年 9 月，他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其转变的标志。历史事实表明：这时期的陈独秀基本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在建党前夕，陈独秀已不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或思想庞杂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开始了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但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中共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但他身上仍存在着旧式知识分子的许多特征，宣扬了许多资产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3、瞿秋白

一种观点认为，以 1923 年初为界，可以明显地看出瞿秋白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其中，他的前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他逐步形成和深化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从 1920 年春到 1923 年初，在社会革命论方面，他逐渐形成了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向着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一种观点认为，五四前是瞿秋白探索着走向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阶段；从 1919 年 7 月到 1920 年 10 月，他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的两年中，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4、恽代英

一种观点认为，在党成立以前恽代英思想倾向是半无政府主义的，热衷于个人修养的新村运动，直到1922年6月，他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从恽代英早期的著作和文学记载来看，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是比较牢固的。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在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以后。1922年6月，他发表《为少年中国同人进一解》，彻底放弃了他所信仰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转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十月革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种观点认为，与李大钊一样，恽代英也是由民主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以五四运动为界，可以把恽代英的早期思想分为两个阶段。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他宣传的主要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弘扬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鼓励青年力行救国，奋发向上。从五四运动到中共成立前后，是恽代英思想大转变时期。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进一步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他不断地克服了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四、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

一种观点认为，一大代表人数是12人，否认包惠僧是会议正式代表，也回避包惠僧是否出席会议。归纳其根据和原因：①苏联移交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档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明确记载，“参加大会的十二名代表”。②经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其它党史工作者的考证后，毛泽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讲话中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只有十二个代表”，并且说了 12 个代表的姓名，其中没有包惠僧，也没有说明包惠僧以其他身份出席大会。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 13 人。其主要是依据是；①有 9 名“一大”代表在不同时间和情况下的回忆中肯定了包惠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有 7 人认为他是代表。②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六大”绘制的一份统计表，其中出席“一大”的代表名单中包括包惠僧。③包惠僧在“一大”前后的活动佐证他具备“一大”代表的资格。

第三种观点认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是 13 人，代表是 12 人，包惠僧是以陈独秀个人委托的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其主要根据是：①包惠僧出席了“一大”会议是正确的，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力的材料印证他由哪个地方组选派；而当 1949 年以李达认为包惠僧不是代表一事托人问他有何意见时，他虽不同意李达的提法，但却认为提不出反驳李达的意见。因而，包惠僧为正式代表的依据不足。②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在《图说中国历史》中叙述道：“中共一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列举所公认的 12 名代表和 2 名国际代表外，还提 到有一名观察员，那就是受陈独秀个人委托参加大会的观察员包惠僧。

五、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期，中国并不具备成立共产党的客观条件，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派人来作了工作，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因而断定中共的成立是“人为的早产”。

国内史学界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与中俄交通的打开，共产国际使者到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以及共产国际二大号召、组织、领导东方革命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支部组织的直接结果。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李大钊、陈独秀并未单独从事中共的创建活动，中共的发起者是共产国际，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国际代表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是断然不会成立于 1921 年的，中国革命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中国已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假如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或早或迟总是要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加速了中共的成立，但它是外因，不能起决定作用。

六、关于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

第一种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第二种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具有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这样两重性质的联盟。从时代因素看，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已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但旧民主主义革命仍在继续，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在进行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改组后的国民党就难免具有新旧民主主义的两重性质。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一个包括了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各自的出发点，目的，有不同的政治路线，这表明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两重性质。从政治上看，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既有利于确立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为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条件，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从组织上看，国民党的领导权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分掌，但共产党人未掌握最主要的权力。从思想上看，既有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又有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指导；从发展方向上看，既有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党的可能，又有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盟的可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仍然是资产阶级政党。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看，是为了争取苏俄及中共的助援，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改造和加强国民党，以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国民党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多少也反映了其他几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比之旧三民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但总的说来，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并未改变国民党的本质。改组后的国民党，不是国共两党平行的联盟，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党纲，组织形式上仍然以国民党为主体。一些工农群众参加国民党，也都必须以承认国民党的党纲为先决条件，不是作为整个阶级的代表加入。因此，不可能使国民党变成四个阶级的联盟。

七、关于北伐战略的制定

台湾学者认为：北伐战略是蒋介石制定的。其总方针是：首先打倒吴佩孚，然后击败孙传芳，最后讨伐张作霖，为达此目的，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口号为“打倒吴佩孚，与孙传芳合

作，不理张作霖”。

大陆学者对北伐战略的制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共是北伐的推动者和组织者。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决议案不仅要求中共党员积极地在北伐途经的省份广泛地发动工农运动以配合北伐，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北伐的战略方针，宣布了北伐的政纲。

第二种观点认为：北伐的战略和策略主要是由苏联顾问制定的。其中加伦充分展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在1925年9月，加伦就制定了以北伐为主的军事总体计划，即著名的《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军事计划》，综合分析了中国的形势，提示了北伐的现实性与可能性。1926年5月他第二次来华后，又校正了没有他参与制定的北伐作战方案，将原方案中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攻改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提出了以攻鄂为主的新方案，军事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方案，提出了“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

八、关于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导者

第一种观点认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发动和领导的。其理由是：第一，罢工的领导机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是在孙中山等人发动下形成的，是经国民党广东政府注册的。第二，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海员工会的负责人苏兆征和林伟民都是国民党党员，他们又是主持罢工的国民党联义社的成员。第三，罢工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国民党方面。第四，解决罢工问题的“公断处”，是由广东政府代表，

英国总领事代表，西船主代表、中国船主代表，海员代表组成，其人数是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在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和鼓舞下，由苏兆征、林伟民为骨干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自己发动和领导的。罢工斗争在进行过程中，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要支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九、1924年北京政变的性质

关于北京政变的性质，当初众说纷纭。有称之为革命行动；有称之为帝国主义更换统治北京的工具；有称之为直系内部的争权夺利；亦有认为虽有一定政治意义，但不能算是革命；等等，莫衷一是。

近几年史学界经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北京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也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政变，因为①从政权问题上看，冯玉祥政变中监禁了曹锟，但并没有立即废弃他，也没有立即解散颜惠庆内阁。而是承认现政权合法地位，按法定程序行事，这就不能说是革命行动。不过政变终迫使曹锟下台，符合人民要求，在政治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②从政治纲领上看，冯玉祥在通电中对军阀割据局面表示不满，主张和平统一，提出了具有改革进步意义的“建国大纲”，但“大纲”对外没有反帝内容，对内没有触及封建军阀势力。③从实现和平统一和改革的途径看，冯玉祥提出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共商，这实际上是要求召开由各实力派军阀首领和著名官僚政客参加的和平会议，于民众无多少利益，没有任何革命意义。④从结局上看，政变虽为革命运动的开展和革命高潮到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政变不久政

权即落入张作霖及其卵翼下的段祺瑞执政府手中。

十、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而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的态度，或避而不提，或说他反对起义。

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由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领导共同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的；陈独秀不仅支持并参与了起义的领导，而且是主要领导者，对这次起义的成败起着全面的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领导作用。特委是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陈独秀担负着特委全面的领导责任，在实际领导中起着最后拍板的作用。第二，决策作用。从特委会议记录上看，陈独秀对武装起义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都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 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性质

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产生临时市政府，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一种观点认为，上海临时市政府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民主政权，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的雏型，作为中共创造的最早的民主政权的形式，无论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形成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经验。

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历史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第一次大革命

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高峰，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一次带有全局性意义的起义。其理由是：第一，随着北伐军向长江流域胜利推进，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已面临崩溃，而统一战线内部革命势力与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对蒋介石的斗争已具有决定革命进退的战略意义。同时，由于蒋介石把争夺的中心放在上海，反蒋斗争的中心战场和前哨阵地也已由广东转到上海，因此，这时上海的斗争不只决定上海地区，而且是带有全局性意义。第二，从中共领导中心的角度来看，当时除了军事运动以外，中共领导的全国工农群众运动集中在两湖和上海地区，而中央局在上海。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起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显然是代表中央的。第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实践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起义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从全党来讲，经过起义的实践，在认识上产生了飞跃，使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最高点。

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只是一次地区性的，里应外合性质的起义，它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外部有利条件下发动起义，响应北伐军，与北伐军内应外合，从而根本覆灭军阀统治，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夺得起义胜利并建立市民政府的。它不是全局性的胜利，更不是决战性的胜利，它不可能也没有把革命推向全国，夺取全国政权。它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还未能找到一条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因此，对起义不能评价过高，过去那种将它说成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

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与巴黎公社会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说法，是不适当的。

十一、关于五卅运动的几个问题

1. 五卅运动由谁领导的

传统的观点认为五卅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多数研究者仍持这种观点，近年有人提出新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五卅运动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充分肯定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必须肯定国民党的作用。因为当时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国民党在全国有一定政治影响。不过国民党的领导在各地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国共合作反帝，共同领导，有的地方是共产党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具体领导，有的地方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是共产党领导。

2. 五卅运动时上海总商会的活动立场

一种观点认为上海总商会始终都与帝国主义者秘密勾结在一起进行破坏。它一面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以帮助扑灭人民反帝运动为其主要职责；另一方面也企图利用五卅运动的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讨得一些好处。

一种观点认为总商会应包括在反帝联合阵线之内，它具有爱国的一面，在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它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但不能说它是反革命性质的组织。

3. 关于“武装民众”和“组织工团学生军”的口号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左”的情绪，在当时民众手中一无权，二无武器，中国共产党力量极弱的情况下，那是办不到的。

一种观点认为，提出“组织学生军”，这是中国学生反对帝

国主义从和平徒手的示威时期进入认识武装反抗时期，是中国学生在反帝斗争认识上的飞跃。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时不存在实行的可能性，但这个口号的宣传是有益的。五卅运动后上海学生出现了弃学从军，投奔黄埔军校的热潮，许多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这都是人们对武装斗争认识提高后结下的硕果。

十二、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政权。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参加并领导的，以国民党员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政权。这个政权是参加 民族民主革命各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政权，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

一种观点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资产阶级政府性质。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共产党已不掌握主要领导权，国民党左派也处处受排挤，而这个政权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又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方面反对蒋介石，另一方面又迎汪复职”；“一方面高喊反蒋，另一方面又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方面做了统一财政工作，另一方面财政经济政策仍然是旧的”；“一方面高唱提高党权，另一方面迟迟不开放民权”；“一方面高喊执行总理的农工政策，另一方面咒骂工农运动过火”。而且武汉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什么国共联席会议，而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第三种观点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应以 1927 年中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后期是资产阶级政权，其间转变的决定因素，是革命领导权的转移。

十三、收回汉口英租界的领导权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收回汉口英租界，不是群众自发斗争的结果，也不是群众直接收回或占领的，而是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或者说是由武汉国民政府派军警接管和收回的。

一种观点认为，汉口英租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收回的。中共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通过武汉国民政府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来实现的，是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和群众团体，发动广大群众投入斗争来实现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在反帝这点上，与中共是一致的，因此，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中共都力主收回英租界，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不同作用。所以，汉口英租界是中共武汉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联合斗争收回的。

十四、关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 政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日本的"币原外交"起了主导作用。早在政变前日本就开始了对华"分化谋略"的实施。因为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早已获得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确切情报，而且日本为了进一步实施币原以经济扩张为主的独特方针，积极谋求再次造成支配中国的有利形势。为此，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一面利用南京事件，通过矢田——黄郛伸手把蒋介石紧紧拉住，"促他向共产党开刀"；另一方面又力劝英美放弃对蒋的高压政策，采纳币原外交的"分化谋力"，因而，在帝国主义对政变的影响中，日本币原外交起了主导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四·一二"政变前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具体问题上虽有差异，但在基本方面却是相同的，

所采取的都是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早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美已掌握了中国营垒内部分裂情况，到南京事件前夕，美已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如箭在弦。从南京事件到政变期间，英美日一致紧紧抓住“宁案交涉”，诱迫蒋介石迅速发动政变，英美日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是相同的。

2. 江浙财团谁先资助蒋介石

一种观点认为是虞洽卿。蒋介石本来就是浙江人，他与江浙财团中许多头面人物一直保持着重要的私人关系，因此，蒋介石是作为资本家的天然同盟者而出现的。1926 年 11 月，虞洽卿由上海去南昌会见蒋介石，以反共灭共为条件，答应在财政上给蒋介石以支持，在沪筹备“二五”库卷，并很快募集了 1800 万元，这成为蒋介石屠杀人民背叛革命的资本。1927 年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又与虞洽卿等人策划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这个机构一建立，又为蒋介石垫支了 300 万元的反革命政变经费。

一种观点认为，最先资助蒋介石的是钱新之和陈光甫。1926 年 11 月上旬蒋 介石第二次打下南昌后，为摆脱困境，需要大量金钱，因此，他就急于同资力雄厚的江浙资产阶级挂钩，经过分析，蒋派亲信黄郛和徐桴(星禅)赴沪与钱新之、陈光甫秘密联络。江浙资产阶级提供给蒋介石的金钱已公开的 1927 年 4 月 1 日垫支给蒋的 300 万元，并非第一次，而是 1927 年 2 月初，钱新之、陈光甫借予的 50 万元。

3. 政变前夕蒋汪上海会谈是否达成反共协议

一种观点认为，蒋汪上海会谈达成了反共协议。“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为了发动反革命政变，迫切要求和一切反动势力合作，特别是和汪精卫合作。4 月 3 日，汪精卫一到

上海就与蒋介石等举行了秘密会议。会议决定①在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②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③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④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这四条决议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举行反革命叛变的纲领和计划。

一种观点认为，从当事人吴稚晖、李宗仁、汪精卫等人的通讯、记录、档案、回忆提供的材料看，政变前夕，蒋汪上海会谈并未达成反共协议。研究者还认为，导致蒋汪会谈分歧的本质，乃是蒋汪争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力。

十五、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

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决定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解散是从实际出发，对保存发展革命力量有利，是必要的妥协，应该加以肯定。理由是：第一，中共中央决定公开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指导思想是，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积蓄革命力量，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时间，准备更大规模的反抗。第二，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只交了1000支坏枪，留下2000多支好枪，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的武器的来源。交枪仅仅是应付局面的一种策略。第三，交枪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也使周恩来等腾出手来加强叶、贺部队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军事工作，准备南昌起义。

一种观点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事件，无论其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后果，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理由是：第一，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解散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指导下，向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妥协退让的

典型，根本不是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第二，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基本上交出去了，少量枪支保存下来只是干部群众不同意中央决定的抗拒行动。第三，交枪非但没有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引起了革命队伍的极大混乱，加剧了革命危机，助长和加速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

十六、关于“10万农军围长沙”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记载，在马日事变后，发生过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壮举。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争论颇为激烈，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日事变后，10万农军围攻长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次农军的行动是湖南临时秘密省委统一部署的，由长沙附近各县县委发动和组织的，各县集中了10万左右的农军，一致朝着长沙进军，初步构成了对长沙战略包围的形势，并开始了外围作战，而且浏阳农军长驱直入，攻打了长沙城。只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农民暴动的关头，下达了等于出卖革命的撤退命令，致使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壮举遭到失败。

一种观点认为，马日事变后，湖南不少区县的农民协会确曾有过广泛的反击活动。但是，不论当时农军是否有围攻长沙的意图，事实上，只是些时聚时散，此起彼伏的骚动，5月31日攻城的只是浏阳一路数千人，根本没有形成围攻长沙的军事局面。所谓10万农军围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当时听信的传闻。

十七、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1.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阶段划分

一种观点认为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从党建立前后起

到五卅运动前，这是“基本思想”酝酿的重要时期。2、从五卅运动到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这是“基本思想”初步形成时期。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到“四大”前。我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2、从“四大”到五卅运动前。“基本思想”在全党提出，并开始初步形成。3、从五卅运动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的发表。党对“基本思想”的认识更加全面和丰富了。

2.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是初步形成的标志。研究者认为：1、毛泽东当时已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处于新的历史时代，即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2、毛泽东在对各革命阶级的分析中，对无产阶级的评价最高，并已十分明确“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3、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4、毛泽东已明确提出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政权的思想。

一种观点认为“四大”是初步形成的标志。研究者认为：革命的领导、动力和对象是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只要这三个重要问题明确了，其他的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因此，把“二大”至“三大”期间解决的革命对象、动力和“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农民同盟军通盘考察，到“四大”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基本思想”。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则是对“基本思想”的进一步完整概括和充实。

3.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首倡者

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并坚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领导权思想的是瞿秋白。早在1923年间，瞿秋白就发表了数篇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此后在中共三大上，又就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与陈独秀进行过争论，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中“争来的”、“夺来的”。

一种观点认为，邓中夏是党内较早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人。1923年12月邓中夏发表了《论工人运动》一文，指出“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站在主力军地位”，“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群众居首位”。

第三种观点认为，彭述之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就“全面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首倡者是蔡和森。早在1922年到1923年6月之间，蔡和森就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并认定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领导者。

第五种观点认为，高君宇在1922年9月发表的对《造国论》一文质疑的文章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高度，运用阶级分析法，指出了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居领导地位的问题。

十八、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右倾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陈独秀所犯错误在主要问题上都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

示的结果。①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主要依据。②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关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却授意和支持陈独秀等人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包办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致使我党1926年三次对国民党右派大退让。③在大革命紧急关头，共产国际的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指导方针导致我党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从而造成了党和革命的惨重失败。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是基本正确的，陈独秀所犯错误有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二次革命论。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过是反帝，反封的“重要分子”，而不是领导阶级；农民不过是只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革命便失去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因此陈独秀主张取消党的独立性，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

第二部分　国共两个政权两条道路的对峙与斗争

概　　述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国共两个政权，两条道路的对峙与激烈斗争时期，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也称为十年内战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又可分为两大时期。

前期的历史从 1927 年 8 月到 1931 年 9 月，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及其与各派军阀的混战；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中间政派的活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内存在着三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即武汉方面、南京方面和上海方面（西山会议派）。三派中，主要是宁汉两方面的斗争。1927 年 8 月，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策略，宣布下野，结果缓和了宁汉双方的矛盾，宁汉很快合流。1928 年 2 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各派以蒋介石为中心实现了"统一"。为了同张作霖争夺全国统治权，1928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进行"二次北伐"，并于 6 月中旬占领京津。12 月 29 日，张学良通电东北

“易帜”，南京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1928年10月，国民党公布《训政纲领》及《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五院制的建立，表明国民党政权的政府机构完备起来。通过厉行“清党”，镇压革命、编遣军队，整理财政，颁布《土地法》，改订新约运动等内政外交，国民党一方面确立了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另一方面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承认。国民党蒋、冯、阎、桂四派军阀各怀扩张野心，在他们取得对奉作战胜利后，彼此间矛盾立即尖锐起来。从1929年3月，先后爆发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及中原大战等新军阀混战，结果均以蒋军取胜而告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集中“剿共”，均被粉碎。

国民革命失败后，通过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发动了各地武装起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广州起义等。在众多起义中，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试图占领中心城市以夺取全国政权的起义；另一种是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为代表的，以攻打大城市遭受挫折后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将起义部队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起义。通过这些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军队，提出了苏维埃政权口号。从1928年到193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洪湖湘鄂西根据地及广西右江根据地等规模较大的根据地，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相继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总结了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了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构成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1928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在苏区土地革命中,中共逐渐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从 1930 年 12 月到 1931 年 9 月,中央苏区先后三次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

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形势下,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它阶级中的改良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军阀的混战争斗,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而企图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创办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结成党派,从事反蒋、要求民主、改良社会的活动,形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其影响较大的有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派和人权派。

本部分后期历史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2 年 5 月《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很快占领我国东北三省。1932 年 3 月,日本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极端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为了转移视线,压迫南京国民党政府屈服,1932 年日本又发动对上海的侵略,制造"一·二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态度。当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抗日民

主运动逐渐高涨。而中国共产党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继续发展，对兴起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予以正确的领导，反而使白区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第二阶段：从《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到1935年华北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1933年又侵占我国热河省，将其划为伪“满洲国”统治，并制造冀东“非武装区”。国民党蒋介石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国策。对内，国民党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两大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资本，进行法西斯宣传和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等，加强其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强化法西斯政权。对苏区和红军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先后发动第四次和第五次军事“围剿”。对外，继续对日妥协屈服，当日军侵占热河后，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默认日本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在这阶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在中国领土内存在着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苏区进行了土地革命，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间政派掀起了抗日反蒋运动，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福建事变的爆发等。

第三阶段为1935年，这一年日本加紧策划把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活动，制造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国民党却继续采取对日妥协政策，先后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

确领导，在长征途中，反对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活动。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涨的到来。“一二·九”运动正是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到来的标志。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第四阶段：从 1936 年到 1937 年 7 月，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继续向着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尽早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改变了对蒋的方针，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1936 年 6 月爆发两广事变，12 月又爆发西安事变。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1937 年初，国民党为商讨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致电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2 月 15 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基本问题解答

重要名词：

宁汉合流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之间矛盾斗争的事件。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各派系的纷争，集中表现为宁汉两方的对立和争斗。争斗的焦点就是双方都想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掌握最高领导权。1927 年 8 月 13

日，蒋介石以退为进，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介石的下野，使双方矛盾缓和，促进了宁汉合流。8月19日，武汉方面宣布“即日迁都南京”。9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各推委员组成。由于特别委员会实权控制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汪精卫等人又在广州另树国民党中央旗号，结果在斗争中遭到彻底失败。1928年7月，蒋介石在各派促使下复任总司令职务，并于2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标志着国民党内部之争暂告结束。

济南惨案　亦称“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1928年4月，国民党进行“二次北伐”，国民党军的北伐，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5月3日，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的国民党军进行大屠杀。赴济南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被日军扣压18个小时，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被捆绑，蔡因向日军抗议，被割去耳鼻舌，挖去眼睛，之后日军又将蔡等17人杀害。从5月3日到11日，中国军民被杀害者达数千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而蒋介石却屈辱退让，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并严厉禁止人民的反日运动，使日本武装占领济南达一年之久。

皇姑屯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1928年5月下旬，国民党“二次北伐”兵分三路逼近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乘专列退出北京。由于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侵占满

蒙的全部要求(包括修建铁路、开矿、设厂、移民和中国停止在葫芦岛筑港等),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对张极大不满,决心要除掉张作霖。4日清晨,当张作霖专列经过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巨量炸药炸死。

东北"易帜" 奉系军阀控制的东北地区归属国民党政府统一管辖的事件。1928年5月,国民党军逼近京津,奉系军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乘专列退回关外。次日,张作霖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事发后张学良从北平秘密回到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职。7月1日,他通电表示希望和平,主张统一。国民党也决定对东北问题采取和平方法解决。此后,双方信使往还,商谈南北统一问题。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发出东三省"易帜"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将原北京军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换上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南京国民政府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南京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训政纲领》 国民党颁布的关于实施"训政"的文件。国民党在其军队占领北京后,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28年10月上旬,国民党中央通过《训政纲领》,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其内容规定: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步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负责"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其实质就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

改订新约运动　国民党政府初期最重大的一项外交活动。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对帝国主义采取亲近、妥协的方针。1928 年 6 月 15 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称"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7 月 7 日，外交部提出重订新约的三条原则。改订新约的内容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从 1928 年 7 月起，国民党先后同美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使中国获得了一定的关税自主权。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并未得到结果。通过改订新约，南京政府取得了帝国主义各国的承认。

改组派　亦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国民党内的在野反对派。1927 年冬，汪精卫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遭到失败后便打出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号。1928 年 5、6 月，陈公博、顾孟余先后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宣传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是年冬，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具体工作由王乐平负责。改组派曾在国内许多省和海外一些地区建立支部，会员一度达万余人。其主要口号是恢复 1924 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复活"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国民党。他们对共产党及其他政治派别均采取排斥和反对态度。其上层除个别反蒋民主人士外，大多是投机政客。下层主要是处在　徨苦闷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30 年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在北平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次年 5 月，汪又搜罗一批改组派分子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流，改组派不复存在。

第三党 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一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联合国民党左派，于1928年初由谭平山在上海发起了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邓演达在该党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和反动资本阶级；目标是推翻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平民政权，最后实现社会主义。但它也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故称其为“第三党”。该党积极参加1933年福建事变。1935年11月，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号召，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宣布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八一起义 亦称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江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经验教训，为挽救革命，决定首先在南昌发动起义，由周恩来任书记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1927年8月1日2时，南昌起义枪声打响。两万余名起义军经过几个小时战斗，全歼守敌，胜利占领南昌城。中午，驻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二十五师大部，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举行起义，第二天开进南昌。起义成功后，在南昌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8月3日到7日，起义军按预定计划相继撤离南昌。后一部分进入井冈山，另一部分进入海陆丰地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秋收起义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秋领导的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的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随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9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与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等地农民军和安源工人武装所组成，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起义军分三路会攻长沙，当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计划，改为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三湾进行了改编。10月底，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三湾改编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在江西永新三湾进行的一次整编。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三湾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整编：缩小编制，将原来的3个团编成1个团；建立了各级共产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党的前委统一领导；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改编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周文雍任总指

挥的工人赤卫队，以及第四军警卫团一部和郊区农民武装。张太雷任总指挥。起义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便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和政纲。在广东军阀的进攻下，经过三个昼夜激战，终遭失败。张太雷牺牲。留下的部分武装后来分别参加东江和右江地区的武装斗争。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对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英勇反击。

井冈山会师 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随后，攻夺县城，建立革命政权，恢复共产党组织，改造地方农民武装。到 1928 年春，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1929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队和湖南暴动后组成的农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部会师，5 月 3 日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对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土地革命 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解决农民根本问题的活动。各根据地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进行，先是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接着是调查摸底，实行分田。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于 1928 年 2 月先在宁冈大陇等地进行。同年 12 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在闽西根据地，1929 年 7 月以后，土地革命迅速展开。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路线。除井冈山、

闽西、赣南根据地外，在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内都进 行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给红军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古田会议　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 年 12 月 28 日到 30 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举行。大会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纠正方法主要是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同时严格纪律。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 11 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

"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的关东军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加紧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准备。9 月 18 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周之内，辽宁、吉林二省相继失陷。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一再严令东北军"绝对不许抵抗"。19 万东北军被迫退入山海关内。1932 年 2 月 5 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经过 4 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

"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上海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引起了国际上极大关注。为了转移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党政府屈服，1932 年 1 月 28 日夜，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指挥下，违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到了上海民众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而蒋介石却拒绝派兵增援，军政部还克扣军饷和截留捐款。3 月 1 日，十九路军被迫撤退。5 月 5 日，国民党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上海，而日军却可以继续留驻上海。

"攘外必先安内" 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奉行的一项反动国策。1932 年 5 月，《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之后，蒋介石发表一系列言论，一再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攘外"。并一再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正是在这样的反动国策下，"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被镇压下去，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断地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夺，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

伪"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1932 年 3 月 1 日，日本帝国主义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9 日，溥仪在长春粉墨登场，出任"执政"，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1934 年 3 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又把"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为"康德"。表面上"满洲国"由一批汉奸头目当总理和各部大臣，实际上，"满洲国"完全受日本关东军支配，

关东军司令官是“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极端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东北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伪满洲国被彻底摧毁。

塘沽协定 长城抗战后国民党同日本关东军在塘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省会承德后，进犯长城线上的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军事要地。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掀起长城抗战，但日军很快威逼平津。5月31日，何应钦派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芦台等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撤军，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驻有军队。这样，国民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军随时可以进占冀察和平津。

“天羽声明”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的一个声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1934年4月17日由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声称，“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其他各国“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此声明反映了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狂妄野心。对于这一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声明，国民党政府不敢进行反驳，而是一味退让妥协。

“邦交敦促令” 亦称“敦睦邦交令”，国民党政府颁布的

一个媚外误国的法令。1935 年 6 月 10 日颁布。国民党不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华侵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的形势，竟以“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为名，规定“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对日妥协、对内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等 63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

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于 1935 年 1 月 15 日到 17 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等 20 人。博古主持会议，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周恩来做了副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议起草并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

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四渡赤水 红军长征中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云贵川边界地区进行的作战行动。遵义会议后，蒋介石急调重兵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进行围堵，并在长江沿岸构筑了严密的封锁线。红军为争取主动，决定暂缓渡江，乘贵州北部敌人比较空虚，转头向东，于 2 月 18 日和 19 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消灭贵州军阀 2 个师，回师遵义地区。敌人在遵义地区加筑工事。为了迷惑敌人，红军从遵义地区再次西进，于 3 月 17 日由茅台三渡赤水河。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派兵西追，红军又突然折回，于 3 月 21 日晚经二郎滩等处四渡赤水，将敌军主力全部抛在乌江以北，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何梅协定 国民党与日本军签订的出卖华北部分主权的秘密协定。1935 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军队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破坏了《塘沽协定》。6 月 9 日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何应钦提出：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解散北平军分会训练处、蓝衣社等机关；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7 月 6 日，何应钦经汪精卫批准，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6 月 9 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至此，形成了何、梅之

间的协议，习惯上称作《何梅协定》。

《八一宣言》 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宣言。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阶级关系进一步发生新的变化的情况下，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宣言获得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一二·九”运动 1935 年，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威逼平津，制造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军头目梅津美治郎，订立了出卖热河、河北主权的《何梅协定》。日本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实行“绝对不抵抗”的投降妥协方针，按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计划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于 12 月 9 日、16 日，两次举行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国民党出动军警武力镇压。学生们的爱国斗争，得到各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史称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灭中国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国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此后，在中共领导下，平津学生纷纷组织南下宣传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深入工厂、农村、军队，宣传抗日，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1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正确地认识到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党的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这次会议是中共政治路线真正转变的起点，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政府打击和迫害抗日民主人士的事件。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举行了援

救运动。宋庆龄等17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全国各界纷纷响应，推动了抗日救亡的发展。1937年7月31日，沈钧需等7人出狱。

绥远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绥远东北地区抗击日伪军进攻的战斗。1936年1月，蒙古族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公开投降日本，成立伪内蒙古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5月，又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扩充军队。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王英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为“大汉义军”)。11月，在日军配合下，李守信和王英等伪匪军向绥远大举进攻。驻绥远的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百灵庙，后又收复大庙。国民党政府也对绥远抗战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全国人民发起了援绥运动。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是抗战形势高涨的一种表现。

西安事变 亦称“双十二事变”。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重大事件。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继续打内战。张学良、杨虎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到蒋的拒绝。蒋介石亲到西安督战。张、杨在“哭谏”无效后，于12月12日清晨，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陈诚及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大员。当天，张、杨联合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23日，24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以不签字形式表示同意，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此内战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

问 答 题：

1. 试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内外政策说明它的阶级性质。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权，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从其内外政策上可以说明这一点。

(1)对内政策上，主要是加强法西斯统治。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0月，公布了《训政纲领》，实行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制。为了加强对广大城乡人民的统治，蒋介石指使成立"中统"、"军统"两大特务机构，把特务组织扩展到各个系统中去，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造成特务恐怖统治。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严厉镇压措施。从1927年到1931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1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制订的有关劳资争议和民众运动的文件中，把人民群众在国民革命时期争得的民主权利，完全取消。

在军事上，蒋介石为了削弱其他军事集团的力量，加强自己的地位，提出编遣军队主张。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由于其他军事集团对蒋介石的计划不满，到1927年8月，军队编遣毫无结果。蒋介石企图依靠武力来解决。从1929年到1930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结果均以蒋取胜而告终。在打败异己势力之后，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进行"围剿"。

在经济上，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广借外债，大量发行公债，另一方面以整顿税务为主，整理财政，主要是整理关税、盐税和统税。结果增加了国民党政府的收入，加重了民族资本家的负担，尤其是蒋介石国民党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力，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迅速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势力，成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农村中，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农村的封建秩序没有任何变化，与以前不同的是，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了。1930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一个《土地法》，其核心是维护地主对土地的私有。其中也有二五减租的规定，但实际并未实行。1932 年又颁布一个《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规定以前苏区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地主土地，"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即重新确立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

在思想文化上，国民党一面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另一方面进行法西斯宣传，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大力推进所谓"党化教育。"

(2)对外政策上，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对帝国主义采取亲近、妥协的方针，表现在两方面。首先表现在宁案、济案的解决上。1928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同英美等国讨论解决南京惨案，结果竟然把惨案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并向帝国主义进行道歉等。1929 年 3 月，国民党政府又与日本达成济案协议，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城市、杀害中国军民的罪行一笔勾销。其次，表现在改订新约运动上。改订新约的内容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关于关税自主问题，从 1928 年 7 月，国民党政

府先后同美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并未实行。这些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亲近,妥协的反动本质。

2.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内部经过争斗,实现了宁汉合流。同时,又经过1928年的"二次北伐"及东北"易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五院制的建立,表明国民党政权的政府机构完备起来了。这样,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暴动,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并创建人民军队,建立农村根据地及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形成对峙状态。除国共两党尖锐对立外,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既不满意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武装革命的主张,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如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等。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和对革命人民的残酷镇压,使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由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了买办豪绅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附合了反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队伍,革命阵线里只剩下工人、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城市工人虽然还在进行斗争,但斗争的次数明显减少,斗争的性质大多数为经济斗争,而且带有明显的防御性,斗争的结果大多数遭到失败。农村斗争呈现此起彼落的状态。农民协会组织被摧毁。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掀起过高潮的地区,很快出现共

产党领导的武装割据。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农民斗争的发生，如江浙、河南、河北等地。

3. **简述第三党、人权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主张。**

国民革命失败后，在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下，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中的改良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军阀的混战争斗，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形成中间政派，主要有第三党、改组派和人权派。

第三党，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其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这个革命由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生产管理人员等，即"劳动平民阶级"来承担；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和反动资本阶级；目标是推翻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平民政权。对外政策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与苏联恢复邦交。对内政策是消除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认为工农武装暴动是"盲动"、"乱动"，建立苏维埃是"空想"、"妄想"，土地革命"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等。

人权派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主要通过《新月》杂志来宣传他们的主张，因此也被称作"新月派。"其政治主张为：(1)保障人权、确定法制基础，强调"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应"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2)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他们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又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改组派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正式名称叫"中国国民党

改组同志会”，成立于1928年冬。其政治主张为：(1)他们认为南京国民党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对帝国主义投降，对一切封建势力屈服，“再也看不见国民党的组织。”(2)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重新“确立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复活“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国民党。改组的方法是：理论上“遵循三民主义”，肃清“共产党理论”；组织上“铲除新旧军阀”，实现国家统一；政治上，恢复国民党民主主义精神；外交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4.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的正确道路是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这条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在农村积蓄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那么，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这条道路呢？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在中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利用城市作为阵地向革命进攻。革命队伍要战胜这个强大敌人，就必须长时期的积蓄和发展自己的革命力量，在力量不够时，避免与敌人决战。因此，就必须有巩固的阵地，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二，中国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地区广大，使革命有回旋的余地；许多地区受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

响，广大农民有对敌斗争的经验和农会的组织基础，便于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三，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搞武装斗争就必须武装农民，就必须以农村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开展土地革命，积蓄力量、组织军队、准备干部、建立政权，使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地波浪式推进。

5. 四大家族的代表指哪些人？他们的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国民党在建立对全国统治的过程中，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凭借政治、军事权力，强取豪夺，迅速集中大量财富，并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垄断，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其形成是通过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1）接收北洋军阀政府旧有官僚资本，依靠新军阀内战和买办发家。国民党官僚资本是从接收北洋军阀政府旧有官僚资本开始的，但这部分数量有限，其资本的膨胀，主要靠内战。为了筹措军费，一方面加紧财政搜刮，另一方面滥发公债。四大家族通过政府发行公债及银行垄断公债等经营，从转手中攫取大量财富，此外，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内战军火几乎全部依赖外国。大宗的军火贸易，主要为四大家族垄断，而买卖军火的折扣是很大的，有时高达40%。

（2）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192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享有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经募内外债等各种特权。宋子文、孔祥熙曾先后任该行总裁。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又以强制加入官股的办法，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

银行。1935年又正式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国民党政府还设立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两个金融机构,垄断信托、保险等金融事业。这样,四大家族以四行二局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金融垄断网。

(3)垄断工商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在工矿业方面,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1931年和1935年先后设立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全国资源委员会。通过资源委员会,建立了一批新的官办企业,到抗战爆发前,该委员会有下属厂矿11个。建设委员会也抢夺和吞并了几个企业。在商业方面,有孔祥熙的祥记商行,宋子文的中国棉业、华南米业、国货联营等公司,陈家也办有一些商业垄断机构。总之,到抗战前夕,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掌握了全国大部分铁路、公路,左右着2/3的国内商品流通,垄断了中国的金融,通过货币、信用和外汇政策,掌握了全国工商业的命脉。标志着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形成。

6.“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有什么明显变化?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以此开始。

(1)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2)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1931年9月24日,上海3.5

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罢工。23家日资纱厂工人酝酿同盟罢工。10月初，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工人纷起成立抗日义勇军。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

(3)青年学生在反日浪潮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1931年9月27日，沪宁两地学生冒雨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外长王正廷，捣毁了他的办公室。

(4)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来。他们起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要求政府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言论，要求"立息内争，共御外侮，"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对内政策。

(5)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裂和动摇，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深明大义，提出各项抗日主张。1931年11月，当日军进犯黑龙江省时，国民党黑龙江省代主席、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抗战，成为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总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和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7. 试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表现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

(1)在政治上。第一，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

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形成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孤立了自己。第二，在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上，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强调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鼓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鼓吹“城市中心论”，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在军事上。第一，在建军原则上，主张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做群众工作。第二，在作战原则上，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要求阵地战和“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

(3)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搞独断专行，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压抑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推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它使九一八事变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形势很快丧失，使白区工作几乎损失100%，以致中央在白区无法立足，使红区工作损失90%，党员由30万降到4万，红军由30万人降到3万人。

8. 试述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不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

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1）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

（2）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实际上主持政治和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3）会议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的责任。中央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会议果断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特别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改变了红军的行动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遵义会议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在解决重大路线问题时，能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积极的思想斗争，妥善处理党内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的党内分裂的危险。

(3)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来。这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9. 简述红军长征的原因、经过及意义。

正当苏区和红军迅速发展的时候，1931 年 1 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并逐渐向革命根据地推行。1932 年 10 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会后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将毛泽东排斥出红军的领导岗位。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 100 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社会主义者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等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导致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万里长征。

1934 年 10 月 10 日晚开初，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共 8.6 万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至 11 月 30 日，红军经过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城，在这里举行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 1935 年 6 月到达四川懋功，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由于张国焘阴谋制造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在再三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继续北上，于 10 月 19 日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

师。张国焘由于南下搞分裂遭受一系列挫折，不得不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其第二“中央”，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万里长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长征是历史的新纪录。它横跨中国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战胜了人间稀有的艰难险阻，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2)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妄图消灭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3)长征是宣传队。它向沿途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人民群众深切地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救星，红军的道路是他们求得彻底解放的唯一道路。(4)长征是播种机。在红军经过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过后，这些地方的人民不断起来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战争。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0、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怎样形成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与推动下建立的，其中，中共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主要因素。大致说来，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是经历了提出、演变和最后形成三个阶段。

(1)从瓦窑堡会议到1936年5月，党的策略方针是“反蒋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行妥协、投降政策，全国出现了抗日反蒋的形势。1935年12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

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明确提出了“抗日反蒋”。

(2)从1936年5月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逼蒋抗日”阶段。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加深了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并且还派人与中共开始接触，两党历经十年分裂之后又开始新的对话。这样，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这个通电中未再提反蒋。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极为重要的改变。

(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的政策由“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经过多方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2月，中共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4月，党中央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又一次重申“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的政策。同时，还派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使党的“联蒋抗日”方针得以实现。

11、华北事变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后，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使国民党统治受到威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冲击着国民党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以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为标志，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发

生了变化，具体可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日政策的若干变化。在国民党“五大”中，蒋介石发表了对外关系演说，虽然仍谈“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等对日妥协的幻想，但又指出；“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之时与牺牲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深以及可能修改对日政策的新动向。“五大”之后，国民党对日政策逐渐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从 1936 年 1 月开始的中日谈判问题上。1936 年 1 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对华外交三原则”，对此，国民党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加以否认。此后的谈判中，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趋于强硬。7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在 9、10 月份的谈判中，国民党向日本提出了包括取消塘沽、淞沪两个协定在内的调整中日邦交的五条反要求，致使谈判不欢而散。

（2）随着对日政策的逐步改变，国民党政府为改善对苏联关系的需要，也做了要改变对中共政策的姿态。1935 年冬，蒋介石派驻苏武官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交涉，要求与中共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派吕振羽、潘汉年分别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张冲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后来提出和平解除共产党武装的无理要求，致使谈判于 1936 年 9 月中断。

（3）面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国民党也不得不做出准备实行民主姿态。集中表现在“五五宪草”的公布。“五五宪草”是一部反民主而又粉饰民主的宪法草案，反映了

国民党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压力下，不得不作出民主的姿态。

12、**何谓西安事变？说明其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杨虎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亲到西安督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将蒋介石扣留。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了西安全城，拘捕了陈诚、卫立煌等十多名军政大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挑起中国内战。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妄图发动"讨伐"战争，轰炸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则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事变，并派代表赴西安谈判；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出于激愤，纷纷要求杀掉蒋介石。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12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提出的基本方针是：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应张、杨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等组成代表团，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代表团在西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2月23日、24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谈判。结果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它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学术研究中一些争议问题简介

一、关于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主要依据是：其一，中央决定南昌起义，目的是要开展土地革命。尽管当时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起义领导人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但从总的方面看，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二，许多纲领表明，起义本身是以土地革命为目的和主要口号。在以贺龙名义发布的《告官兵书》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其三，由于战事频繁，军队流动，没有条件开展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活动，但在南下途中，还是进行过建立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的尝试，而这些都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内容。其四，南昌起义以土地革命为旗帜，对各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另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并未使土地革命付诸实践。南昌起义既没有在实际上开展土地革命，也没有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仍然坚持南下夺取广州，重行北伐的错误目标。

因而，南昌起义在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上，不但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反而正是它的两大致命弱点，是它之所以失败的两条根本原因。那种起义军南下广东就是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土地革命的看法，是对南昌起义的一种不恰当的拔高，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八七”会议与土地政策

对“八七”会议规定不没收“小田主”的土地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八七”会议对于“小田主”(指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采取“减租”政策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当时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不没收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有利于孤立大、中地主，并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的“不大彻底”的办法，不仅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而且也是必需和允许的。因此，批评“八七”会议在没收土地问题上的主张是右倾的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所提出的对小地主(拥有土地五十亩以下者)土地不没收的政策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它不能普遍的满足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需要，特别是在小地主占地主多数的南方。

三、对红四方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西移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最后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仓惶率红四方面军西移。因此，西移不是战略转移，而是右倾逃跑。

第二种观点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是为了摆脱困境，保存实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战

略转移。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西移这样“复杂的历史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的否定或肯定。理由是，从具体过程看，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兵力强大，部署周密，战术诡诈。面对这种形势，张国焘却盲目轻敌，指挥失误，实行消极防御，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疲于奔命，最后被迫离开根据地西移，直到中央电令他在鄂豫陕建立新的根据地才刹住逃跑行动。因此，西移说不上是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从客观效果看，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是在整个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就地决战会全军覆灭，分散游击将被各个击破。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有西移才能使红四方面军摆脱险境，保存实力，为红二十五军的重建争得时间，同时也为后来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创造条件。所以，西移在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中，起了意想不到的战略转移作用。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历史条件

一种观点认为，具备一定历史条件，但不够成熟。理由是，其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革命形势有了较大发展。一方面是根据地、红军以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壮大，迫切要求党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针对国民党的卖国不抵抗政策，全国进步力量都把希望寄于中共身上，如果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组织，将全国的革命力量统一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就能将革命推向前进。其二，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全党就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而奋斗。这一政权的建立，反映了全党和全体革命人民的普遍愿望，适应了一定的客观历史的要求。其三，虽具备了一定历史条件，但又是不够成熟的。一方面是

主观条件不够成熟。那时我们只有建立根据地的经验,还没有管理一个国家的经验。一方面是客观条件还不够成熟。在互不连属,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也只有 5 万平方公里土地 250 万人口的近十块根据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国家政权是很勉强的。而且全部红军加起来到 1931 年底也不过 13 万人,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不具备保卫疆土的能力。

一种观点认为,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当时成立全国性政权的客观条件不成熟,从召开"一苏大"的时间一再推迟,开会地点也发生变化的事实均能说明。全国性政权的建立,主观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不能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过早地亮出共和国的旗号是不必要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历史条件是成熟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五、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共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旧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其次,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缺乏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产生"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具体来说,一是党的理论准备不足,马列主义水平低。二是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党又缺乏领导经验。三是党领导作风的不民主和党内斗争方针的错误。再次,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和指导,是产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外部原因。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并不是"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十年内战时期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其主要原因是对外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

论述教条化，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是生搬硬套外国的革命经验。

六、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

中国革命道路是何时正式形成的，有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1930 年标志着“道路理论”的形成。理由是，1930 年 1 月，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批判了“城市中心论”，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在这里已相当明确。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批判了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此外，还可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对红四军正确主张的批评得到反证。

第二种观点认为，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初形成。理由是，其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已开始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但仍未建立起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牢固观念。其二，《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虽然在思想路线上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要回答中国革命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还必须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认识。其三，1930 年 6 月到 10 月，毛泽东率军“从农村奔向城市”的实践，使他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四，从 1930 年 10 月到 1931 年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第三种观点认为，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才是这条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理由是，其一，该文明确指出要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认识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从而也就指明了要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其二，该文特别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认识战争的规律，从而全面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走道路的依据。其三，该文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从而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四，该文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弱小时就要红军攻占大城市和教条式地搬用苏联和国民革命时期经验的错误思想。最后，该文还描绘了中国进行革命战争以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幅蓝图。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 1938 年 11 月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和 1939 年 12 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其依据是，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才第一次明确地把先占农村，后取城市作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提出来。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才最终完成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此外，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关于“道路理论”的形成是一个过程。

七、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其依据是，其一，“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转变，即以武力灭亡中国阶段的开始。其二，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超过了中华民族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成为最突出的矛盾。其三，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形势，这种形势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规定和制约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理由是：其一，由于国民党政府惧怕

日寇，并幻想依靠国联制裁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因而对日本实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则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和文化“围剿”，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这样中华民族就不是团结一致地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作为中国当权者和中国主要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掌握者的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之间就没有形成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其二，英、美等国都有反苏的愿望，加之英美在东北的权益较少，因此其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采取纵容政策。同时，在同日本争夺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尚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也就是英美派占优势的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原因之一。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其三，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予盾，由于国民党政府仍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继续实行采协政策，幻想通过谈判和英美等国的牵制，使日本停止扩张的方针，因而虽导致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但仍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四，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八、中央红军长征前是否有准备

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前是没有准备的。理由是，1934 年 10 月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惊慌失措，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既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又没有在指战员中进行政治动员和必要的准备工作，即匆忙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仓促实行战略大转移。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准备的。其理由是，遵义会议决议说，“国际 6 月来电”，提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

的事情”。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如伍修权、李维汉等有关长征的回忆都证实红军长征是有准备的。红军到达陕北后出版的一些党史书刊认为“中国红军新的策略决定后，便开始长征的准备工作”。

第三种观点认为，长征是有所准备，但决断犹豫，出动仓猝。“有所准备”是指党中央的领导层是有所准备的。广昌战役之后，面对严重的局势，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就酝酿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列入季度战略计划，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了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决断犹豫”是指广昌战役后，虽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但却没有足够的胆略作出战略方针转变的决断。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一方面作着撤的准备，一方面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央苏区，争取战役上大的胜利来改变战局，迟迟未作出撤的决断。“出动仓猝”是指离开苏区的行动很仓猝。因为，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与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在军事方面必要的准备也非常不够。

第四种观点认为，战略上缺乏充分准备，战术上作了直接准备。从整体上看，从战略观点上看，是缺乏充分准备的。从具体上讲，从战术观点看，行军前是作了具体的部署，直接的准备。

九、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 1937 年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同志时，谈到西路军失败的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张国焘推行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二是河西地区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差，地势又不好，这就是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这两条原因，曾在很长时期内被许多论著所采用。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除毛泽东指出的那两条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一是仓促上阵，西路军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无准备的情况下渡河西进，而长期盘踞河西走廊的马家军却早就做好了多方面准备，以逸待劳。再加上西路军在弹药、粮草方面得不到补充以及不了解河西走廊的地理民情，这就决定了西路军不可能长久地坚持。二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西路军胜利抢渡黄河后，在敌人四散奔逃，援军未到时，没有抓住有利战机，有效的打击敌人，反而由于战线过长，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三是在对敌政策上犯了右倾错误，幻想与马步青、马步芳达成妥协，而未能给敌人以可能的有力打击。四是西路军内部缺乏军事民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完全是由陈昌浩一人说了算，哪有不犯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道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任务多变，缺乏战场主动权。理由是，一西路军孤军进行外线作战，自始至终任务一再多变，致使西路军在行动上迟疑徘徊，陷入绝境。所以，中央军委在战略指导上负有责任。二是中央军委未给西路军领导以充分的战场主动权，使之不能集中兵力对敌，无法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三是中央军委对于蒋介石过于轻信，西安事变后，中央曾力图通过谈判，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西路军。事实证明通过与蒋介石谈判而援救西路军的做法是不现实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

十、对西安事变中国民党“讨伐派”的评价

西安事变发生后，对如何处理这一事变，国民党军政大员之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对张、杨诉诸武力，武力围攻西安，史称“讨伐派”。另一派则认为要尽量避免军事冲突，主张用谈判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被称为“和平解决派”。对于“讨伐派”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讨伐派”是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实际上是别有用心，有政治野心。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讨伐派”不应简单的彻底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讨伐派”的主张之所以能占据上风，一是其抓住了讨伐的理论根据。其为维护国民政府的所谓“威信”计，为整饬所谓被张、杨破坏的“纲纪”，不能不对张、杨诉诸于武力。二是以国民党元老派，蒋介石的嫡系以及地方实力派中的多数人所构成的力量，纷纷表示拥护国民党的决议，支持武力讨伐张、杨。再次，从“讨伐派”在救蒋中的作用看，其主张与行动的确在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其表现在：给张、杨两将军施加压力，使之尽快送蒋回南京；与蒋介石武力讨伐的主张配合得相当默契；还对宋氏兄妹赴西安救蒋给予相应的配合。最后，从“讨伐派”同日、汪的关系看，还没有足够证据说明其曾得到日本的支持以及准备联汪组织亲日政权。总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讨伐派”并没有借“讨逆”旗号，另有他图，而是千方百计地救蒋，并与和平解决派进行相应的配合，使两派“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大政方针逐渐趋于一致，可以说在营救这个核心问题上，两派实际上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十一、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由中国

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其根据是，从时间上看，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以前，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毅然同陈济棠谈判，使红军较顺利地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改变了过去共产国际只做下层统一战线的“左”倾统战政策，开始独立自主地实行上层统一战线政策。从内容上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以及对其采取的方针、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的。因此，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作用是主要的，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第二位的。

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作用不能低估，是第一位的。其理由是，1935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中共有直接影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参加七大，在七大精神的指导下，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七大后，共产国际又派张浩回国向中共传达了会议精神。而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内涵具体化，结合中国实际予以贯彻的作用也不能排除。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共产国际起了主要作用。在如何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独立自主的作用是主要的。

十二、对土地革命中“平分土地”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平分土地”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理由是：首先，我党对待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和列宁的态度是一致的。中共正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地主阶级”，才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的，而对于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认为“必须批判”。其

次，我们党制定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和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因此，不能把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和农民用平均主义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混为一谈。再次，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具有"反对整个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斗争的意义，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便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又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就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中共对农民平分土地要求的支持和赞助这个问题上，简单地加以否定是不恰当的。

一种观点认为，"平分土地"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其根据是：首先，要承认农民的平分土地的要求，实质上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土地分配上的反映和表现。这与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一样，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又具有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一面。其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再发生侵犯中农土地的严重现象，说明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党内、在干部中、在党的政策中的影响"确实存在，不能否认和低估。也说明了"平分一切土地"与"团结中农"的原则是矛盾的，并非一致，只要实行它，就必然发生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再次，我们党使用和实行"平分土地"的口号，并作为指导土改的一项政策，显然是不妥当的。这一口号，是党在土地革命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所提出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随着土地革命实践的深入和党对"平分土地"问题认识的发展，再继续使用这个口号，不但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而且还会造成实际工作中的错误。

十三、关于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查田运动是消灭封建势力，巩固政权的重要步骤。理由是，首先，从查田运动发动的背景看，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土地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加上“左”倾思想的干扰，不少地方有许多错划成分的，还有不少地方封建和半封建势力并没有肃清，一些基层政权不纯的现象还很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在中央苏区“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其次，从查田运动开展的情况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对于查田运动的意义、方法、步骤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进一步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清查隐蔽、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纠正错划的阶级成分；澄清阶级阵线，全面贯彻土地路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经济，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革命战争。对于一些地方发生的一些偏差，中央苏区又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及时纠正，这样使各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又迅速走上了正规道路。再次，从查田运动的结果来看，经过一年多艰苦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查出一批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纠正了一批错划阶级成分的中农，澄清了阶级阵线，进一步打击了封建势力，巩固了工农民主政权，支援了革命战争。

一种观点认为，查田运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逐步发展的产物。依据是：首先，查田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逐步发展的产物。王明教条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1930年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七月指示起草了一个《土地法(草案)》。这样，就使中央苏区以前的有关土地革命的重大成就和正确政策开始被置于否定地位，这就为苏区实行重新分田和后来发动查田运动，提供了依据。临时中央迁入苏

区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被否定，而其“左”倾错误的政策，却变本加厉地得以执行。因而查田运动的发生，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查田运动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利用当时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发动的，中共临时中央又是以政权力量加以贯彻的。再次，查田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运动中把许多中农和富裕中农上划为富农、地主而加以打击。同时还伤害了一大批干部。不少干部因对查田运动有看法，被清除出革命队伍。尤其是把查田运动与肃反检举搅在一起，使许多党员干部人人自危。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由于“左”倾政策断绝了他们的经济出路，结果导致许多地主富农被逼上绝路，上山为匪，给根据地带来危害和损失。破坏了农业生产。错误的政策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因此，应彻底否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查田运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始终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两者在出发点、指导方针以及具体政策上都有严重分歧，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情况，应具体分析。1933 年 1 月至 6 月为初期试点阶段，情况是好的，应予以肯定。1933 年下半年为全面铺开阶段，发生了较多“左”倾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1934 年上半年完全是“左”倾错误领导的，导致运动的失败，应予以否定。

十四、关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1. 关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性质，学术界有三种看法。

一种认为，改组派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在野派，或是国民党内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

政治派别，它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政治集团，实质上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另一种认为，改组派是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还有一种认为，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这种看法侧重于反映改组派的主要社会成份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2. 关于改组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改组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其政治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独立、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虽没有付诸实践，但与蒋介石的独裁政治相比较，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特别是其发动的反蒋斗争，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力量，有利于民众认识蒋介石政权的性质，为我党领导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造成了有利条件，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种认为，汪精卫等人本来就是国民党当权派，由于在内部权力斗争中两次败北，才变成在野派。他们只是为了恢复失去的当权派的地位，才组织改组派同蒋介石进行斗争，目的达到后，改组派也就消失了，由此可见，改组派从产生到消失，整个过程都沉浮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之中，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工具。虽然它在短暂时间内，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丑恶面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同其参加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给民族造成的灾难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改组派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是反动的、消极的。

十五、对国民党新军阀“二次北伐”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二次北伐”是一场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

旧军阀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其根本目的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蒋氏王朝的独裁统治，因此，根本不能与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相提并论。

一种观点认为，"二次北伐"赶走了奉系军阀，随后通过和平的方法使东北易帜，并使全国得到统一，客观上有进步作用，应予肯定。

十六、对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称之为"外交新纪元"的改订新约运动，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自主"，中国并没有实现独立、自主，仍然受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人民也仍然在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其理由是，从关税新约来看，国民党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仍没有改变列强在对华贸易上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如关税的征收除原定的值百抽五外，中国政府只能依据货物的品类、性质征收5—27.5%的附加税，这意味着国民党政府仍然无权自定关税税率。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权依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海关总税务司继续由英国人提任，掌握关税大权的英国总税务司，又听命于列强各国所组成的外交使团。各地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也几乎为外国人所操纵，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关务署形同虚设。因而，既无权自订关税税率和决定关税用途，又无法改变洋人把持海关局面，关税自主只能是形式而已。从废除领事裁判权来看，帝国主义列强则连形式上的让步也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依然享受着不受中国政府法律管辖的特权。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改订新约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理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废除一切不

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已经奋斗了将近百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建立初期，经过半年多的分别交涉，以正当的外交手续，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尤其是关税自主权，纠正了长期以来关税方面的两种不合理制度即均一税制和海陆关税不统一，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有了新的内容。税率的提高，不仅使国家的收入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对列强各国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极大的限制，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它减少了其在中国的一些特权，在客观上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十七、对国民党币制改革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其依据是：首先，法币政策使英美帝国主义攫取了中国的货币权，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从根本上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赁借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可以避免汇价涨落的风险，向中国倾销大量商品，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另外，在汇价稳定，投资利益有保障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更积极地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强其对中国财政经济的控制，保障其在华企业的垄断地位。其次，通过法币政策，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加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再次，国民党政府还利用法币政策，滥发钞票，向中国人民进行最直接的掠夺。随着钞票发行量的增长，物价日益上涨，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大为降低，国民党政府就是通过这些做法，把全国人民的财富大量集中到自

己手中，估计四大家族靠这次币制改革而夺取到手的白银就高达三亿盎斯到四亿盎斯，币制改革标志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其理由是：第一，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中国长期以来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直接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第二，币制改革，摆脱了世界银价的影响，稳定了国内金融，同时也使因白银风潮引起的群情恐慌心理逐渐消除，有利于"经济复兴"。第三，币制改革，废除了银本位制，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稳定了法币的对外汇价，提高了法币的信用，这对于稳定国内物价和促进国内贸易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第四，币制改革，实行白银国有，全国五亿盎斯白银集中到国民党政府手中，防止了无法控制的白银外流，保存了中国的资金。第五，币制改革后，国民党政府为缓和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效法英美，采取了货币减值政策，逐步增加通货流通量。第六，这次币制改革，在客观上对中国抗战是有利的。

十八、对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情况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1927—1937 年的十年间，中国的经济状况，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国民党新军阀连年内战的破坏和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呈现出停滞或倒退的 敝状况。首先，从民族工业来看，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统计表明，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新设厂数逐年减少，规模不断缩小，而旧厂改组、倒闭的数目却急剧增加。从而导致民族工业的衰退。从农村经济来看，在帝国

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摧残下，急剧地走向破产。帝国主义不但竭力向中国倾销农产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尽力排挤中国的农产品，从而导致严重的销售危机。国民党的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及地主，纷纷兼并土地，土地集中的趋势更加严重了。田赋征收额更是迅速的增加。再加上军阀连年内战对农村的破坏，使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农村，成为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十年期间对经济建设的投资不多，所进行的建设时间也不长，但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了极其缓慢的恢复和发展。其根据是：首先，从农业方面看，农业生产的产值有了缓慢的增长。以中国最主要的农作物为例，从1931—1936年的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其他农作物产量亦然。其次，从工业方面看，工业生产也处在发展之中（包括民族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以煤、铁为例，原煤产量十年内增长了大约73%，生铁产量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他工业，也同样有所增加。工业品总值十年内增加了86.1%。再次，从交通运输方面看，国民党政府建立初的十年交通建设在铁路、航空、航运、公路、电讯等方面，也同样有了某些改观。

十九、关于“中东路事件”

一种观点认为，“中东路事件”是中国军阀张学良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唆使下，发动的反苏、反共的挑衅行动，是反苏、反共的前奏曲。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东路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要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是一次爱国主义的行动。其根据是：一是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后发表了放弃沙俄政府迫使

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但在中东路问题上，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并未完全根除。二是苏联对中东路的管理权牢牢抓住不放，中苏共管只是一句空话。苏联把中东铁路作为它伸向东北地区的触角，并把铁路经过的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中东铁路已不仅仅是一条商业性质的铁路问题了。三是对于中东铁路大权旁落的情况，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漠不关心，熟视无睹。张学良掌握东北大权后，面对全国出现的轰轰烈烈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高潮的影响，在苏联以强硬态度完全拒绝中方代表提出的履行决议的正当要求下，加快了收回中东路主权的步伐，这是张学良的一次爱国主义行动。但是张学良在使用的方法和选择的时机上不合时宜，尤其是在日寇准备占领东北的时候，采用武力手段收回中东路主权，只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幸灾乐祸，以致于过早地暴露了东北军的弱点，恶化了同苏联的关系。

二十、关于福建事变发生的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福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权力之争引起的。其理由是：陈铭枢以打倒独裁，取消党治，反对外交为口号，其实质是要“谋自立政府”。

一种观点认为，陈铭枢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促使他成为事变的主要发起人，因而事变发动的原因主要是反蒋。其依据是：第一，十九路军反蒋渊源深远。第二，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与消灭异已的方针，迫使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十九路军在中原大战后，官兵已滋长了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浴血苦战，享有盛誉，而蒋介石却把它看做眼中钉，要将该军所辖三个师分别调征皖、鄂、赣三省，实行分割支解，逐个消灭，第三，十九路军矢志抗日的爱国

行动和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矛盾日趋激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抗日。理由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之间，在民族抗日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激化。他们之所以要反蒋，主要是反对蒋介石不抗日，尽管十九路军的反蒋也包括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集权派之间的矛盾，但这一矛盾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也只是占着次要的地位，而主要矛盾还是和蒋介石政府在抗日不抗日问题上的矛盾。十九路军的抗日要求和行动，不仅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且把他们调往"剿共"前线，企图借刀杀人，并撤销陈铭枢等人在南京政府的官职，以削弱其军政实力。这才迫使十九路军将士从拥蒋反共逐渐转化为联共抗日反蒋，直至发动福建事变，终于同蒋介石反动统治公开决裂。

二十一、对两广事变性质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成立"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出兵湖南，是以抗日为名，同蒋介石集团相对立，其实质仍然是一场军阀间的战争。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广事变不是一场军阀间的战争，而是带有进步的与革命性的事变。其根据是：第一，从事变的起因看，两广事变是在全国抗日潮流推动下发生的。它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进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中国

社会的矛盾发生了变化。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国内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国民党内有一部分倾向抗日的反蒋派别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不满。因此，两广实力派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他们举起抗日旗帜，要求抗御外侮，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第二，从事变的内容来看，两广事变具有反对蒋介石妥协投降的积极内容。两广特别是广西同蒋介石间固然长期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但这次反蒋行动却有顺应抗日形势，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和妥协投降的新内容，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第三，从事变的结果来看，事变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把原来对准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矛头，转而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实行对日妥协退让，实行投降政策的蒋介石。两广事变虽然没有达到使蒋介石立即实行对日作战的目的，但它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 投降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揭露。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少受了损失，使中国人民也避免了一场内战灾难，因而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全国各界抗日力量以极大的热情为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抗日助威，中国共产党对于两广事变也作出了热情的支持和极高的评价。第四，从事变的意义来看，两广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政策的制定起了促进作用，对广西以至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起了积极影响。不过，两广事变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是没有明确提出彻底的抗日纲领，特别是没有公开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

第三部分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概　　述

18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现代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此期间，由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加剧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上组织多次战役，抗击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壮大了人民的抗日力量。

第二阶段，1938年11月至1941年11月，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以后，日本改变了侵华政策，对国民党政府由开始的“军事打击为主，政

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蒋介石集团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活动进一步加剧,中国共产党担当了战略相持阶段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坚持和扩大了解放区,从而使解放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第三阶段,1941 年 12 月至 1943 年底,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中期,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这时国民党政日益腐败,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军事上连吃败仗,经济上四大家族的垄断和掠夺日益加剧,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解放区遇到的严重的困难,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第四阶段,1944 年初至 1945 年 8 月,是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和战略反攻阶段。1944 初,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了大反攻,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政府军队出现了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局面,此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蒋介石在美国挟持下,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从 1944 年起,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 年 8 月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攻入中国东北;美国在日本 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解放区军民展开全面反攻,终于使日本帝国主义于 1945

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必须掌握战争的全貌和战争的发展规律，同时要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要抓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弄懂弄通。

（1）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及罪行。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据此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在这场战争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野蛮性、疯狂性、残暴性，为人类文明史抹下了可耻的一笔，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2）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给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以广大深刻的影响，开创了举国一致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3）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性选择之后走向了成熟。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及时制定了适合抗日战争客观规律和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虽历经种种困苦，但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4）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性表现及其统治的日趋腐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是有一定功劳的，但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国民党的

两面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对日作战虽也组织过一些战役，但在总体上越来越消极，对内采取了积极的反共方针，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事件，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反动，经济上的垄断，加上军事上的溃败，从而使国民党统治日趋腐朽。

(5)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和重大意义，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经验。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共产党制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的正确指导，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证明，要战胜凶恶的帝国主义，必须依靠正确的领导。

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基本问题解答

重要名词：

卢沟桥事变 亦称“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从 1937 年 6 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县附近连续进行挑衅性演习。7 月 7 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第三营，在营长金振中带领下，不顾国民政府

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抵抗。从此，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淞沪抗战 又称“八·一三”上海抗战。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自卫抗战的声明，并且组织了有效的抵抗。淞沪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作战。先后参加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达70万人。此次抗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到11月9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日军以死伤5万人的代价，用3个月的时间，于11月12日占领了上海。淞沪抗战虽然失败，但在抗战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一桩骇人听闻的大惨案。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进行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被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全市有三分之一的民房被焚毁。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性，疯狂性，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决。

忻口会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组织的一次对日著名战役。忻口是山西北部通往太原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国民党政府参战部队达10余万人，由第14集团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任总指挥。八路军9个团也参加了会战。会战从1937年10月13日日军5000人进攻忻口西北侧阵地南怀化开始，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在激战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祺等英勇牺牲。忻口

会战中，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在敌后阻击援敌，牵制了大量日军。忻口会战是华北正面占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激战 20 昼夜，歼敌 2 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洛川会议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是全面抗战；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会议指出，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关键是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 12 日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共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委罗荣桓；一二 0 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委关向应；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改编以后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争，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深入发动群众，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和整风运动；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的斗争，战胜了重重困难，粉碎了日、伪军的反复“扫荡”。1944 年，开始进行局部反攻，1945 年 8 月，进行大反攻，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平型关大捷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伏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37 年 9 月，侵入山西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向晋北的屏障雁门关及其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一举突破晋北防线并占领太原。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于 24 日埋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待机歼敌。9 月 25 日拂晓，敌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 21 旅团，约 4000 人的兵力，进入设伏地区，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歼敌 1000 余人，缴获了大批枪弹、火炮、车辆和军用物品，取得了歼灭战的辉煌胜利。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抗战建国纲领》 193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的。纲领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七项内容，它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纲领，规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的内容，如提出“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设立国民参政机关，改善各级政治机构，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等等。另一方面，却规定民众的抗日活动只能在“各战区司

令长官指挥之下”进行，人民民主的权利只能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政治上只是设立“咨询”机构，而不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制度等等。所以这个纲领是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纲领，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本质的区别。

台儿庄大捷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是徐州的重要屏障。1938年3月23日，日军第10师团向台儿庄进攻，中国守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以40万大军的优势兵力包围了进攻台儿庄的七、八万敌军，并击退增援板垣师团的日军。至4月6日，取得了歼敌2万余人的胜利。台儿庄大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是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设立的一个属咨询性的机关。国民党员在参政会议中占绝对多数。国民参政会议的职权起初有三项，即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听取政府报告及向政府提出咨询方案；政府重要施政方针实施前，应提交该会决议。但在通过后还必须再经“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通过，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颁布命令行之。”国民参政会基本上是国民党控制的机关，而不是真正民意机关。但它给了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是有利于抗日和民主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参政会被国民党利用和控制，失去了团结抗战的作用，变成了国民党粉饰专制统治的一个御用工具。

武汉会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武汉地区进行的一次大会战。会战在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展开，

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的广大地区，从1938年6月开始到10月下旬武汉失陷，激战四个多月，中国共动用110万兵力，日军35万兵力，日军伤亡达20余万人，中国军队损失40万人。中国军队虽因消极防御而失败，但武汉会战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从此，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曲线救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投降派的一种降日反共的谬论。国民党指使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一旦日本战败时，国民党投降部队立即宣布“反正”，乘机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配合国民党主力部队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这种降日反共谬论被诡称为“曲线救国。”至1943年8月，国民党投敌的文武官员中，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投敌的军队多达50万人。他们甘作侵略者的帮凶，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论持久战》 为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明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文章具体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时代及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论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指出日本是小国，地少、物少、兵少、经不起长期战争，日本发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中国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进步的正义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因此，中国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

泽东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动员人民，充分发挥其抗日的积极性，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的科学论断，从思想上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

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位于河北省易县境内。1941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七连六班在反“扫荡”中，在狼牙山阻击日本侵略军 3500 人的进攻，掩护我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打击敌人，并且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全班战士经一天苦战。毙敌近百人，在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情况下，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带领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以英勇献身的精神，一步步把敌人引向悬崖。最后在弹尽路绝的情况下，砸坏武器，纵身跳崖，被赞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这一壮举，表现了八路军战士英勇作战，威武不屈，舍身救国的抗敌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的象征。全国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狼牙山建立了纪念碑。

《新民主主义论》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光辉著作，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规律，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不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分界线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还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并且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

点和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

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向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大规模战役。为了打破敌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调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平古、白晋、德石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沿线两侧据点发动攻击，并配合根据地抗日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在连续3个多月的战斗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拔掉敌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公路共计1970公里。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但这次战役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使敌人集中兵力，对华北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扫荡”，致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

减租减息 简称“双减”，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而制定的属于统一战线性质的土地政策。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地提出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切实保障农民的承佃权。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一般减为社会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第二，实行减租减息后，又需交租交息，并保证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

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根据中央这一决定，各根据地迅速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也为后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抗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1941 年为了战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解放区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向解放区发出"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1942 年 12 月，又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人人动手，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迅速掀起了大生产热潮，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创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以自给为目标，发展了农业和部分工商业；机关和学校也积极参加了生产运动；农民也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中央领导身先士卒，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克服了财政困难，减轻了人民负但，改善了人民生活，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并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

三三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为调节各抗日阶级的政治利益而采取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实行专政。三三制规定，在政府和各级参议会里，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政策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

位，同时又紧密地团结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并争取了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调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

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整顿党内作风的运动。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克服了“左”右倾错误，发展成为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形势的迅速变化，对于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还来不及作彻底的清算，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吸收了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把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因此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情况。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2 年 2 月，毛泽东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在全党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发毖后，治病救人，既要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整风运动经历了全党学习、自查、批评帮助及党员登记几个阶段。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加团结，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民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的经验，是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的最好形式。

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

思想。它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于本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在十年内战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和党的一些卓越领导人的著作中，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中国之命运》 由陶希圣执笔，1943年3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一本反共反人民的小册子。该书宣扬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割据"、"新式军阀"，并狂妄地宣称在两年之内决定中国之命运，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该书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坚决批判，揭露了蒋介石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共面目，在思想战线上给予第三次反共摩擦以沉重打击。

赫尔利 (1883—1963)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人。1944年9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来华，11月，曾到延安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同年底，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主张中国共产党以交出

军队为条件来参加国民党政府。1945年4月，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抹煞我党的地位，极力为蒋介石捧场，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1945年11月被迫宣布离职回国。

《日汪密约》 1939年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的卖国条约，包括12月30日在上海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内容主要有：(1)割让中国东北给日本，定蒙疆(指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2)汪伪政府自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3)汪伪军和警察由日本供给武器并加以训练；(4)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农交通事业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5)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皖南事变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期间蓄意制造的一起企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共事件。1941年1月6日，新四军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正副军长带领下，向北转移，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上官云相部8万多人的突然包围与袭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失利。参谋长周子昆等3000余人壮烈牺牲，4000名战士不幸被俘，2000多人先后突围。项英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谈判被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接着，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共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发动强大的抗议运动，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诬蔑和反动命令，组织力量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委派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组

新四军军部，扩大新四军主力，坚持斗争至 1943 年 3 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推行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措施。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华北占领区的殖民统治，1941 年 3 月，在华北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该运动的实施纲要为：加强华北伪组织的统治力量和范围，剿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封锁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三类地区。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傀儡政权，用并村、连坐法等加强其统治和掠夺。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同时拉拢投敌分子，强制居民迁往治安区，制造无人区，并在该区修筑碉堡、岗楼，实行严密的封锁。对非治安区实行“三光”政策，以“扫荡”为主。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共进行了五次“强化运动”，给华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中共的领导下，华北抗日军民经过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应英国政府请求，出兵缅甸，配合英军的对日作战，远征军包括第 5、6 两军和暂编 66 军，以罗卓英、杜聿明分任远征军第 1 路正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前后共两次。第一次 1942 年 2 月至 6 月，防卫滇缅公路之战。在缅北同古保卫战中重创日军，在仁安羌战役中为 7000 名英军解围。由于作战准备不足，中英两军协同作战不够，各自为战，从而造成了中国远征军重大损失。由 10 万人下降到 40000 人。第二次 1943 年春至 1945 年 3 月，打通中印公路之战。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

军再次入缅与盟军协同作战，在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地，向日军发动进攻，歼灭日军两万多人，有效地牵制了日本在缅甸方面的预备队，减轻了盟军在其它战场的压力，打通了中印公路，收复了缅北，支援了整个缅甸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族人民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号召下，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在艰苦的斗争中壮大成长。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了建立抗日联军的工作，后在战斗中统编为7个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第七军军长李学福。东北各抗日部队领导人联合发表《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决定将东北抗日武装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军，部队发展到11个军，全军约45000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加强领导，又将各抗日联军合编为第一、二、三路军。东北抗日联军转战各地，发动群众，摧毁敌伪政权，破坏交通线，惩办汉奸卖国贼，牵制了日本侵略军在关内和其他战场发动的进攻，有力的配合了正面战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给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　全名为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1942年10月9日，美国副国务卿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的文告，面交中国驻美大使，不久中美中英就签订新约问题，在重庆举行谈判。在

谈判期间，由于日本于1943年1月9日与汪伪政府签订参加“大东亚战争”共同宣言和《关于交还租界及撤销和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而加快，1月11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条约内容为：英美取消1901年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美国、英国政府，在北京签定的议定书，放弃在中国领水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运之特权。中英、中美旧约的废除，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坚持抗战的结果，也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是新约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如英国拒绝交回香港、九龙，美国人在中国触犯刑律，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等。

豫湘桂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队在平汉、奥汉、湘桂铁路沿线抗击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战役。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的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援救南洋战场，向国民党战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战役首先在河南进行，日军作战部队5、6万人将汤恩伯、胡宗南40万大军打败，仅一个多月，河南郑州、洛阳等重镇和38个县相继陷落，损失达20万人。5月下旬，日军12万人进攻湖南，陈诚、薛岳部国民党军三倍于敌，但仍是一触即溃，长沙、衡阳等地相继失守。9月开始，日军总兵分三路进攻广西，到11月，相继侵占了桂林、柳洲、南宁等重镇。日军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计划，这次战役，从1944年3月到12月，国民党损失兵力60余万人，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和贵州省一部，其中有146个大小城市、7个航空基地，36个飞机场，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洗劫。这次战役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与危机。

白求恩 (1890—1939)生于加拿大。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外科医生。1936 年 8 月，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亲率医疗队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由美国和加拿大人组成的医疗队于 1938 年初来到陕甘宁边区。同年 4 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为中国的抗日军民服务。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以精湛的医疗技术，深入前线，为八路军救治伤员，同时，培养了大批医疗工作人员。后因抢救伤员中毒，于 1939 年 11 月 12 日在河北省完县黄石村逝世。被誉为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

《鲁迅全集》 1938 年 6 月至 8 月，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全集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叙三人起草编辑、计划，以鲁迅生前手订的“三十年集”编目为基础，再加许广平搜集的翻译部分，依各书的性质分为三十册。由胡愈之主持的“夏社”印行。版分甲种纪念本、乙种纪念本、普及本三种版本，前 10 卷为创作，后 10 卷皆为翻译。

《新华日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开出版的中央局机关报。1938 年 1 月 11 日，在武汉创刊，同年 10 月，迁至重庆。该报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映人民的要求，揭露国民党反共分子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行径，鼓舞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联系群众，坚持抗战的有力武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结束以后，1947 年 2 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停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

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引言和结论。这两次讲话被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明确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讲话》解决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讲话》还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的辨证关系。这一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历史文献。

问　答　题:

1. 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经过。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新的进攻,华北局势危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感召与影响下,1936 年 12 月,发生了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

张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及其后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为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在五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激烈斗争，全会最后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

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2月中旬到9月下旬，同国民党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多次正式谈判。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分析了我国面临危亡的严重形势，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8月，蒋介石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2天，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宣言和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2. 试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的基本政治形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八年抗战由此全面开始。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国际国内出现了复杂的政治形势。

在国际上，德、意法西斯国家坚决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早在1936年11月，德、日两国就订立了反共协定。次年11月，意大利加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军事同盟，德、意两国

为了分散英、美的力量，达到霸占欧洲的目的，极力支持日本对中国扩大侵略战争，并积极向日本提供军火援助。英、美对中国人民的抗战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幻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中国和东方的革命力量，把战争引向苏联。因此，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一直在"中立"和"不干涉"的幌子下，纵容日本的侵略政策。

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一开始就给予广泛的同情和积极的支持。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多次号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向中国人民提供援助。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援华运动。苏联基于反法西斯的共同利益，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采取了积极的援助措施。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仅在舆论和道义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中国的抗战。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还以各种方式，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国内，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卢沟桥驻军奋勇抗敌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群众纷纷动员起来，共赴国难。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巨大浪潮的推动，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从而确立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13日，淞沪会战拉开战幕，国民政府决心武力抗战，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至此，全国上下基本形成了一致对外抗日的政治局面。

3. 试述抗日战争中国共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二者的根

本分歧及其不同结果。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实行的是由政府及其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战役的持久消耗与敌抗衡，以阵地战为主，缺乏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以独立自主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为主，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根本分歧在于所依靠的作战对象不同。国民党所依靠的作战对象是政府和军队，没有去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而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是全民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利用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抗衡，有其广泛的群众性。

不同的抗战路线取得的抗战结果也各不相同。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广州失守的 15 个月里，国民党政府由于采用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尽管其作战比较努力，然而，综观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它又是失败的。在这 15 个月中，先后丢失了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在华中丧失了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在华南丧失了广州地区。1944 年在豫湘桂战役中，更将豫、湘、桂、粤、闽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沦入敌手，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造成了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和领土大片沦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八路军、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不仅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而且使自身力量得以迅速壮大，八路军

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人，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牵制敌人兵力达30万人以上。对于停止敌人的战略进攻，促使相持阶段的到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4. 比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什么新的特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两次国共合作的目的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为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国家独立为主要任务。

第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共同的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却始终没有形成共同承认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只是采取遇事协商解决的特殊方式维系两党的合作。

第三，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强大的力量。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而其内部存在着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斗争。

第四，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同盟者。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于国际帝国主义间矛盾日益尖锐的年代，它的形成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力量。因而，这次合作不仅得到苏联等各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得到与日、意、德有尖锐矛盾的英美等国的支持，具有广泛的国际同盟者。

5. 试述《论持久战》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抗战以及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国民党政府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宣扬“再战必亡”论。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宣扬“速胜论”，妄图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战胜日本。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速胜论”一度风行。“速胜论”在共产党内也有影响，使一些人产生了轻敌思想。

为了总结抗战开始后的经验教训，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其主要内容有：

(1)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分析了战争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指出：中国的抗战必然要经过一段艰难困苦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没有根据的，是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2)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的发展过程。指出：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根据各阶段的具体情况，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是战略的反攻战。

(3)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这样才能争取最后

胜利。

《论持久战》的发表，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

6. 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寇加紧诱降和英、美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集团的反共投降活动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都为抗战的前途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深表关怀和担忧。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猖狂进攻，打破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道路"的幻想，引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从 1939 年 10 月到 1940 年 1 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和著作，从理论上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其主要内容有：

(1)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革命的主要方法和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革命，以农村为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2)精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

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3)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4)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指出："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

经济纲领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允许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

文化纲领是：发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这对于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伟大的意义。

7.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什么变化？它是怎样在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的？

由于中国人民的坚持抗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

决"的战略和短时期灭亡中国的幻想，迫使它不得不下决心应付持久的战争。这样，日本在占领武汉以后，便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转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新的策略方针，即"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在政治上，以反共为诱饵，拉拢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军事上，将进攻重点放在解放区，集中日伪军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对付抗日军民；在经济上，对占领区实行疯狂掠夺，搜刮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的统治是异常残酷的，1938 年底，日本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1941 年春又扩大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强化法西斯的保甲制度，采用"圈村"、"并村"，建立伪地方组织等手段，加强对广大人民的残酷统治。在华中，华南地区推行"清乡运动"。日伪军配合向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建立起"军肃清地"，在这些地区内，日伪军进行大规模的"肃清战"。日寇妄图通过"清乡运动"强化江南的伪政权，消灭作为心腹之患的新四军，榨取江南的财富。

日寇在沦陷区除了实行残酷统治之外，还实行奴化教育。大力破坏中国文化教育，严加控制教材，充实奴化内容。强制学习日语，推行奴隶文化政策。企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使占领区人民变成它的驯服工具，借以达到巩固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对沦陷区进行政治上残暴统治和文化上的奴化教育和同时，在经济上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在金融方

面，工矿业方面，农业方面，日本侵略者都进行了大肆的掠夺。日本还在占领区大量掠夺劳动力到日本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

日本侵略者残暴的军事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并没有达到巩固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

8. 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哪些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了很多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7 年 10 月，八路军 115 师主力南下，留下的部队由聂荣臻率领，留守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北岳根据地，同时，冀中党的地方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辟了冀中根据地。1938 年 1 月，建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5 月，晋察冀的宋时轮纵队挺进冀东，开展平原游击战，将山地与平原连结。至此，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晋绥抗日根据地：1937 年 10 月，八路军 120 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晋西北根据地。1938 年 8 月，120 师一部和地方武装挺进绥远北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晋西，115 师主力在罗荣桓的率领下，进入吕梁山区，9 月，建立了晋西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开辟，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7 年 11 月，八路军 129 师进入

太岳和太行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 年 5 月，徐向前率 129 师和 115 师一部进入冀鲁豫地区，先后消灭伪军六七万人，建立了包括 30 余县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两个根据地的建立，为统一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山东抗日根据地：1937 年冬至 1938 年，中共先后在天福山、徂来山、牟平、清河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鲁南、胶东、清河根据地。1939 年，又建立泵泰山，沂水等根据地。3 月，八路军 115 师主力进入鲁西，增强了山东的抗日力量，对于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在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的同时，新四军也向华中敌后挺进，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军受到极大威胁，牵制了大量敌人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对于停止敌人的战略进攻，促使相持阶段的到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9. 说明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发挥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对日作战中形成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战场。两个战场互相依存，彻底粉碎了日军企图 3 个月至一年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首先，就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来讲：(1)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

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从抗战爆发至1938年底，日军虽然取得军事上暂时的胜利，但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伤亡达44万人，被牵制的兵力达70万人以上。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大大增强了日本国内的困难，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2)客观上掩护和支援了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开辟。战略防御阶段，日军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进攻目标。国民党军队虽然溃退千里，但它抗击和牵制着日军的主要兵力，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3)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尚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两个战场互相配合，坚持抗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其次，从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战场来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使日军受到极大威胁。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歼敌5万余人，牵制敌人兵力达30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壮大和发展。八路军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人以上。对于制止敌人的战略进攻，促使相持阶段的到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10. 说明国民党政权日益腐朽的原因和表现。

日本在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等阶段。从此以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政权政策的改变，以及这个政权的

阶级本质所决定，使这个政权日益腐败。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陷入了全面危机。

在政治上，蒋介石集团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蒋介石本人独占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等党政军要职，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国民党设立了庞大的特务机关。1942 年，又同美国勾结成立了法西斯特务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介石集团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大量的监狱和集中营。大批的共产党人、革命青年、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遭受囚禁和残酷屠杀。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全国普遍加强了农村的保甲制度。在这种反动统治下。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财产和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同时，国民党加紧了投降反共的罪恶活动，从 1939 年 12 月开始，到 1943 年 7 月，国民党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调集数十万大军进攻、包围和封锁解放区、密令各战区停止对日作战，以全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秘密指使大批军队投降日寇，协同敌军进攻解放区。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3 年 8 月，国民党先后投敌的中央委员 20 人，高级将领 58 人，军队 50 多万人，占 80 万伪军的百分之六十二。

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然仍承担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使得它的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腐败透顶，不堪一击。1944 年 4 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打通从中国的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寇使用的总兵力不过 20 万，而国民党近百万大军却一触即溃，造成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的第二次大溃败。从

4 月到 11 月的 8 个月中，国民党损失兵力达五、六十万，先后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其中有 146 个大小城市，丧失国土近 20 万平方公里，使 6000 万同胞沦为亡国奴。这场大溃败，彻底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腐朽、没落的本质。

在经济上，国民党反动集团利用其政权，假借“抗日”的名义，大发国难财。他们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进一步发展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国民党实行的“田赋征实”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搜刮农民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使广大农民过着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他们采用“调整”等手段。大肆兼并民族工业，使民族企业破产，工厂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操纵着国家的金融，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对劳动人民的浩劫。四大家族采用所谓“统制”的手段，强化了对商业的独占和垄断，大搞黑市交易，从中牟取暴利，危害国计民生。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而广大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则日益陷入贫困化的深渊，人民群众的生活痛苦到了极点。

综上所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由于在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军事上的溃败，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标志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陷入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

11. 简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民主运动出现的原因和主要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运动，主要是指抗日战争后期

的人民民主运动。抗战后期，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走向高潮，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

第一，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加强专制独裁统治，表现在蒋介石利用全民族抗战的时机，建立和强化了个人独裁统治。他先后兼任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数职，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大独裁者。国民党拒绝任何民主改革，使国统区变成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在这里，特务组织、监狱、集中营遍及各地，他们非法抓人，施以酷刑，任意杀害。同时，保甲制度森严，各级官吏为非作歹，广大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

第二，在经济方面，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垄断更加集中，国统区工农业生产日益　敝。抗战爆发后，四大家族凭借其政治特权，大发国难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金融方面，8 年共发行纸币 103190 亿元，造成通货膨胀。1944 年底，国统区的全部银行各项存款总额中，“四行二局”所占比例高达 92%，操纵了国家金融。工业方面，1943 年，孔家“中国兴业公司”资本达到 12 亿元，1944 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超过了 4700 万美元。与此相反，民族工商业到抗战胜利时绝大部分陷入困境，在农业方面，在田赋征实和农产品统制下，国统区农业萧条，生产下降，广大农民痛苦不堪。

第三，在军事上，1944 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由于国民党推行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导致了军事上的严重失败。从 4 月中旬到 12 月初，短短 8 个月中，国民党百万大军，在日军 20 多万人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丢弃了 20 万平方公里领土，损失军队五六十万人。

上述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重危机，深刻反映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整个国统区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这就是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高涨的根本原因。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主要情况是：广大工农群众首先展开了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争取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斗争。1944 年 7 月，河南湖北等地农民举行暴动，并且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打垮了前去镇压的汤恩伯部队，陕南等地也暴发了农民起义。与农民暴动相呼应，工人斗争也发展起来。1944 年 11 月底，重庆人力车工人抗议特务暴行，举行了罢工；1945 年 3 月，重庆工人和市民 20 万人举行示威。民族工商业者也进行了斗争。1944 年 5 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致书国民党，提出“生产自由”，“取消统治政策”等要求。其次，爱国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投身于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1944 年 1 月，黄炎培在重庆召开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提出要求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等十项主张，赢得全国各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在广西 1944 年 6 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败，柳亚子、李济深等联合进步文化界人士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号召动员民众抗战，铲除失败主义；在昆明，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教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反对专制、宣传民主。文艺界也确定“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西南、西北等后方的大学生也行动起来，要求民主，积极抗日。所有这些 都预示着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目标，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夺取抗战的胜利。

12.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和党的一些卓越领导人的著作中，具有多方面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概括地说，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国民革命时期，在十年内战时期开始形成，大体上是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开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既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此期间，开始形成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因此，从 1927 年到 1931 年，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时期。从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在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 1939 年到 1940 年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阐述了：(1)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前途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说明；(3)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解决了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得到发展。以其独创性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

的指路明灯。

13. 为了克服抗日战争中的严重困难，中共采取了哪些措施和制定了哪些政策？结果怎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1941年到1942年，由于日寇对我解放区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加上华北地区的连年自然灾害，解放区出现了抗战以来空前严重的局面。解放区面积缩小了，华北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八路军人数减少了十万，根据地人口下降了一半。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克服这些严重困难，中共中央主要采取和制定了以下的措施和政策：

第一，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开展整风运动，统一全党的思想，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严重错误倾向，使中共成为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担负起战胜严重困难的关键环节。整风运动的方法是通过对党中央规定的文件的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以达到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为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在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1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荒种地，是大生产运动的模范。部队、机关、学校都掀起了生产高

潮，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43年，边区粮食达到了自给有余。陕甘宁边区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炼铁、炼油、修造机器等重工业。轻工业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穿衣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大生产运动克服了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在根据地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和参议会里，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按照这一原则建立的政权，加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四，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种土地政策规定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减租办法，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从原租额中减去25%，利息一般在减息后定为年息一分左右。通过减租减息，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同抗日。

第五，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充实连队，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简政，就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精兵简政在各根据地取得了很大成绩。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1941年各精减了24%，1943年又精减了35%，并建立了各种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通过精兵简政，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政府机关的行政效能，减轻了人民负担。

以上各种措施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为战胜严重困难，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

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4、说明党的“七大”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大会听取了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的突出特点是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第三、大会听取了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七大”的意义：(1)大会总结了党领导民主革命 20 多年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的马列主义路线。(2)克服了党内的错误，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3)“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5. 说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人民长期独立地抗击着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协同战斗，迫使大量日军陷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并使日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陷入极大困难。它彻底粉碎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迷梦，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对日本的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第二，中国的抗战有力的支援了苏联对德作战，配合和支援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大量兵力、财力、物力资源。打乱了日本大本营的作战部署，使其迅速征服中国并与德国会师，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陷于破产，它打乱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也使日军大批作战部队的南进大大推迟，不仅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而且减轻了英、美在太平洋作战的压力，为以后同盟军的反攻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有力地支援了东南亚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第三，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重要战场之一。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牺牲最大，抗击日军最多。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到 2100 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 1000 亿美元。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6. 分析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经验，具体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中国抗日战争在这方面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之所以能一时得逞，主要在于国民党推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民族抗战始终是整个抗战中国共两党的主题。虽然有摩擦和斗争，但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国共双方共御外侮，终于取得胜利。

第二，人民战争是以弱胜强的重要法宝。抗战的经验证明，只要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抗日斗争，实行人民战争路线，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可以战胜。

第三，国际援助也是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尽力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起奋斗，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孤立和反对共同的敌人，减少中国抗战的困难，加速胜利进程。

第四，增强物质基础是赢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军事力量的强大取决于国力的雄厚，日寇在中国的一时逞凶，在于物质准备的充分；日寇最后的失败也在于财力、物力的枯竭。中国一时的困难，也是物质的困难，中国抗战的胜利，也是由于物质力量的不断增强。可见，贫穷落后就要挨打。

第五，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就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打破了

中国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局面。血洗了百余年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侵略的斗争勇气。

其次,抗日战争既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再次,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战场是世界四大战场之一,中国长期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打乱了日军北攻苏联,南进作战的战略部署,不仅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而且减轻了美、英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压力,支援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战略上和战役上有力的配合和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学术研究中一些争议问题简介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1937 年 7 月 7 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理由是:首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其次,中国共产党倡议和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七七事变后能迅速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都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再次，卢沟桥事变前夕，国民党领导集团除了一小部分亲日分子外，已经感觉到不能照旧执行妥协退让政策。事变后，终于实行了政策转变。拥有300万军队的执政党——国民党的政策的转变，对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应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其依据是：首先，从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来看。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从此，中国已逐渐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中国人民与一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变为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一直延续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也就是说：七七事变前后的十四年间，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应把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端。其次，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通过决议，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组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也投入了抗日战争，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再次，毛泽东于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详尽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也把这段时间称作"抗日时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应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其根据是：首先，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看，"一二九"运动是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它提出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

治主张，集中反映了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二九"运动是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大风暴的起点。其次，从"九一八"事变来看，中日民族矛盾一直未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限于东北，还未危及英美在华利益和国民党的根本利益和统治，因而，英美及国民党都把日本占领东北看成是反苏战争的准备，所以，英美对日采取默许，袒护和纵容态度，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也携手合作，对日一昧推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内进行疯狂的"安内"、"剿共"，使几度兴起的抗日运动，都被镇压下去。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号召全民族抗日，但因面临蒋介石对根据地的疯狂围剿，只得将主要任务放在粉碎反革命围剿，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上。再次，从华北事变来看，中日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1)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实行吞并中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华北事变不仅使整个华北名存实亡，而且危及全民族生存，使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上来，党领导全国民众掀起的全国规模、持续不断的抗日爱国运动，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形势的主流。(3)英美帝国主义、国民党亲英美派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亲日派的矛盾日益扩大和加深。因而，对日态度开始转变。(4)内战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共产党方面来看，西安事变前，共产党虽然被迫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但其直接目的已不是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而是围绕中日民族矛盾，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抗战这一中心工作进行的。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西安事变前，蒋介石虽然实行其内战政策，但同时又主动

派人与中共进行了几次接触和谈判，这些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再者，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失败，是华北事变后的必然结局。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这种惩罚和嘲弄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已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

第四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始于"七七"事变，其理由是："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战争，需要考察它的全部过程，包括它的发生、发展和结束。抗日战争全过程可分为地区性抗战和全国性抗战两大阶段，但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从东北开始的，所以，中国的抗战也应是从东北开始的。而"七七"抗战，不过是"九一八"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和扩大。"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来决定它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东北地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就全国范围来看，还是局部的，不能由此来决定当时全国的历史时期的性质，因为这时的主要矛盾还是阶级矛盾。而"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整个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内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于是抗日战争时期正式开始了。

第五种观点认为，全国抗战应以"八一三"事变为起点。其依据是：首先，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信号，其全面侵华野心的暴露有一个发展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很短暂。同样，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政府对

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一个由妥协到决心抗战的形成过程。“七七”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全面侵华的步伐。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通过了派兵提案，决定动员40万日军扩大侵华战争，在向华北推进的同时，又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两天后，日本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北，日本妄图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殖地民的野心也就暴露无遗了，全面侵华战争就正式开始了。其次，一般来说，判断一个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是否开始实行全面抗战，首先要看两点，一是全国人民是否普遍要求抗战。二是国家执政党是否实行抗战。而第二点是更重要的标志。“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对日妥协。然而面对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怒潮，国民党当局不敢作出对日投降的决策。蒋介石庐山谈话，虽然表示准备抗战，但同时又声明“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日本政府根本不理睬一切和平建议，按其吞并全中国的既定方针进行。日本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严重侵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推动和督促，以及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逼迫，国民党于8月14日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至此，国民党政府才真正下决心武力抗 战。

二、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方式的实质是“一国两制，”其根据是：首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两种武装力量的合作。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敌后战场，起到了战略上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在军队领导权上，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但实际保存了

我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其次，国共两党政权的性质截然不同，操持着中央政权和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国民党，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由于实行民主制度，所建立的各级“三三制”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阶层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再次，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也有着本质的区 别。在国统区，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不顾百姓死活，借抗日之名大发“国难财”，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法西斯主义、封建复古主义泛滥，进步文化受到压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使人民生活得到相当改善。在党的领导下，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普遍开展，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等。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国民党统治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式就表现为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国共双方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

一种观点认为国共两党的统治地区是存在着两种政治性质、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指出了两种制度和平共存的可能性。但是抗日战争时期，并不存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平共存的事实，因为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摩擦是不断发生的。

三、关于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准备工作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在抗战前的长时期内，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抗战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其理由是：第一，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六年多时间里，国民

党不顾全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强烈要求，集中全力围剿共产党和红军，这就将中国抗战中本来固有的许多有利因素大大削弱了。第二，对当时国内存在的经济衰败、民生 敝、政治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以及国民党军队腐败，战斗力低下等诸多不利因素，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第三，在抗战前基本没有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国防建设。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对日作战有一定准备。其理由是：(1)整顿江海防要塞。蒋介石于1932年10月，命令军委会第一厅在四十个月内完成要塞整理工作，限于1935年底完工。(2)划分国防区域，构筑国防工事，蒋介石在1934年2月，命令参谋长部“务限本月内将东南国防计划北至海洲、徐州、归德，南至温州、漳州之计划制成”，同年3月，蒋介石在批示1934年国防大纲时，将全国划为沿海、沿江、沿陇海线、沿京沪杭线等十个国防区，并扼要构筑国防工事。(3)着手国防建设，发展为战争服务的经济事业。如成立了资源委员会，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要任务，加强铁路、公路的建设等。

四、对中日力量对比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其根据是：首先，从空军来看，据统计开战前，日军拥有2700多架飞机，而中国军队的飞机仅有600架，且战斗机只有305架。日本飞机的战斗性能比中国强。因此，战场上的制空权为日军所控制，这对于中国军队威胁极大。其次，从陆军来看，敌人的枪炮质量远比中国军队精良。以战车为例，日军每个师团配备战车24辆，而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仅有三个营。以火炮为例，中国军队每师号称有各种炮40多门，其中迫击炮仅

30门,因此,中国军队同日军作战,白天在敌人的炮火压制下无法开展进攻,而多依靠夜战。再次,从海军来看,日本海军有190余万吨,而国民党仅有11万吨,因而,根本无力保卫沿海港口和江防。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一直是拥有足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条件,中日双方力量是旗鼓相当。其理由是:从武器装备上看,当时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总体上相差不多。日军一个师团,步枪9476支,掷弹筒576具,机枪645挺,火炮108门,战车24辆。而国民党军队一个师,步枪3821支,掷弹筒343具,机关枪328挺,火炮46门,这就是说,国民党军队两至三个师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从军队数量来看,国民党军队的总人数和师数,比侵华日军总人数和师团数多得多。以1937年底的统计数字来看,国民党军队约170万人,日军仅为50万人,双方数量比为3.4∶1。且每次会战,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均几倍于敌。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许多战役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武装不如敌人,而是由于其统帅部和高级将领害怕敌人,自已首先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

五、正面战场溃败的根本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导致国民党战场惨败的根本原因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结果。其理由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某些进步,但对于其"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这种不要民众参加,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的单纯的政府抗战,是正面战场失败的根本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正面战场大溃败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其理由是: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扩大特务组织,

强化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利用政治经济特权，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造成国统区民生 敝。在军事制度上，军民对立，官兵对立。由于国民党军队军纪十分松驰，扰民、害民事件层出不穷，人民对它切齿痛恨。压迫人民，脱离人民，这是国民党军队失败的根本原因。

六、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抗战思想的形成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七”事变到淞沪战役结束。国民党实行和平谈判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第二阶段是淞沪失守至南京沦陷，国民党开始认识到战争的长久性。淞沪失守，日军直逼南京，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和平解决战争的企图，迫使国民党认识到战争已转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旷日持久战。但它战略上并未认识到持久战方针，在具体的战役上也没有正确运用持久战的战术。第三阶段从南京失守到武汉保卫战的结束，国民党持久抗战思想基本形成，其依据是：(1)国民党从京沪失陷的惨痛教训中，逐渐认识到主动积极防御的重要性和作用。(2)1938年1月，蒋介石提出了主动进攻的积极防御思想，国民党在作战部署上也作了些调整。(3)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战争进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第二时期。军委会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今后要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的长期抗战的基本方针。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基本上执行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但有一个从战役持久到战略持久的发展过程。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多次讲要进行持久战，但事实上，

从开始到南京失守，国民党时时都在为尽快结束战争而努力，所谓“持久消耗战”其实质是试图用阵地消耗战、战役持久战达到战略速决的目的。其依据是：(1)制定阵地消耗、战役持久的方针。国民党为等待国际干涉，采用与日军拼消耗的阵地持久战。(2)仓促开辟淞沪战场。国民党声称在华东与日军持久作战，开辟了淞沪战场，但这却是地道的速决战。(3)幻想与日妥协。上海南京沦陷，国际干涉无望，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中日战争在实践上已演成持久之势，国民党被迫进行长期战争，从而，在战略上被迫从战役持久向战略持久转变。一方面调整战略部署，开始实施持久战略。一方面从理论上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以及敌败我胜的战争结局作了论证。这时，国民党认识到了中日战争的长期性，明确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决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

七、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以及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国民党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较为积极的联共抗日逐渐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上。其理由是：首先，在1939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设立防共委员会的决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具体政策，仇视共产党的情绪逐渐上升。其次，将大量部队用于对付华北、华中、华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进攻，制造多次反共摩擦事件。再次，消极对敌，避战观战，对日作战次数逐渐减少，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逐渐由敌后战场担负。

第二种观点认为，担负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相持阶段进行了整训，使部队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作战

能力有某些提高。正面战场的"冬季反攻"和几次较大的战役，抵抗了敌军的进攻，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战局和敌我相持的态势，牵制了大量日军并使其受到一定打击，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总之，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可以说得失相当，利害兼半。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有限度进攻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因而给日军以较大的打击，这表明国民党抗战仍较为积极。但其坚持既抗日又反共，对日军既抵抗又动摇的政策，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在中国战场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主战场的时候，却在我国抗战中降为次要战场。而1942年后，国民党战场与日军呈现两不相扰的状态，表明其抗日积极性的消失。

八、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转变的时间

一种观点认为，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正规军到分散使用的游击部队，由运动战到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军事转变。其理由是：1938年2月日军直下临汾、风陵渡等地以后，国民党军队已基本上退出山西。此后，八路军即主要依靠分散的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4月，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了日军三万多人的"九路围攻"后，使华北各地游击战争得到更广泛的发展，标志着八路军在华北实行战略展开任务的完成。

第二种观点认为，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完成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这个转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守。这一时期，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作战的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各作战部队都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

战。而这一个时期的游击战争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还没有做到以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为主的阶段，所以，在太原失陷前，我军只是开始执行了向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转变，但没有完成这个转变，第二阶段，从太原失守后到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太原失守后，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但是，对了对付敌人大规模的进攻，我军的活动还是比较集中，还不能认为是分散使用的游击军，从作战形式来看，这一时期，我军虽然进一步开展了游击战争，但为了粉碎日军大规模的进攻，仍把运动战作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所以，这一时期，我军仍没有完成战略上的转变。第三阶段，从粉碎日军围攻到 1938 年 6 月。粉碎日寇九路围攻后，我军在华北地区建立起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山区根据地，我党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八路军作了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这样，八路军按照向平原分兵的作战需要实行了新的编组，打破了原来的正规编制，把原来较为集中使用的正规部队变成若干分散活动的游击支队，各游击支队的活动都有充分的独立性。这样，我军就由原来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分散使用的游击军，而且游击战也成为我军作战的基本形式。因而，这一时期我军才完成了战略转变。

第三种观点认为，1938 年 10 月我党完成了这一战略转变。从抗战爆发到太原失守，八路军以主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这是第一阶段。从太原失守到 1938 年 4 月，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和晋东南等地区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 1938 年 4 月至 10 月，八路军挺进河北、河南、山东平原地区，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实际上初步实现了战略转变。

但就全党而言，认识还很不统一。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才从思想上逐步提高了全党对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认识，而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最终使全党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完全一致。至此，中国共产党才最后完成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

九、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根据是：第一，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动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协助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最根本保障。第二，共产党是抗战的政治领导者和思想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抗战胜利的道路。广大工农群众、中间阶级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有力地领导了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所有的伪军，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其理由：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和推动其它党派、团体接受这些主张，实行这些主张。因此，在宏观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是起了政治领导的作用。

第三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国民党领导的。其理由是：(1)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是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2)国民党有300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几万工农红军和南方游击队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从以上两点来看，全国统一政府和统一军队的建立，只能有一个指挥系统，即国民党政府的指挥系统。(3)我党我军当时制定的一系列方针、作战计划、命令等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后方能实施。如百团大战作战计划，八路军总部先报告了白崇禧。

第四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首先，在政治上，国共两党各自发表了自已的纲领，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在军事上，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重要国防会议，国民党领导的重要战役也接受了我党运动战的思想。在组织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和政治部门也有我党代表在其中工作，我们党也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其次，抗日战争中，存在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防御阶段国民党战场起主要作用，相持阶段敌后战场起主要作用。再次，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只是提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没有明确提过抗战是我党领导的。

第五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有个转移过程，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掌握着领导权，其理由是：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书》，而且还

组织了一系列会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锐气，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严重阻击了日军的进攻。这对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以及华中、华南敌后游击战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卢沟桥事变到广州、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是鲜明的，进行战略防御的行动是积极的，在抗战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属于领导地位。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者。其理由是：(1)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2)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人民军队已成了战胜日军、恢复失地的主力军。而国民党军队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方针，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开始下降，(3)在国民党军发起的一系列反共摩擦被击退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从国民党转归于共产党，并且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加以确定。

第六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因而抗战的领导权必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其依据是：首先，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双方都作出了重大牺牲。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没有一个共同纲领，根本谈不上共同领导。再次，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各自都是独立地领导着自已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皖南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项英。首先，项英在执行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指示的过程中反复动摇，犹豫不决，结

果贻误了战机，给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造成可乘之机。其次，选择茂林这条绝路，项英应负主要责任。尽管皖南新四军丧失了北移的最后时机，但是如果北移路线选择适当，新四军还是可以避免遇难的。再次，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其表现为：第一，在部队转移过程中，项英分兵南进。第二，全军到达茂林之后，在发现前有国民党军拦击的情况下，没有下令继续移动以摆脱敌人，而是宣布原地休息一天，导致国民党军大量集结，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第三，在突围过程中，项英拒绝军长叶挺的正确意见，优柔寡断，放弃星潭，功亏一篑。第四，在部队陷入重围的紧要关头，项英不仅未能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相反却一度放弃领导责任，背离军队私自离队，使皖南全党全军顿失重心。

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造成的。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项英。因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早已确定，无论新四军如何选择北移路线和时机，都无法防止这次摩擦事件的发生，所不同的只是事变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程度的区别，而项英在处理皖南事变中也是有错误的。在北移中，项英对复杂形势分析上的失误，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没有充分的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在顽固派发动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减轻部队在事变中的严重损失。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的重大损失，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但从主观方面检查，与项英受王明的右倾错误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项英强调华中特殊性，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局限于皖南狭小地

区，处于敌顽夹击的不利地位。其次，丧失了北移的有利时机，再次，选择了错误的行动方向和路线。

十一、百团大战是否该打

一种观点认为，百团大战应该打，其理由是：首先，百团大战是根据我党的主要政治任务所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1940年以来，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蒋介石对抗战更加动摇，从而导致全国抗战中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危机日趋严重。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周恩来提出了在军事上“击敌和友”的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的完全赞同。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的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造显著成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激励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成为当时党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其次，1940年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严峻形势也表明，百团大战需要打。当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推行“囚笼政策”，除对根据地“扫荡”外，还在其周围构筑碉堡，进行封锁，使各根据地处于严重的收缩状态。百团大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因而，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已成为华北八路军势在必行的紧迫任务了。再次，百团大战的目的在于调动敌人，打乱敌人在华北的部署，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的主动权。第四，为了揭穿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人”的谎言，争取中间势力，有必要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性战役。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动百团大战是值得研究的。其理由是：第一，正确估计1940年夏秋国际国内形势，是判断百团大战是否正确，是否必要的前提。在这一时期，抗日形势虽然一度出现危机，但是，其并不象我们估计的那样严重。这种过分看重当时的形势，想用大规模的进攻手段来拖住国民党顽固

派，有没有必要发动是值得研究的。第二，正确估计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是正确规定战役目标的客观依据。百团大战提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完全是在进攻意义上提出的，忽略了华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因而，虽然在战役发动初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并未能巩固，并且原定的战役目标也没有实现，使得解放区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战略进攻遭受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十二、对减租减息政策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减租减息政策是必要的让步。首先，减租减息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有着根本的区别。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消除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第二，减租减息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的气焰，提高了农民的地位，从而调动了广大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减租减息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

第二种观点认为，减租减息政策实质上是一种革命与改良相结合的政策。从革命性来看，表现在我党采取这项政策是为全民族的利益，它能够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又能够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这对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夺取抗战的胜利是有利的，并为以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奠定了基础。从改良性来看，表现在它只是削弱了封建势力而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减租减息政策是一种过渡的改良的革命政策。从过渡的政策来看，原来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封建剥

削，通过减租减息适当地削弱了，从而为以后过渡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奠定基础。从改良的政策来看，它只是限制了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只是适当地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没有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是在分配范围内适当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革命的政策来看，在当时实行这种改策，既能发动广大农民，又能联合地主阶级，有利于团结全民族各阶级合力抗日，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夺取抗战的胜利。

第四种观点认为，减租减息是最革命的政策。其依据是：第一，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减轻了封建剥削，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正是由于广大农民积极参战，才奠定了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第二，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促进了根据地生产事业的发展，这不但改善了群众的生活，而且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战争。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各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争取抗战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第四，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使根据地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大大削弱了封建势力，为以后在土地改革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铲除封建势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十三、关于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

一种观点认为，长期以来把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多半是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为根据的，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其理由是：首先，《论持久战》中三阶段说仅仅是毛泽东对战争趋势的预计，但它难于、也不可能与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论持久战》中的分析和结论，

从历史进程的实际出发，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其次，1944 年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未能形成全国战场的战略进攻。1944 年解放区战场在战胜严重的困难之后，转入局部反攻，各解放区战场的进攻都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中国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不仅有解放区战场，还有国民党战场。而国民党战场在解放区战场展开局部进攻的时候却正面临着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因而，1944 年未能形成整个抗日战场的反攻局面。再次，对日本侵略者的大反攻是在日本政府决定投降后进行。从解放区战场来看，1945 年 8 月 9 日，延安总部发表了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 日和 11 日朱德向解放区军队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解放区军民才展开全面反攻。从国民党战场来看，蒋介石也于 8 月 11 日发布一系列命令，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支持下，也迅速向敌占区前进。然而，在中国军队全面反攻之前，日本政府已于 8 月 9 日决定投降并于第二天发出投降通知。由此可见，中国军队的反攻实际上是在日本政府决定投降之后，也就不可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一个阶段。

第二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其理由是：首先，从当时的战略决策来看，1944 年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广阔的解放区战场上进行了局部反攻。同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1944 年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开始战略反攻，但局部反攻是历史事实，而全面反攻是先从局部开始的。其次，从局部反攻与全面反攻的关系来看，1944 年的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是为全面战略反攻创

造条件的。抗日战争时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相持阶段之后，从各根据地举行的局部反攻，过渡到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而这是符合一般的战争规律的。再次，从战略反攻的性质来看，1944 年我军的攻势作战，不仅从敌后战场和某些战略区看来是具有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就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因为当时解放区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1944 年我军局部反攻大量地消耗和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使日军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我军的局部反攻是战略性的。而国民党军队，不仅当时没有反攻，就是直到日本投降，始终都没有进行过反攻。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战略反攻主要表现在我军的作战行动上，而不能以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为转移。另外，从国际援助的条件来看，1944 年我军开始的战略反攻也不是完全没有国际条件的。苏军在欧洲战场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对我军实施战略反攻无疑是一种国际援助的条件。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如果过分强调国际条件，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是不能正确反映我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

十四、日本投降有无条件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投降是无条件的。日本法西斯军事力量在中国人民和苏联红军以及英美盟国的沉重打击下，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侵略战争再也无法继续下去。8 月 14 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

美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代表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即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其理由是：首先，1945 年 6 月 18 日，杜鲁门总统及其阁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了曾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于 1945 年 5 月上旬草拟的保留日本“天皇制”的宣言，这使日本有条件的投降成为现实。其次，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中、美、苏、英四国，在给瑞士驻美公使代办葛拉斯理的复文中，一方面，要“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主义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宣言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发施号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另一方面，复文暗示接受日本保留天皇的要求。再次，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天皇在防空洞里召开的御前会议哀号“关于国体，敌方既已承认；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基础。解除武装是难受的；但为了国家与国民幸福，必须用明治大帝对待三国干涉的心情来干，希望赞成此意”。至此，日本天皇颁发了《停战诏书》，宣布投降。

十五、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远东政策的评价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远东对日本侵略采取纵容、绥靖政策。其理由是：(1)“七七”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在 7 月 13 日的声明中表示它对中国发生的“冲突”采取“友好的、公正的态度”，不肯宣布日本为侵略者。(2)1940 年夏，美国在日本一面继续对华进攻，一面趁机南进，威胁美国在华利益的情况下，仍然幻想牺牲中国和亚洲其他弱小国家利益，同日本妥协，使日本的侵略矛头转向北方，引起苏日冲突。1941 年 2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日本建议举行“调整邦交”的美日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一再向日本表示好意，竭力避免同日本摊牌。美国取消禁止锌、橡胶运往日本及中国沦陷区的许可制度的命令，并表示“目前美国政府无意禁止石油运往日本”。甚至暗示可以和日本缔结反共同盟，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给日本以援助。而对中国，则施加压力。(3)美国政府在多次截获日本密电的严峻时刻，仍被自己长期推行的绥靖政策所束缚，寄希望于谈判。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十二小时之前，还亲自致函日本天皇，请他一同寻求驱散乌云的办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绥靖不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前对日政策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理由是：首先，美国从“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出发，在远东太平洋采取战略守势，这种战略守势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远东战略始终蒙上了绥靖色彩。其次，美国的远东战略目标是把日本遏制在“一定范围内”，尽量推迟和避免日美战争，为美国赢得更多的战略时间，以便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作最后决战。为实现此目的，美国对日采用经济制裁、援华援苏、与日谈判，三管齐下。虽然美国也打算作一定让步，但这种让步并没有越出“远东的历史格局”所允许的范围，也就是以不动摇华盛顿体系为极限。再次，美国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军事潜力强大的国家，罗斯福是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美国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时处在扩张的势头上，两强相逢，势在必争。所以，美国决不会在日本进攻面前自动放弃对远东太平洋霸权的争夺。

第三种观点认为，太平洋战争前，随着日本侵略步骤的加快，美国政府的政策，逐步趋向限制，直至禁止即对日限制说。其理由是：从美国对日政策上看，“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

后，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讲话，号召社会联合起来“隔离”这些病人，接着，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与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原则不符”。在1938年6月，美国政府又向制造商和出口商提出，不要向侵略国出口飞机、飞机零件、发动机、武器、炸弹、鱼雷等。1939年，日本南进企图已隐约可见时，美国在7月通告日本，有意废除“日美通商条约”，并于1941年1月取消了此约。1941年7月，罗斯福“下令冻结所有日本人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石油输往该国”，给日本这个石油消费量88%依赖进口的国家以致命打击。从美日谈判来看，这是美国企图与日本实现妥协的表现。对这一问题，必须进一步的分析。首先，美国的整个战略是“先欧后亚”，所以，美国力求在太平洋地区用外交求妥协，以便腾出力量去对付德国。其次，日本发动侵略之初，美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公开摊牌。当时，“美国的军事建制继续削减，以至全国兵员还少于福特汽车厂工人”，所以美国需要时间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加紧发展军事力量。由此可见，美国和日本的谈判，是一种策略上的妥协，是为了争取时间。因而，在中国抗战初期，美国的基本方面是和中国人民一起站在反法西斯一边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日战争初期，美国为了垄断寡头的利益，摆脱经济危机的冲击，打着“中立国”的旗帜，纵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理由是：在道义上纵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院于8月、9月、10月，连续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并未企图对争论之是非曲直下一判断……适应中立法之问题仍维持现状”。美国这种对侵略者持中立态度的作法，实质上是对侵略者的鼓励。其要害是要日本不得违背九国

公约中“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干涉日本侵略中国，但是日本不得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在具体行动上以大量战争物资卖给日本。从1937年到1939年，美国在日军需品进口总额中每年均占34.3%。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前的四年多时间里，美国卖给中国的军火总值仅有1.7亿美元，而1940年一年卖给日本的军需品总值就高达20亿多美元，这就证明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不偏不倚的。在政策上实行出卖中国抗战的“远东慕尼黑”政策。1940年日本趁英美忙于欧洲事务无暇东顾的时机，积极推行其南进政策以夺取英、美、法、荷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殖民地时，美国为自己的利益，力主牺牲中国，与日妥协，以此达到日本放弃南进政策的目的。从1941年4月到12月，美日进行了历时九个月的谈判。在此期间，美国向日本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是一份迫使中国投降日本的方案。其最本质的两项内容是“美国努力促使蒋政权与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它暴露了罗斯福以牺牲中国抗战来达到与日妥协的利己主义立场。

第五种观点认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华政策实行的是一种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对中国抗战表示低姿态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却把中国当成避免日美冲突的筹码讨价还价，对日实行姑息政策。其理由是：从低姿态的同情和支持来看，“七七”事变后，日本的进攻严重威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客观上使美日矛盾尖锐化。因而，美国不能不对日本进行某种形式的抵制。从1937年10月，罗斯福发表的著名的“防疫”演说到美国务院公开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从1938年9月，罗斯福发表禁止美国商船向中国和日本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到

1939年底对日本的"道义禁运";从1940年初,美国正式中止已经到期的日美通商和航海条约到1941年夏,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和完全切断对它的石油供应。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从本质上讲,是美日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抗战也起了同情和支持的作用。从对日实行姑息政策来看,"七七"事变后,好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不仅不采取积极措施援助中国抗战,甚至想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换取与日本妥协。这样,美国一方面不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的愿望,只要不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为此,美日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谈判。另一方面,美国源源不断地向日本输送战略物资,日本所需的战略物资橡胶、铜、锡、石油、棉花以至废钢铁,多数都靠从美国进口。其结果,起了鼓励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作用。

第六种观点认为,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远东政策是以华制日。其依据是:中国既是美日争夺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国用来对抗日本的重要力量。罗斯福政府并不打算也不愿意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相反,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从1940年下半年起,逐渐在财政和军事物资上加强对中国的援助。1941年1月,罗斯福派助手到中国,了解一旦和日本开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中国"。1941年夏,美国空军使团到中国,研究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和帮助中国训练空军等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利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来牵制日本的南下,把日军的主力钳制在中国,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十六、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

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政府改变了过去对蒋介石政权的现实评价,使蒋从原来的"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

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变为“统一和避免中国抗战工作陷于混乱的最大希望”。美国这种政策转变的标志，就是撤回史迪威，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其理由是：赫尔利在出任驻华大使后，美国政府对其使命和应执行的政策都作了明确规定。“第一，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第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第三，使蒋委员长和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第四，增进中国境内战略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第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总的精神是“扶蒋反共”。由此可见，史迪威离华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意味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开始。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其标志应是赫尔利1945年4月2日讲话。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大肆污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统一的障碍”，并公开宣称“美国不同中共合作，只同蒋介石合作”，“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转到错误的轨道上去。

十七、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的对华政策

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对华政策是根据苏联本身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1)苏联只援助国民党，不援助中国共产党。(2)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完全不考虑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满足苏联的战略要求。(3)在中国人民抗日最艰苦的年代，苏联还不断地进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活动，甚至发展到伙同帝国主义进行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活动。

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政府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作同希特勒德国从西方威胁苏联一样，坚决站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一边，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苏联军事顾问和苏联空军志愿队陆续来到中国抗日前线，并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也并非不想从军事上增强中共的抗日力量。其理由是：1937 年 11 月王明回国前，斯大林要王明转告中共中央必须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建立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独立部队，必须建立"现代战争之神"的炮兵部队。为此，苏联准备帮助八路军建立制造、修理武器弹药的兵工厂。苏联还设想将援助国民政府的军事武器，抽出 1/5 或 1/4 交八路军、新四军使用，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939 年夏，苏联再次向国民党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则电令正在莫斯科的孙科"如再有人提议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产党之说"，要"严词拒绝，切勿赞同"。

第四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概　　述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是国民党统治走向彻底崩溃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定胜败的斗争，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内容。这个时期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是从抗日战争到国内战争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围绕着抗战胜利果实归谁所有和建立什么国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在政治、军事诸方面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既有和平谈判，又有武装斗争，时谈时打，谈判与战争同时进行或交错进行。

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帝极力帮助蒋介石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便变中国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坚持独裁卖国的内战政策，依赖美国的援助，加紧部署内战。同时发动和平攻势，玩弄反革命两手，中共中央清

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概，充分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8月，毛泽东等应邀去重庆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重庆谈判中和会谈纪要发表后，国民党军不断向解放区进攻，人民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犯，同时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1946年1月，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并通过五项协议。但蒋介石背信弃义，马上撕毁协议，在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内战。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解放区始终没有放弃自卫战争的准备，集中地进行减租、生产、练兵三件大事，并重新开始土地改革，从而有了粉碎国民党进攻、保卫和巩固解放区的根本保证。

二、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是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凭着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援助，疯狂进攻解放区。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又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到1947年夏，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丧失了巨大有生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不但在军事上打了败仗，而且由于最后关闭了谈判大门，召开伪国大和制定伪宪法，政治上也更加孤立。随着全面内战的进行，国民党大量出卖主权换取美援，国统区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并且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表明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三、1947年7月到1948年夏，是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6月，刘邓大军主力在晋西南渡过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实行外线作战，迫使蒋介石国民党转入全面防御，解放军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进攻。经过一年的作战，蒋介石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准备。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为夺取全国胜利共产党在军事、土改、整党、经济、统一战线各方面的纲领和策略。到1948年7月，已在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内彻底完成了土改，极大地调动了解放区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国民党为了挽救其覆灭的命运，1948年7月，发布了所谓的"戡乱令"，对国统区人民展开了疯狂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美帝国主义这时也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并实行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发展的新的侵略阴谋。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统区的人民运动，在中共领导下，出现了新的高潮，工人、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全国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都给反动派以打击。各民主党派反蒋斗争的新发展和新政协工作的开展，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壮大。

四、1948年秋到1949年10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和建立新中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共不失时机地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全国革命这时

已处于胜利的前夜。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统区的经济体系也走向总崩溃，它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的进程，当国民党反动派陷于四分五裂、面临总崩溃的时候，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蒋介石又发动了“和平攻势”。但由于他们坚持与人民顽抗到底的反动立场，这次“和平攻势”也只能以破产告终。1949 年 4 月 21 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 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 22 年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中国大陆全部解放。

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及胜利后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必要的准备。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6 月，毛泽东发展《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也纷纷研讨新中国的各项政策，积极参加筹备建国工作。

1949 年 9 月，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民族、各地区代表和特邀代表，在北平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基本问题解答

重要名词：

重庆谈判　指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加紧准备内战，一面伪装和平，于 1945 年 8 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谈判。中共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于 8 月 28 日从延安到达重庆。国民党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同共产党谈判，但一切提案都是由中共提出。经过四十三天谈判，于 10 月 10 日双方签订了《中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却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不久，蒋介石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彻底暴露了其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双十协定 即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因纪要在 1945 年 10 月 10 日签订，故名《双十协定》。协定列入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召开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权、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 12 个问题。在国民党同意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并承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前提下，中共表示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但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公布不久，便被蒋介石公开撕毁。

上党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粉碎国民党政府军进犯的战役。1945 年 8 月中、下旬，国民党政府军山西军阀阎锡山，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调集第十九、十一军共五个师 17000 余人，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的率领下，从临汾、浮山、翼城突然侵占晋冀鲁豫

解放区的长治地区，企图控制晋东南。为了保卫晋东南根据地，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3万余人，在5万余民兵的配合下，从9月10日起，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发起了上党战役。这次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敌3.5万余人，俘敌将官27名，其中包括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一二·一”运动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5日，昆明市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派军队包围会场，放枪恫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各校学生联合罢课表示抗议。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西南联大校舍、师范学院两处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伤10余人。惨案发生后，重庆、成都、上海、延安等地都以集会、游行示威和通电抗议等形式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这个运动很快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军事斗争。

较场口事件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较场口制造的一起践踏民主、殴打爱国群众的事件。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等五项协议。2月10日，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国民党反动派派特务暴徒进行捣乱、破坏。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和新闻记者60多人也被打伤。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协议，坚持独裁内战的真实面目。

中美商约 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于1946年11月4日在南京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名义上

是商约，实际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条约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受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开入中国对外国不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条约实际上是要中国对美国实行一切开放。这是战后美帝奴役中国、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最严重的一个。条约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制宪国大　国民党违反政协协议擅自召开的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1946 年 11 月 15 日到 12 月 25 日在南京举行。按照 1946 年初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后，才能召开。但国民党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并为发动内战取得美国的援助，不顾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反对，非法召开了国民大会。这次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是国民党党员。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12 月 25 日“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实质上是恢复了《五五宪草》的总统独裁制，因此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2 月 28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各人民团体也表示不予承认。

李闻惨案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指使特务机关杀害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暴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

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46 年 7 月 11 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7 月 15 日，闻一多在主持完李公朴追悼会后回家途中，又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惨案发生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均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行径。全国各界人民也纷纷举行集会或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爱国民主党派之一。主要由国民党中、上层爱国民主分子组成。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中爱国民主分子于 1943 年开始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开展抗日民主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民联、民促先后在重庆、广州正式成立，参加反对内战和争取人民民主的运动。1947 年底，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香港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联合组成民革，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 16 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于 1948 年元旦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同年 5 月，响应中共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1949 年 9 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团结、推动其成员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民主同盟　简称“民盟”。爱国民主党派之一。其前身是 1939 年 10 月各中间党派在重庆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 年 3 月，改组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黄炎培担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后由张澜继任)。1944 年 9 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5 年 10 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协商国是，建立联合政府和普选产生国民大会代表等政治主张，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1948 年 1 月，民盟在香港举行了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临时总部。1949 年 9 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团结、推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莱芜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莱芜地区粉碎国民党军队进犯的一场战役。1947 年 1 月底，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 30 多万人，沿陇海、胶济铁路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企图夹击并消灭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华野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决定放弃临沂，以两个纵队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蒋军；另以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桥，伪装主力将要西进；主力 7 个纵队则秘密向新泰、莱芜两侧集结，求歼北线蒋军。蒋介石错误地断定华野将向西转移，严督北线军队南下。华野从 2 月 20 日到 23 日，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南下的蒋军李仙洲部，全歼六万余人于莱芜县城以北地区，生俘李仙洲等 20 名将官，收复城市 13 座，使鲁中、渤海、胶东、滨海四个军区连成一片。莱芜战役创造了解放战争开始后一次歼敌七个整旅的辉煌战绩。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统区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日益高涨。1947 年 5 月 4 日，在中共领导下，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提出“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各校学生立即罢课抗议。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纷纷派代表到南京请愿。5 月 20 日，

请愿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同日，天津举行游行示威的学生，也被国民党军警打伤50余人，以上被称为“五·二0”血案。血案发生后，中共领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各阶层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继续深入发展，遍及全国60多个城市，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二·二八”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在台湾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台湾省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行凶殴打烟贩，并开枪打死市民一人，激起市民公愤。28日晨，台北市民举行示威抗议，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废除专卖制度，反对贪官污吏，反动军警用机枪扫射群众，打死3人，打伤多人。惨案发生后，更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因而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几天之内，起义人民就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内战前线抽调两个师、一个宪兵团，从3月8日起，对起义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被屠杀的台湾人民达3万多人。起义遭到失败。但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的统治，直接配合了大陆的解放战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又称双十宣言。由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10日发表。《宣言》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包括打倒蒋介石的独 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愿通商友好条约等。《宣言》概括了中共在

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订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共16条，主要内容为：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允许中农保有比贫农更多的土地。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耕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贫农及其他贫民，也给地主同样的一份；确认各级农民大会、贫雇农大会及其委员会为土改合法执行机关；保护工商业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大纲》是一个彻底的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颁布后约一年，解放区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这对发动群众巩固后方，支援革命战争，解放全中国，都起了极其重要作用。

币制改革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而采取的措施。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其要点是：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00万折合金元券一元的比价收兑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拥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逾期一律没收；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限制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蒋介石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若干管理区，派要员以特务警察等法西斯暴力手段强行推行这一措施。这次币制改革，是对广大人民实行的又一次大掠夺，使财富进一步集中到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手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总纲领。1947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1948 年 4 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辽沈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战役前，国民党卫立煌集团共 55 万人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地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集中了 70 余万兵力，于 1948 年 9 月 12 日到 11 月 2 日进行了辽沈战役。解放军首先攻占锦州，全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集团，迫使长春守敌军长曾泽生部起义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投诚；接着在黑山、大虎山全歼从沈阳西援之敌廖耀湘兵团；最后解放沈阳和东北全境。这次战役共歼敌 47 万余人，为解放平津和整个华北打下了基础。这次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从而使解放战争五年胜利的预期大为缩短。

淮海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到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行动，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到 1949 年 1

月10日，进行了这次战役。国民党军刘峙集团八十余万人集结在徐州附近地区，企图守住中原，防御江北，屏障南京。解放军首先歼灭从海州西撤之敌黄伯韬兵团于碾庄圩；继歼由豫南来援之敌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再歼从徐州西逃之敌杜聿明集团于永城地区。在这一战役中共歼敌（内有四个半师起义）55万多人，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南京，上海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慑之下。

平津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领导的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联合进行。战役前，驻守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60余万人，在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夹击下，连遭挫败，是从海上南逃还是西窜绥远，正在犹豫不定。为此，中央军委迅速制定了稳住敌人，不使逃跑，分割包围，就地全歼的作战方针。解放军首先将敌人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据点，截断其西窜南逃的通路；接着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置北平守敌于绝境，最后迫使北平守敌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平津地下党组织深入敌人心脏，精确掌握敌情变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52万多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胜利前夕召开的。会议批准了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的决议，批准了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报告指出，全国胜利后，国

外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号召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报告是夺取全国胜利和准备革命转变的伟大纲领。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于 3 月 25 日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国共和谈　1949 年 4 月，由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这次谈判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土崩瓦解，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举行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是这次和平谈判的决定性条件，与此同时，中共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并郑重提出了中共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伪总统，并宣称在中共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1949 年 4 月 1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反复商谈，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 8 条 24 款。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最后修正案。但在预定的 4 月 20 日，南京政府秉承蒋介石，拒绝签

定，从而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谈的虚伪性，4 月 21 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 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谈阴谋的彻底破产。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 年 6 月 30 日，为庆祝中共成立 28 周年，毛泽东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文章阐明了在我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基本任务；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阐明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这篇文章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政治协商会议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区别于 1946 年 1 月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故名新政协。早在 1948 年，中共就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新政协筹备会于 1949 年 6 月在北平举行。同年 9 月 21 日到 30 日，举行了第一届全体会议。它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以北平为新中国的首都，并改名为北京。会议发表宣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 年 9 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但仍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在中共领导下，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发挥作用。

《共同纲领》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 年 9 月 29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除序言外，共分七章六十条，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共同纲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1954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批判《白皮书》 美国国务院于 1949 年 8 月 5 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叙述了从 1844 年到 1949 年间的中美关系。它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 1949 年 5 年间，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所以这个白皮书在客观上成为一篇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自供状，成为对中国人民很有教育作用的难得的反面教材。因此，美国白皮书发表后，新华社先后发表了六篇文章(其中五篇是毛泽东写的)，对白皮书进行了批判。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揭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人民事业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逻辑和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的逻辑，驳斥了艾奇逊把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侵略美化为友谊的谎言，批评了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从而驳斥了艾奇逊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人口太多和西方影响的谬论。对《白皮书》的批判，教育了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们，清除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从而为新政协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准备了思想条件。

问　答　题：

1.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怎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上，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世界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战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帝国主义国家被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经济和军事实力空前膨胀。这时，它在所谓反对苏联威胁的烟幕下，疯狂地抢夺中间地带，蛮横地干涉别国内政，在世界许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妄图取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独霸世界；在中国，它推行扶蒋反共政策，支持国民党政府，妄图变中国为其附庸，成为国际反动势力的中心和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与此同时，世界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苏联经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严峻考验，东欧、亚洲相继建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民主运动，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国际进步势力迅速发展，要求和平、民主、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一股时代的潮流，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国内，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经受了考验，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中共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120 万党员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解放区已拥有 1 亿人口，120 万正规军和 220 万民兵，国统区的爱国民主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这表明，争取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抢占地盘，忙于“劫收”“收复区”，从而在国内出现了美蒋勾结和蒋、日、

伪合流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准备进攻解放区的严重形势。这时，蒋介石还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进行和平欺骗，企图麻痹人民。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总之，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则坚持内战独裁卖国政策，要使中国仍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样，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内战的阴云正弥漫在中国的上空。

2.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建国方针怎样？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实质和焦点是什么？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建国方针是，勾结美帝国主义，坚持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巩固和发展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妄图继续使中国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针是领导中国革命人民，坚决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各民主党派是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道路，而是主张和平建国，幻想通过和平道路，推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建立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比如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完整方案，第三党呼吁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中国人民救国会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的主张等。

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实质是战后中国政权的性质问题，即战后的中国究竟是要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斗争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3.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经济方针和军事原则是什么？

全面内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形势，曾引起了国内许多人的迷惘。为此，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我们不但必须要打败蒋介石，而且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战略上，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增强了革命人民敢于胜利的信心；战术上，毛泽东也规定了一整套具体的政治、经济方针和军事原则。

政治方针是，必须和人民群众密切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具体规定：在农村中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打倒地主阶级，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恶霸分子相区别；在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经济方针是，必须作持久打算，力戒浪费，努力生产。只有一切依靠自力更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4. 为什么说国民党的“制宪国大”是一党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

全国内战爆发后，1946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蒋介石国民党在南京擅自召开了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企图为其反动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然而，这次“制宪国大”是一党的、非法的和分裂的“国大”。

因为根据 1946 年 1 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通过的政协协议及其规定的程序，国民大会的召集应在和平环境中，由改组后的政府负责召集，由各党派共同参加，而且国大通过的宪法应是政协审议完成的草案，召集的日期亦应由各方协商确定。

而蒋介石一手包办的这次“制宪国大”则是在全面内战已经爆发的战争环境中召开的；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拖延、阻碍、拒绝改组他的独裁政府，正是由这个丝毫未经改组的政府，擅自召集了这次“国大”，反倒是“国大”召开后，他才导演了“改组政府”的丑剧；参加这次“国大”的 1381 名“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圈定和贿选出来的国民党党员和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反动政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及少数“社会贤达”如王云五、傅斯年等人，而中共、民盟等民主党派和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这次“国大”；“国大”召开的日期，是在 1947 年 7 月 3 日由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决定的，并未与其他党派协商；这次“国大”制定的“宪法”，实质上与《训政时期约法》一脉相承，是“五五宪草”的翻版，根本不是政协审定完成的宪法草案。因此，这次“国大”的非法召开，所制定“宪法”的强行颁布和实施，只能导致各派政治力量的分裂。所以周恩来评论这次“制宪国大”说，它只能把

独裁、分裂、内战“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人民利益“合法”化，它只能把中国人民推入更痛苦的深渊。

5. 简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情况及伟大意义。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各个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先是从1946年7月到10月，集中其正规军80％的兵力即193个旅约160多万人，全面进攻各个解放区，接着从1947年3月到6月，又分别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进行了积极地战略防御，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到1947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12万人，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时，蒋介石的总兵力已由内战爆发前的430万人下降为370万人，其中正规军已降到150万人。而且蒋军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后方空虚，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机动兵力十分有限。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已达100万人以上。由于得到了大量的缴获，装备已大为改善和加强。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改，发展壮大了民兵，后方日益巩固，士气更加旺盛，机动兵力已处于相对优势。

正是根据这一变化了的形势，中共中央抓住战机，及时制定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作战方针。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解放军在晋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太岳兵团和华东解放军主力也相机出师南征。这样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南下作战，转入战略进攻，以

及西北、华北、华东、东北等战略区解放军的攻势作战，共同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它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进了全国人民革命的高涨。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1)它是解放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并开始掌握人民革命战争的主动权，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使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进行，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影响，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它是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一个转折点，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从此，蒋介石 20 年的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开始走向灭亡。(3)它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 100 多年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一个转折点。

6. 中间路线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分析其破产的原因。

中间路线即中间势力的路线。中国的中间势力是指处于国共两党之间以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道路，而是主张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抗战胜利后，国内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特别是出现了暂时和平局面和国共两党力量的相对均衡。这就为中间势力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这个时期中间势力异常活跃。他们或建立新的政党，或整顿扩大原有组织，纷纷发表政见，宣传自己的主张，形成一条中间路线，并积极广泛地开展活动，调和国共斗争，促进政协会议的召开，幻想在战后国内时局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乘机实现自己的主张。但是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千方百计妄图消灭

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而且也反对不利于其独裁统治的中间路线。正是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分化瓦解和残酷迫害下，1947 年 11 月 6 日，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民盟被迫解散，标志着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彻底破产。究其原因：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软弱，它外受帝国主义的歧视，内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制，又严重脱离劳动人民，因此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缺乏阶级基础。

第二、外国帝国主义不答应。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战后竭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罪恶目的，是要把中国永远变成它们的附庸和殖民地。因此，要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第三、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分化瓦解或诱骗收买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无法也难以团结起来，只会是要么逐渐觉醒，站到革命人民一边，要么顽固不化，依附国民党反动派。中间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第四、随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中国革命人民也绝不允许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7. 说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为主体，有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等各界人民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首先是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结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

坚持卖国独裁内战的既定方针，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国内和平民主，积极发动内战，血腥镇压和残酷掠夺国统区人民，不断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上，为了加强独裁统治，蒋介石非法召开制宪国大，导演“改组政府”丑剧，完全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换取美援，蒋介石不惜空前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从而加深了国统区殖民地化的程度。经济上，滥发纸币，物价暴涨，通货严重膨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在城市，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族工商业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在农村，征粮加租，抓丁拉夫，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领导的结果。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激起各界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无比愤怒。为了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和法西斯暴行，反对美军的暴行，中国共产党国统区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扩大宣传，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为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反特务统治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动领导了各种形式的反美反蒋斗争。从 1946 年 11 月的上海摊贩斗争到由北平发展到全国的学生抗暴运动、1947 年 2 月的台湾人民武装起义、再到 1947 年 5 月爆发后又遍及全国范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切表明，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

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形成的意义是，一、它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正面作战，加快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进程，二、它沉重地打击了美帝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后方基地，使国民党反动派陷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

8. 试述 1947 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

义。

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夺取全国胜利条件已经成熟的形势下，总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经验，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政策。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军事、统一战线、经济政策、土改、整党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有：

(1)军事方面，在总结人民解放军以往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系统地指明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的指导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对于最后、全部、彻底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指导全国解放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2)政治方面，阐明了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共在当时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界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经济方面，阐明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说明了垄断资本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以及中共对他们的不同政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

兼顾，劳资两利。

（4）在土改和整党方面，提出了必须注意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和坚决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这两条基本原则，重申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改方针，提出了为保证上述各项纲领的顺利实现，必须整党 的任务。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所通过的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纲领性的文件，解决了中国革命伟大转变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

9. 分析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崩溃的原因。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 1927 年 4 月开始在南京建立，到 1949 年 4 月，国民党南京政府被推翻，共历时 22 年。国民党在这 22 年的反动统治期间，经历了 10 年土地革命战争的打击，8 年抗日战争的考验，特别是经过 3 年解放战争沉重打击，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彻底崩溃，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4 点：

（1）基础薄弱。在叛变国民革命后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得到过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其统治基础极为薄弱，这是后来其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

(2)统治腐败。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并顽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独裁统治，造成吏治腐败，贪污受贿、鱼肉人民、胡作非为，采用法西斯特务手段，残暴地镇压人民的反抗。特别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军事进攻的失败，引起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使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使国民党的反动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这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3)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蒋介石从来没有使国民党真正统一起来，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派系林立，如政学系，CC 系，研究系等各派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军事集团重重，什么中央军、地方军、黄埔系、杂牌军等为了各自的利益，你争我夺，貌合神离，这一切，使蒋介石在政治上无法步调一致，军事上指挥不灵，如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阶段几大战场上各派之间互相猜忌，彼此离心。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设置种种特务机构，妄图强化统治，不但无济于事，反倒加剧了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南京政权崩溃前夕，许多军事集团、政治派系纷纷脱离蒋介石集团或投诚起义，或暂时中立，严重削弱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力量。

(4)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迅速崩溃的外部原因。中央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始终代表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在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解放区军民，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又转入了伟大的战略进攻，歼灭了国民党大量的有生力量，把国民党军队集中包围在几大战略区内。接着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战

略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军事力量，又粉碎了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

另外，蒋介石个人生性多疑的品质和军事指挥的无能，全国民心归向共产党等也是造成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10. **试述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简况和意义。**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到 1948 年秋，战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时，人民解放军虽在数量、装备上还不如国民党军，但经过两年多的内外线作战，已积累了攻坚作战的经验，改善和加强了武器装备，增强了战斗力。随着各解放区土改的全部或基本完成，生产获得了发展，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同时，各个主要解放区已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援助。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人民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则越战越弱，士气更加低落。他们放弃了“分区防御”，被迫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进行顽抗。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这时，国民党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割牵制在西北、华北、中原、华东和东北的各个战场，无法机动。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更加分崩离析。随着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其后方更是危机四伏。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和指挥人民解放军进

行战略决战，并且把决战的方向首先选在了东北战场。东北战场是全国五大战场中解放军兵力超过蒋军的唯一战场；又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是决定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辽沈战役，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经过52天的激烈战斗，到1948年11月2日，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多人。人民解放军彻底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战役连同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军事形势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了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敌人占了优势。这样，就使原来预计用五年时间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大为缩短。

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连同其他部队共60多万兵力，联合发起了淮海战役，痛歼国民党军队55万人，解放了中原、华东等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城市南京、上海、武汉直接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威逼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始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境地。

随后，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约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发动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64天时间，又全歼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人，解放了华北的广大地区。至此，战略决战以人民解放军的辉煌胜利而宣告结束。

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中心内容的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共历时142天，歼敌154万多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

治和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使东北全境、华北和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除几个少数孤立据点外，都获得了解放。这样，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崩溃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1. 试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中共在全国胜利前夜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批准了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有：

(1)制定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经验，并根据战争发展的总形势，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三种方式，即用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进行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暂时将其保留，争取中立、待机改编的绥远方式。会议提出必须迅速准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的中央人民政府。

(2)提出中共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为此，会议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斗争。开展城市中的这些斗争，必须是依靠工人阶级，并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反对共同的敌人，建设新中国。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

产事业。只有完成这一任务，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3)阐明了全国胜利后国内外的基本矛盾和中共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会议指出，在全国胜利，特别是土改完成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据此，提出了中共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便使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依据旧中国国民经济中现代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一基本国情，中共应采取的政策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在外交上，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关系和一切卖国条约，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要同外国人(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4)特别提醒全党要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胜利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为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于 1949 年 3 月 25 日由西柏坡迁到北平，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2. **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开始，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本结束，共经历了 30 年。在这 30 年时间里，自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共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沿着探索中形成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它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以后，我们的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真正独立、统一的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开始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伟大胜利，为我国各族人民开拓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中最

重大的事件。它使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反动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它提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经验，对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马列主义不仅可以指导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而且也可以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只要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可以把那里人民的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并且为世界历史写下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为了争取这个胜利而进行过英勇斗争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光荣，也是为了争取这个胜利而领导人民进行过英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有：

(1)必须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取任何私利、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向敌人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必须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制定路线和政策，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勇于创新、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2)必须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必须有一条马列主义的军事路线，必须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武装斗

争的道路。

(3)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依靠农民这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4)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

学术研究中一些争议问题简介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

一种观点认为，抗战胜利后我党的基本方针是发展我党力量，准备自卫战争。根据是：第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和《关于重庆谈判》等著作中，曾深刻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两手策略，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猛烈扩大解放区，争取东北；与此同时，尽力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发展，尽一切可能与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以便停止内战。第二，周恩来在1947年9月作的《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中指出："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行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第三，自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农村武装斗争上，从未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作为

党的中心任务，至于我党在当时提出的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方针，这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提出的，当时有实现的可能性，我党也曾用极大努力去力争实现这个方针，但它不是我党的中心任务。

另一种观点认为，抗战胜利后我党的基本方针是争取和平民主团结。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正如声明发表的第三天，《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的："中共中央的宣言，其意义不止是提出了当前时机的行动纲领，不，它的意义远超于此，他提出了行将到来的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和平、民主、团结。……正如在抗战、团结、进步的口号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战争一样，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下，中国人民将赢得和平"。同时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及其以后，都多次指出我党的方针是"和平建国方针"、"和平团结方针"，中共中央在当时的许多内部指示中，也多次把我党方针概括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二、关于重庆谈判

1. 重庆谈判的主意是谁提出的

一种观点认为是蒋介石提出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援助，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建立蒋氏独裁专治政权。但是面对抗战后的全国人民的舆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强大革命力量，使得蒋介石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加之蒋介石对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因此，蒋介石变换策略，装出和平的姿态，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用假和平来掩盖真备战的阴谋。同时，蒋介石也错误地估计了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这样他就可以大造舆论，说

共产党不要和平，妄图把打内战的罪责强加于共产党。

一种观点认为，邀请中共谈判的主意是政学系提出的，蒋介石之所以接受这一计策，是因为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这正合蒋的心意。蒋介石曾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自十九年剿匪开始……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过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谈判以解决国共矛盾的设想，最初是由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提出的，抗战后期，美国为了实现其对华的既定目标，决心尽快解决国共矛盾，帮助蒋介石用政治方式统一中国各派力量，造成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日作战，又可以堵塞苏联向中国渗透的渠道，1944 年 9 月赫尔利奉命使华，到中国不久，便开始调处国共矛盾。1945 年 2 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美国政府背着中国满足了苏联对中国权益的要求。8 月 14 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 月 15 日，赫尔利即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 月 27 日，赫尔利亲往延安，迎接中共代表。

2. 蒋介石谈判的目的

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谈判的目的是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战后伊始，由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状大，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各国舆论呼吁和平的声浪甚高，特别是由于蒋介石调运军队到内战前线还需要时间，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蒋介石在依靠美国积极备战的同时，装出和平姿态，在 1945 年 8 月中下旬，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商讨国家大计"。赫尔利为此也来延安。

他们的诡计是：如果毛泽东不去，他们就可以蒙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宣布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则妄图对中共施加压力，诱骗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同时，可以借此时机，加紧运兵，抢夺胜利果实，部署内战。

另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也有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企图。早在1943年共产党国际解散时，蒋介石即有此打算，曾致信毛泽东提出要"面谈一切问题"，并将他的企图向中共透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看到和平为人民所希望，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尚有困难。同时，若发动内战，兵力调遣也需时间。而战后苏、美两国也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支持国共两党进行谈判，促使中国出现和平局面，以有利于远东局势的稳定，基于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实际上，国共两党各有"和平"及"战争"两种打算—要和平，按我的原则和；要战争，可争取准备的时间。从这方面讲，双方"和谈"都是有"诚意"的，都想利用和平方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3. 蒋介石对谈判有无准备

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对谈判没有准备。毛泽东亲赴重庆的行动，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国民党对谈判并无诚意，事前对谈判毫无准备，中共代表的到来，弄得他们手忙脚乱，政治上完全陷入被动，在谈判中，一切提案都由中共方面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应付而已。国民党代表张群也在会谈桌上尴尬地承认："我方党内事前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这说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是假的，也根本没有做任何谈判的准备。

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对谈判是有所准备的。蒋介石的日

记透露，对毛泽东应如来渝后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的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谈判初始，国民党代表团就讲："尚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他们要求中共先提出方案。在中共提出"谈话要点"方式的提案后，蒋 介石又立即亲自拟定"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国民党代表团，以作为进行谈判的基调和和准则。接着便提出他的方案，并称这是他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这说明蒋介石对谈判就有准备的。

啊.《双十协定》是否承认了我军的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双十协定》(即《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否认了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重庆谈判，通过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国民党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存在，并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致在这方面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一种观点认为，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拒不承认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民主政权，这是事实，但说国民党未承认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双十协定》中对于军队问题有这样的记载："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可以看出，国民党还是承认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在 1946

年12月18日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在去年10月10日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在此纪要中……解决的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二、承认了各党的会议。……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在此方案中,承认了我军20个师,当然由于国民党对和谈没有诚意,因此在军队问题上没有达成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有关协议。

三、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是策略还是战略

一种观点认为,中共抗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是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强大。在国内,抗战后中国人民热切渴望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一些中间势力也希望统一合作。蒋介石深知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困难。因此企图以“和谈”来掩盖其内战、独裁的阴谋。而中共中央认为应力争国内和平与民主,并通过和平谈判的实际斗争,团结中间力量,教育广大人民,揭露和制止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于是在与蒋介石谈判中相应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不过当时我党在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中,并没有让争取和平民主的口号来缚住自己的手脚,而是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上,紧张地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正是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解放区先后取得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等自卫战的重大胜利,迫使蒋介石与我党签订《双十协定》和政协会议决议案。

另一种观点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是一个战略方针。首先成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的一项基本主张。其次,成立联合政府也是

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内统筹中国革命全局的主张。再次，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宏观上规划了一条中国和平的革命道路。即在联合政府之下，通过对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通过争夺领导权的反复斗争，以和平方式逐步废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支持他们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

四、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内战的目的

一种观点认为，马歇尔是假调停，真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马歇尔来华的使命，一方面要努力说服国民党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致获得所谓的中国“统一”，同时借此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存在；另一方面则利用“调停”内战作为幌子，以争取时间，帮助国民党将军队运往东北并作好将军队运往华北的准备。其目的是一个，就是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个既定的方针。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协助国民党进犯解放区，至 1946 年 6 月，已调集到内战前线的 160 万国民党正规军中，有 54 万是美国用军舰和飞机运送的。美国还训练蒋军 15 万人，装备蒋军 45 个美械师，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已达 40 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给国民党日益增多的军事援助，所以蒋介石就越来越猖狂地决心内战到底，尽管中共方面再三让步，也无法求得任何协议了。

一种观点认为，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内战的目的，是为了贯彻美国“扶蒋溶共”的对华政策，加强蒋介石的统治。研究者认为：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冲突，防止内战，谋求建立联合政府是有其原因的。中国保持稳定，成为能“担负国内与国际责任”的国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利。而中国的内战则可能增

加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使远东的战略格局受到破坏。美国的方针是：利用蒋介石在美国扶植下膨胀起来的军事、经济实力，使中共在联合政府的约束下得不到发展；同时，蒋介石应实行改革，争取民心，扩大政府的政治基础，逐渐削弱中共的力量和影响，直至最终确立蒋在中国的统治权。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以及美国的援助实际助长了内战的爆发，致使马歇尔的使命遭到失败。

一些台湾学者认为，马歇尔调停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内战，促成国共联合政府。美国政府在战后也认识到国民政府的腐败，看到了一般国民党以外人士对政府不满，以及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抗战后已身心疲惫，决不会支持内战，而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得胜的把握，而且长期内战会造成经济的崩溃，这样于美在华的长期利益不利，而且内战还使美国顾忌会引起苏联的军事干预，这样美苏在远东就很可能发生武装冲突，这是美国极力避免的。所以美国解决国共纷争的最后政策是促使国共成立联合政府。但是马歇尔并不知道他想协助建立的联合政府有利于中共，使中共得以坐而取胜，对国民政府造成了损害，甚至可以说是造成后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

一种观点认为，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积极防御。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装备上居于劣势，但由于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主动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数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转变。

一种观点认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即由外线出击逐渐变为内线出击。全面内战爆发初期时，党中央制定了一条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目的是以“大打”争取“议和”，迫使蒋介石退出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后占领的城市和地区.加之当时我党还没有放弃“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一口号。随着内战爆发的深入，以及我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积累，更主要的是议和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唯一的前途是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然后举行战略进攻。到1947年3月中央彻底改变了外线出击战略计划，指示各军转入内线作战。

六、对中间路线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对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中间路线应基本否定。解放战争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各民主党派，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坚持独裁统治的情况下，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赞成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对孤立敌人，牵制反动力量，壮大革命声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建立什么国家，走什么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所倡导的中间路线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有着原则不同，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中国革命决战时期的绊脚石，具有明显的反动性。

一种观点认为，中间路线的主张可以基本肯定。因为评价中间路线的作用，必须要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过程中来评价。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主张中间路线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虽然他们有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消极一面，但是，从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总过程来看，他们的革命性是主要的，他们否定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一面也是主要的。这对打倒蒋介石不无好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间路线的作用因具体的政治形势不同而不同，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反动力量占优势，并且准备向革命力量反扑过去的时候，中间路线所产生的客观作用主要是牵制反动力量，这一时期中，中间路线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但当革命力量占优势，并且在胜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中间路线的客观作用就变成牵制甚至反对革命力量了。因为尽管这种主张在表面上是要求双方同时让步，而自己并不完全附属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但在实际上，这种主张和想法的作用，对于反动力量而言，是为它散布幻想，对于革命力量而言，却是要它不再前进，总之对于革命是有害的。

七、关于"第二条战线"

1. 第二条战线的内涵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条战线是指这一时期的整个白区工作，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9 年 10 月我党分阶段有步骤的在白区领导人民群众依次开展了反内战、反独裁的和平民主运动，反美反蒋的爱国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等，直至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条战线是指这一时期国统区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毛泽东在 1947 年 5 月 30 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一文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可以看到，第二条战

线是相对第一条战线而言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具有着其他阶级、阶层的人民运动不同的特征，它在反美反蒋斗争中能够起到其他阶层人民运动不能比拟的巨大作用，而且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沿着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战场的方向推进，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就形成了第二条战线。

第三种观点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是指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运动。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而规模之大、参加人员和地区之广泛、斗争之频繁都是空前的。在斗争中几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卷进去了，学生运动又促进了人民运动，这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国人民包围之中，同时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一部分兵力，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了进步势力，巩固和扩大了全民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

2. 第二条战线形成的标志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条战线出现的标志是“五、二 0”惨案。早在“五・二 0”之前就出现的学生运动规模基本上是小型的、分散的运动的性质也是经济性的、生活性的。但到了“五・二 0”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就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学生运动起了质的变化，运动规模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这个质的变化标志着“五・二 0”以后的学生运动已经成为与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面对面的战线。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条战线出现的标志是红五月运动。红

五月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性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的大专院校学生，打出“民主自由万岁”、“纪念五四、反对内战”的标语，并发表要和平反内战的宣言。同时，上海的学生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社会宣传。由此可见，反饥饿反内战已成为整个红五月运动的行动口号。而且，红五月运动的规模和参加群众之广泛也是空前的。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居于第二条战线的地位，而这种发展和提高，又都是在红五月运动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学生运动的结果，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形成的。主要经历了 1945 年的“一二·一”运动，1946 年底到 1947 年初的抗暴运动，1947 年 5 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也指出：“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因国民党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和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京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已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

八、关于中共中央“二·一”指示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1946 年 2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中，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已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认识是正确的。其依据是：首先“二·一”指示对从根本上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协协议的精神作了阐述，并适应政协作出协议的这一新情况，要求党内作好思想准备。指示指出，政协协议使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同意放弃一党独裁，成立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的基本精神，是符合

人民利益并得到其热烈拥护的。指示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因而要以新的方式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人民军队的本质丝毫也不能改变，相反，我们要改造全国的军队。其次，指示着重指出了做好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一切准备。认为，一切决议尚待实行，距彻底民主化的实现还很远。英美大资产阶级和中国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中国革命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国民党军队仍有可能向我们武装袭击，应严加警惕。为此，各地要开展大练兵，以练兵、减租和生产为中心工作——这些都是战争的实际准备。再次，“二・一”指示表明我党不仅遵守政协协议，而且还宣传政协协议。这本身就是同反对政协协议的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二・一”指示对战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认识存在明显缺点。其理由是：首先，指示对于和平局面的过于乐观，不能不影响党的方针，指示虽然也讲练兵、生产的一面，但主要是批判对和平实现的不相信，以及对蒋介石也能实行民主政治的不信任，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不相信。强调的是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其次，指示对国民党战争政策的估计不足，不能不影响到解放区军民。由于对和平的过分乐观，解放区军民一度增长和平麻痹思想，随之而来的是要求解放区精简兵员，复员还乡。3 月底，各解放区确定的复员人数就达 33.9 万余人。再次，指示对和平局面过于乐观，不能不影响我军的战备。在蒋介石认为政协协议对其不利，准备并决心发动全面内战时，我党却认为 1946 年 2、3、4 三个月是有实现和平改革希望的三个月，这也是战备在某些

环节放松的三个月。

九、关于"五四指示"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党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坚持了从实际出发，汲取了历史的经验，它是党的历史上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光辉典范，其理由是：一、五四指示体现了党的土地政策由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向消灭封建的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过渡，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二、"五四指示"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改经验，注意纠正和防止"左"的错误倾向，政策界限明确，贯彻落实了党的基本方针，使土地政策适应了自卫战争和巩固争取和平民主统一战线的需要。三、"五四指示"明确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绝对禁止"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五四指示"全部肯定，不讲其不彻底性是不全面的。首先，它的不彻底性主要是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不是无条件的"没收"，主要是经过各种清算以及地主"出卖"土地的方式获得。可见，把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主要是通过买卖关系或授收关系实现的。这与"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根本不同。因此，它只能是我党改变土地政策的开始，是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过渡，是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其次，对于抗日军人、抗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以及对开明绅士等抗日有功的人适当照顾，对于团结他们参加革命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照顾太多，"多留一些土地"的做法，是不利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也不符合土地改革的根本方针。再次，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提出不能打击太重，应使地主和富农有所区别以及"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的

政策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问题在于随着形势的发展，由于处在激烈的战争年代，而且中国的旧式富农一般又在很强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情况下，要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触动旧式富农土地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十、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方针，对其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改正，在解放区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获得了农民的热烈拥护，得到了民主人士的同情，应全面肯定。其理由是：第一，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威风，铲除了蒋介石在解放区的社会基础，使解放区成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可集中力量支援前线，争取更快的打败蒋介石，第二，农民得到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军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第三，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解放区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为国统区的农民指明了方向。他们盼望着土地改革政策迅速的推广到全国，从而使蒋介石反动政权进一步孤立。

一种观点认为，对《中国土地法大纲》应基本予以肯定，但是，也还有不足之处。其根据是：一、对“五四指示”中所规定的联合中农，保护工商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对地主与富农、对中小地主与地主豪绅恶霸区别对待和防止乱打乱杀等一套十分正确的政策，土地法大纲中都没有明确继承。二、只强调了反对已经出现但有所克服的右倾，根本无视已经出现的“左”

倾错误。三、提出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在执行中又出现了"乱打平分"、"彻底平分"、"绝对平分"等现象，把平分土地绝对化。使平分土地与绝对平均主义相混淆，这就在实践上容易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以致打击面扩大，孤立了自己。

十一、对"平分土地"口号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平分土地超过了反封建的界限，必然侵犯中农利益，这是违背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应予以否定。其根据是：第一，实行"平分土地"政策，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时，没有将非封建剥削与封建剥削的经济关系加以区别，这样不可避免地会侵犯中农利益。使土地改革超出了反封建的范围。平分中农土地，因混淆了封建性和非封建性土地的不同性质，势必扩大打击面，搞乱阶级界限，孤立贫雇农，失去中农的拥护，使党在土改中，无法团结农村 90%以上的人口，丧失了土改胜利的基本条件。第二，平分中农土地，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会使广大农民对土地个人所有制产生怀疑和动摇。这必然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是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第三，"平分土地"的政策，在思想上，无条件地完全反映了农民平均主义的要求，造成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泛滥，在实践上必然导致绝对平均主义，致使"平均"达到极端的程度。第四，"平分土地"的政策，实践上也证明不正确的。一些地区提出"粮(相差)不过一升，地(相差)不过一分"或"地一粮一"、"产平亩齐"的口号，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一种观点认为，"平分土地"的主张，是最彻底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方法，完全适合中国广大农民的要求，其历史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其根据是：一、由于中国农民要求"耕者

有其田”，因此平分土地“便于发动广大农民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得到解放，所以平分土地也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方法。它对于迅速发动农民，促使农民革命热情高涨，争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二、土地改革中，中农自身表现赞成平分土地，这是因为平分并不损害中农利益。在平分时，一部分中农土地不变动，一部分则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有少数多余的土地，他们也愿意拿出来平分，这是因为平分后他们的土地税负担减轻了。三、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中，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是一贯的，因而不能说是侵犯了中农利益。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总结》中明确强调“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毛泽东也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把坚决地团结中农、不损害其利益和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作为胜利完成土改必须注意的两条基本原则。

十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依据是：首先，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针对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对广大民众进行了极其广泛而又行之有效地教育，不仅使全国人民逐步从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而且使他们认识到要实现和平民主独立，要得到生存的权利，就必须打倒蒋介石把美帝国主义从中国驱逐出去。其次，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予以坚决打击，在短短四年之中取得了革命胜利。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有一个发展变

化的过程。其理由是：首先，在内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事业，曾希望与美国实行合作，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后曾指出，从长远看，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内战的爆发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美苏尚不愿中国爆发内战，人民渴望和平，经过努力，内战有可能被推迟，并将产生一个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把美国看成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推动力量，希望美国能约束蒋介石，制止内战，实行民主。其次，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援助下，大打内战，使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时期，中共集中揭露、批判了美国企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阴谋，使美国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第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犹豫不定，美蒋之间矛盾日趋明显。为了更好利用这种矛盾，中共中央在强调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同时，注意对美的斗争策略，避免美国全面卷入中国内战。第四，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思想上、军事上作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另一方面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保护英美外交人员，并派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第五，由于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被美国领导人否决，中国共产党七届二全会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进而到 1949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明确确立了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以及关于它的战略构想的"一边倒"的政策，即新中国必须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十三、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打败国民党的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首先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决定解放

军必胜，蒋军必败，其次，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由于人民军队有根本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三大特点，即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这就使它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再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一时期，中共已经完全成熟，能够独立自主地根据历史发展地进程提出战略口号和斗争目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党和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条件。从国际上看，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和强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阵营的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为中国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国内来看，中国人民身受的剥削和压迫极为严重，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丧失人心，因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但得到了工人、农民的拥护，而且还得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中国革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革命力量内部，无产阶级力量较之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因此能够把中国革命引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并保证革命的彻底性。此外，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使中国革命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能够长期坚持革命战争，以便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并最终取得胜利。

第三种观点认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其根据是：一、南京政权缺乏建立和巩固现代国家的起码条件，即缺乏必需的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在乡村，国民党所依赖的是土豪劣绅，与广大农民的利益相背离，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而土豪劣绅在地方财政、税收、土地等重大的问题上同

国民党中央存在矛盾和斗争，二者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在城市，工会被强行解散，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及部分国民党左派被“清除”。资产阶级与南京政权的矛盾又日益加深。使中间政派后来都倒向了共产党方面。在军事上，蒋介石虽然收编了各地实力派的部队，但内部派系林立，半独立状态是始终存在的，国民党中央对各军队不能始终如一。再加上军队腐败、军纪废驰，使国民党军队毫无战斗力，二、南京政权是勉强建立起来的，从而导致政权无法正常的运转。从上层的中央机构看，其本身就是一个各派势力和派系的大杂烩，因而使内战连绵不断，各派系纷争一直与南京政权相始终，从社会风气来看，腐败堕落日甚一日。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国民党统治雪上加霜，加快了崩溃的步伐。四、长期排斥共产党的结果，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最终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打倒。

第五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10月1日开国至今，已经历40多个年头。在这40多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卓见成效。这四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后，百废待兴，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新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三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统一大陆，巩固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和恢复国民经济。同时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继续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矛盾。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展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等。在民主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自身整顿。接着，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19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在建国后的短短七年中，社会政治安定、经济恢复和迅速发展、科教事业进步，人民得到实惠，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转变，这是“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期”，是为社会主义历史奠基创业的起始阶段。实践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中国只能走向社会主义。

第二阶段，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使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在这十年中，党和国家工作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在经济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针。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思想上、理论上的充分准备，毛泽东和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后果。虽然已经觉察并开始纠正，然而又发动反右倾运动，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国民经济的三年严重困难局面。从 1960 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全面调整，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而“左”的错误尚未彻底纠正，由“左”倾发展为极“左”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上不顾基础薄弱，急于求成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于集中在个人手中的缺憾，至使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发展，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总之，这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这是一段“曲折前进的岁月”。

第三阶段，从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始终占支配地位。“文革”初期主要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反修防修”，“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首先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在全国夺权，进入了“大动乱的年代”。刘少奇、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争中被打倒。“九大”后，全国“文革”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为此，林

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覆亡，恶运才有转机，周恩来等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但很快被“批林批孔”冲掉。中国仍被“左”的错误笼罩，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和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此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对动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然而风浪不息，“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激发了全面人民的义愤，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展开，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终于结束了这场浩劫。

“文革”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照搬外国的个人高度集权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及中国历史上长期封建专制影响的集中表现。在“文革”中，全国各项工作和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和不懈的努力，“文革”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国在粮食生产、工业交通、基建和科技等方面仍在艰难中进展，并在若干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十年“文革”的灾难中，我们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文革”为我们提供值得永远记取的惨痛教训，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并坚定其信念。

第四阶段，从 1976 年 10 月起至今，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经历了徘徊前进的两年和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迈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 70 余年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40 多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这是对延续 21 年的“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时期，是真正集中

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各个领域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是对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期，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国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中国在徘徊中前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召开前的四年，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正确路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开始进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阶段。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革"作出了正确总结。党的"十二大"召开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五年，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直至中共"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形成，使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也打开了外交新局面。"十四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岁月历经曲折，开辟出了自己前进的路。今天，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基本问题解答

重要名词：

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运动。全国解放时，老解放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并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52年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约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它财产，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了工农联盟，并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运动。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着，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投入朝鲜战争，并把战火引向我国东北边境。中国政府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作战；同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中国各行业人民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在国内，人民纷纷推行爱国公约，开展捐献钱物和

增产节约运动支援前线。在朝中人民的沉重打击下，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者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胜利结束。

镇压反革命 简称“镇反运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解放初，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大陆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灭亡，继续破坏捣乱。1950年12月，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镇压反革命的法律依据。规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原则。这次运动集中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颠覆阴谋，巩固了人民政权。1953年上半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关、部队及企业中开展的廉政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斗争的统称，解放初期，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腐蚀贿赂国家干部，进行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等非法活动。党政干部中部分意志薄弱者贪污受贿、蜕化变质。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从1951年底开始，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接着于1952年初，又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革命队伍，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此运动于1952年夏结束。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内容包括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和首都共四章106条。这部宪法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各项政治制度，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与道路。其基本精神，一是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政体、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三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应尽义务的原则。它具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主性，是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纲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印两国政府通过的关于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1953年12月，中印两国政府就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谈判。周恩来总理提出正确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根据上述原则顺利达成《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年6月，中印、中缅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并向全世界倡议将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五项原则，它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体现的和平精神。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亚非国家会义。参加会议的有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发起国以及中国等共29个国家。周恩来总理

代表中国政府在大会上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的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倡议以和平相处十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础。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这种精神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亚非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高饶事件　1953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夺权活动。高岗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局书记，中央委员。1953年调任国家计委主席后，开始篡夺中央最高权力活动。饶漱石原任华东局书记，1953年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积极活动。1953年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岗还于年底要求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1954年2月，中央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批判高饶的阴谋活动，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其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岗、饶漱石清除出党，并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肃反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1954年5月，针对反革命案件频繁发生，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从此，全国掀起大规模肃反运动。这次运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镇反，主要打击公开敌人；二是党政机关内部肃反，主要清查打击钻入革命队伍内的敌人。肃反运动总方

针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总政策。到1957年春，清查出一大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高潮的到来提供了安全保证。但也存在扩大化的偏差。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讲话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讲话强调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讲话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它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

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缺点是片面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大跃进”运动 指1958年为盲目追求经济建设高指标而开展的运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了解不够，加之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的情绪，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庐山会议与反右倾斗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和任务。会议前期着重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十八个问题。讨论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对纠“左”不满意，认为这是泼冷水，是右倾；另一部分人从实际出发，主张继续纠“左”。在这种情况下，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他希望由毛泽东提示全党尽早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认为这封信表

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的进攻。因而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斗争，进而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使早已存在的“左”倾错误继续向前发展，造成严重损失。

“八字方针”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59年开始，由于“左”的错误，农业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加之苏联政府撕毁合同，致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生产受到破坏，经济比例失调，物资供应不足。八字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对于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书面报告并讲话。会议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团结，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编写的历史剧，主要歌颂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与庐山会议和反彭德怀的斗争并无关联。1960年发表。1965

年初在江青、张春桥的共同策划下，由姚文元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同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文中硬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海瑞罢官》提出了政治意义上的批判。随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姚文元出小册子向全国发行。《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相继转载。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发展成一场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五·一六通知》 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毛泽东起草，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通知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是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治纲领。通知宣布撤销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对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通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标志着“左”的理论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1981年6月，《通知》连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

《十六条》 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十六条》错误地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

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十六条》又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强调这次运动的方针和方法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虽然《十六条》也规定，这次运动要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进行，"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以及保护科技人员等，但事实上都无法贯彻执行。《十六条》是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文件。成为开展"文化大革命"、搞乱全国的重要依据之一。

"一月风暴"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 1967 年 1 月发动的向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推翻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事件。1967 年 1 月 3 日和 5 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成为"一月风暴"的前奏。6 日，张春桥、姚文元共同策划，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为头头的"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2 月 5 日，成立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为副主任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公开肯定和支持了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此，夺权运动波及全国。

"二月逆流" 1967 年 2 月前后，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上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该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三个问题上，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被江青、林彪等阴谋家、野心家诬称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大事件。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上策划的"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后，继续策划更大的阴谋。1970年10月拼凑成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1971年林立果、周宇驰等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准备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夺取最高领导权。8月，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多次发表谈话批评林彪等人，这使得林彪、叶群等人惶恐不安。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由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负责实施。由于毛泽东高度警觉和提防，提前返京，使得林彪的阴谋彻底破产。12日林彪等人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又将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供他们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去山海关的情况，断然采取了防范措施，林彪等人感到事情已经败露，急忙于13日凌晨乘飞机北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林彪余党也被一网打尽。"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中美《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在上海发表的政府公报。主要内容如下：〈1〉双方对国际形势阐明各自立场和态度。中方声明；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2〉双方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阐明了共同原则。双方声明；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3〉双方对中美关系各自作出声明和共同声明。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公报的发表，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前景。

三个世界理论 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根据当时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首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三个世界，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和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被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构成第三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 4 月 6 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他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注意。三个世界理论为我国确立团结世界人民反帝反霸反殖的战略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五”运动 是 1976 年 4 月 5 日前后发生在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群众性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纷纷开展各种悼念活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是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压制。3 月下旬，一些地区的群众就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4 月初北京市的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张贴诗文，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声

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4 月 4 日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估计这一天到过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 200 万人次，献花圈 2000 多个。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错误地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5 日，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举行的悼念活动遭到镇压，数百人被逮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这个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显示了人民群众大无畏的气概。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 年 2 月 7 日，经华国锋审定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提出的错误方针。它在理论上把毛泽东的言论、著作、决策僵化、绝对化，属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阻挠中共中央全面拨乱反正，反对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工作。因此，这一方针一提出，就遭到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开始了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新时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 年 5 月展开的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 1977 年 4 月中旬，写信给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完整地准确的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辩

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成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导。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自此，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使讨论逐步深入。这场讨论，弄清了怎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于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巨大作用。

一国两制 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 1984 年 6 月 22 日、23 日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的谈话要点。其含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谈话指出我国政府在 1997 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强调，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国对香港的政策 50 年不变。“一国两制”是邓小平集党中央集体的智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作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主要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严肃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强调要

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三是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话，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称为“四项基本原则”。它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问 答 题：

1.试述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和战略方针。

在1950年6月6日至6月9日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三年左右时间内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要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必须创造三个基本条件：(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报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创造三个条件而做好下列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进行土改工作；(2)加强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稳定物价和合理调整工商业。(3)复员部分军队，整编行政系统；(4)改革文化教育；(5)帮助和救济失业；(6)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巩固扩大统一战线；(7)坚决肃清一切反动分子；(8)进行全党整风运动。这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和纲领。

讲话阐明了党的战略方针。指出：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即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而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这一方针，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孤立打击主要的敌人，建立经济上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稳步前进，调节各方面

的关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都团结起来，集中力量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动员组织全国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

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

建国之初，国民经济恢复中曾经遇到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物价飞涨，这是旧中国通货膨胀的继续。加之建国初各项开支庞大，而国家收支极不平衡。为弥补赤字，不得不多发行纸币，势必又刺激物价上涨。市场上的巨额投机资本乘机疯狂追逐暴利。从 1949 年 4 月到 50 年 2 月，连续出现四次大规模物价上涨风潮。中央人民政府从 1949 年 11 月起采取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果断措施，一面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主要商品货源；一面选择有利时机和市场，集中全国经济力量，敞开抛售，给投机资本以歼灭性打击。市场物价回落。1950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3 月政务院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的决定》，基本内容主要有三项：(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将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由中央内政部统一调度使用。(2)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重要物资，统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调度，合理使用。(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实行统一后，很短时间内就使国家财政收入接近平衡。并从根本上扭转了旧中国延续几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局面。全国财经状况开始好转。七届三中后，围绕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一中

心任务，开始恢复和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内外贸易业等，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经过短短三年时间，我国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取得了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伟大成就。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稳妥、有步骤地变革旧经济，合理地调整私营工商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出色成绩。

3. 试述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经过及内容要点。

经过三年恢复时间，中国人民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还很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中国还并存着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人民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要采取新措施，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曾多次在讲话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轮廓设想。1952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 年 12 月，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其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观念上的一个重要改变。

过渡时期总路线包含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方面内容。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二者互相关联，不可分离。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

4. 试述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

党中央制定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结果。这条总路线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1)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后，虽经过三年努力，社会主义经济有了显著增长，但现代工业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26.7%，钢的产量也只有130多万吨，人均不到2.5公斤，更谈不上飞机，拖拉机，汽车以及重型和精密机器的制造，国防工业还存在着空白。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从技术的装备上改造农业和手工业，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国家财政经济力量和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建设现代化的国防，防御帝国主义侵略。

(2)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全国大陆土地

改革的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无法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无法建立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必须采取措施，把落后的、混乱的、畸形发展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3)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愿望，也是工业化的需要。土改以后，我国的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农村经济，为了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克服两极分化，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发展的一个动力。

总之，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范。

5.“八大”的历史功绩和意义是什么？

“八大”的历史功绩是：(1)“八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完成后国内的形势和阶级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作出了我国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论断。因此，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斗争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从旧的生产

关系下面解放生产力，而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2）“八大”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及时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及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我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亿万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3）“八大”总结了自七大以来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总结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

（4）“八大”还提出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和健全法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八大”的历史意义是：（1）“八大”及时地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党和国家的今后任务，作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以重大的历史功绩载入党的史册。（2）“八大”强调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强调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八大”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必要的准备。历史证明“八大”确定的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符合我国实情的，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6. 简述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第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以重工业为重点

的前提下，要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工业约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和利于备战，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但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发展。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快，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三者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不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必须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第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民族的团结，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我们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第七，党与非党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于善意地向我们执政党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都要团结，要做好“统战工作”，使党与非党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非党人士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八，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镇反与肃反是完全必要的。反革命这样的消极因素，破坏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的。由于我们采取了正

确的政策，现在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不反革命了，有的人还做了些有益事。

第九，是非关系。对于原则性的是非一定要争论，要搞清楚。但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使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对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搬的机械运用。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的经验，搞好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是什么？

针对当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毛泽东于 1957 年 2 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原理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各种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对抗性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2)阐明了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对敌人实行专政。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

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其公式为“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还指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关键是处理要得当。(3)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经济工作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族关系上实行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肃反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等。根据宪法原则，毛泽东还提出了辩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①.是否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②.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③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④.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⑤.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团结。他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两条。

以上讲话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指明其基本矛盾和特点，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规定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政策，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方面的重大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纲领性文件。

8.如何正确评价 1957～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绩和失误?

这十年中，我们遭到过严重挫折，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取得一些成就，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十年中，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工业、农业、文教事业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2）这十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1966 年比 1956 年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很大增长；工业布局有了改善，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

（3）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如：1957 年至 1965 年期间，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1949～1956）的 4.9 倍，教育质量有显著提高：科学研究机构达 1714 个；各产业部门都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装备条件较好的科研中心，全国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达 12 万人；牛胰岛素结晶的合成，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在当时达到了新水平。

（4）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适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以及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观点；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在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等观点。对于当时及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

意义。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1957年整风运动中，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得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的急躁冒进的错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三是“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有所发展。在社教运动中错误地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使得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这些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终究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失误，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的次要方面。

9. 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1)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对于当时形势和党的状况做了“左”的错误估计，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思想不断发展，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理论。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建国以来，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高峰。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的神化使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错误决策。但由于上述原因，使党和国家很难制止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2)“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进程中，错误难以避免。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出现用主观臆断去代替客观规律。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能靠我们在实践中逐步探索。

第二，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广大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习惯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以至于在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

件下，广大干部仍习惯于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

第三，上述错误观点，由于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就使得一些“左”的观点难于纠正。

第四，由于发生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等及苏联挑起中苏论战，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化主义的正义斗争。由于对修正主义缺乏科学的解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10. 简述“文革”的进程和各阶段的主要事件。

“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分为三段。

(1)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 1969 年 4 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 年 5 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 8 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同志“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并为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所利用。1967 年 2 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2)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3)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1975年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1.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这是因为：

(1)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基本上相适应的，这种生产关系虽然还不够完善，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但从总的方面看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国不存在根本上阻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因而“文化大革命”没有经济基础。

(2)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的，这种上层健筑虽然还存在着缺点和弊病，但同代表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上层建筑根本不同。这种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根本不需要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因而“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政治基础。

(3)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应该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4)在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的前提下，“文化大革命”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2. 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1)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恢复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为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

(2)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全会重申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并且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为我国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3)提出了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认为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转折的开始。

(4)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5)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认为必须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此外，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拨乱反正，把党的路线全面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打开了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局面，所以说它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3. 试述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及其取得的成就。

从1978年12月—1984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等，1982年与1978年相比，农民光此一项就增加260亿元的收入。为了克服大锅饭的弊端，规定除土地等生产资料外，农村中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如包产到户；包产到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干到户等。国家取消了指令性的农业生产计划，生产队及农民的生产经营权得到了保证。对待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乡村政权，规定乡人民政府是地方的基层人民政府。后又建立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经过改革，古老的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从1979—1983年间，粮食增产1700亿斤。其它农副产品的产量也成倍增长。

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村改革进入第二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使它逐步朝着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取消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放开除粮食和定量食用植物油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价格，农业税也改以前的征收实物为折征现金。大

力发展专业户以及其它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些措施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的改革进一步深化，1987 年全国粮食总产比 1986 年增加了 218 亿斤，其他的农副产品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新路。总之，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开始进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

14. 试述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全面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城市试点，在继续发展国有企业的同时，积极扶助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逐渐取消日用工业品的统购包销。放开工业小商品的生产、经营和价格。允许企业自销。一改过去生产、流通领域的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整顿金融，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四大专业银行为主，辅以其他金融机构。改革了财政税收制度。采取了三种类型和六种具体形式。1983 年 6 月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行了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并恢复和创设了一些税种。从 1980 年实行了财政体制的改革。对工资、奖金制度也做了初步的尝试。这时主要是补偿性地调整工资和恢复奖励制度。

从 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城市。改革工作更加深入，同时又与第一个阶段相适应，使得改革更加完善、配套。实行了价格改革。既合理调整价格，又逐步放开价格。同时与农村改革相适应，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和零售价格，又用给居民物价

补贴的办法调节。在生产资料上实行价格"双轨制。把消费工业品的价格定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改革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1984年在许多企业实行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1985年又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1986年又实行劳动人事改革，新招工人实行合同制。要面向社会，招收人才。打破铁饭碗，企业对违纪工人有权裁汰。经过改革，各项工作情况明显改观，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经济效益日益提高。

15. 试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经过不断地摸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提出了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将是一个长久的过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方面含义：(1)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2)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下大力气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将“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它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伟大成果。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是观察和处理我国改革和建设重大问题的思想武器。

16. 试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

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主持会议,赵紫阳向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本着中国的基本国情,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指我国已是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处于初级阶段,必须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它。明确地指出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个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学术研究中一些争议问题简介

一、建国后的中国现代史分期

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后的中国现代史应分为五个时期。(1)新中国成立时期，时间从1949年9月至1952年12月，(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时间从1953年1月至1956年9月。(3)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时间从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4)“文革”时期，时间从1966年至1976年10月。(5)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时间从1976年10月至今。

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的历史应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时间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第二阶段，从1953年初至1956年12

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2)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始及其严重挫折时期，时 间从 1957 年 1 月至 1976 年 9 月。这一时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7 年 1 月至 1960 年 12 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及其初步挫折。第二阶段，从 1961 年 1 月至 1966 年 5 月，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第三阶段，从 1966 年 5 月至 1974 年 12 月，"文革"的全面发动和全国大动乱。第四阶段，从 1974 年 12 月至 1976 年 10 月，各条战线的调整和全国的再度混乱。(3)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时期，时间从 1976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2 月。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6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0 月。党和国家工作的徘徊与改革开放的准备。第二阶段从 1978 年 10 月至 1984 年 10 月。全面拨乱反正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第三阶段从 1974 年 10 月至 1989 年底，改革全面展开和经济环境的治理整顿。

二、关于建国初期的社会性质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初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其理由是：首先，建国初期随着对官僚资本的没收而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在五种经济成份中占主导地位。其次，建国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再次，革命胜利后，人民大众和三大敌人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性质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其依据是：首先，建国初期，国营经济虽占主导地位，但其只能决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

展，而不能决定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仅要在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且要在国营经济占优势地位的条件下才能确立。这种建国初期以国营经济为主导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优势的经济结构，表明我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其次，革命胜利后，我国虽然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但它只能说明哪个阶级在国家占统治地位，而不能依此决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再次，建国初期我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完成这一尚未完成的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和三大敌人的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其理由是：①建国初期我国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这种经济结构，既要看到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又要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暂时又处于优势。同时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力量的消长，看到社会主义经济逐步代替非社会主义经济。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处在变化之中的经济，是尚未定型的经济，因而是过渡性的经济。②建国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根据地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同。后者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前者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开始担负起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③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来看，其同马克思列宁分析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基本相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列宁也指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经济结

构的特点和特征。这个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由此可见，建国初期的社会是属于过渡社会。

三、建国后中国现代史的主线

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历史的主线应侧重宪法第一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理由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次，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三大改造”，开展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等，都是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文革”的历史教训，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失误，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现代史的主线应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理由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崭新课题。这一课题在50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中共“八大”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不仅积累了经济，而且也有惨痛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样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四、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将来改造”思想，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1952年下半年提出的从现在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是忽视了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改造时间过早，改造速度过快，改造中也存在一些偏差，这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

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1952年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把我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应给予肯定。其理由是：首先，改造思想的提出，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毛泽东思想革命转变论的具体体现。在转变条件初步具备以后，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1952年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是有深刻的社会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巩固，是革命转变最主要的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领导权的确立，是革命转变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正是及时抓住当时这些国内国际的有利因素，才把转变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制定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三 从毛泽东和党中央主观愿望上看，是为了确保我国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繁荣富强，为了使劳动人民免遭剥削和贫困。第四，从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这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办法也是世界上一个伟大创举，是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五、关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种观点认为，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改造

是必要的。其理由是，首先，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其次，通过改造，我国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再次，我国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列宁提出过的通过赎买政策“剥夺剥夺者”的设想，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创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失误。其错误不在于过急、过快、过粗以及改造面过宽方面，而在于理论指导上的偏颇。由于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机械理解以及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套用，忽视我国的实际国情，企图用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法，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种急于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种观点认为，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应基本肯定。其理由是：总路线是党和人民在八大路线指引下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成果，而不是某些人的心血来潮。它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规定为基本点。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要求。

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

是错误的，其理由：总路线是在离开八大路线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形成的，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其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高速度，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从而导致“左”倾冒进思想的发展。总路线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后者发展了总路线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思想，是总路线的实践。

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并持续10年之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能够形成并横行党内多年，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来说皆因在执政党建设上发生了种种敝端和失误，所以，执政党建设上发生严重失误，是酿成“文化大革命”这一世纪性悲剧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主观原因。其理由是：(1)党没有坚持以至根本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左”倾错误观点系统化、理论化，是“文革”发生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原因。(2)违背党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破坏，是“文革”得以发动并持续10年之久的组织上和作风上的原因。(3)大搞以个人崇拜为核心的现代迷信，不仅使党内思想僵化，造成随风倒的坏风气，而且在实际上也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助长剂；他们利用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和党内的思想僵化，把现代迷信推向极端，也是“文革”发动并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因素。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病，是“文革”得以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依据是：(1)在党政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党政

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职责不清的现象，这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2)党内高度集权，是阻碍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的制度性原因。(3)高度集权的决策结构和决策方式，使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只赋予极少数人，“文革”就是这种决策结构和方式的产物。(4)信息传输方式是以单一行政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性结构，这就造成按照决策机关主观偏好收集加工处理信息，造成信息失真并成为许多错误决策的基础。毛泽东对“文革”前夕的形势作出那样严重的估计，原因之一在于这种信息传输结构向他提供了大量虚假、夸大的阶级斗争情况。(5)“文革”的发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和威望得以实现的，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是权力机构之间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的产物。(6)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体制，造成理论衰退和思想僵化，这种理论上的空白主要是靠以往的经验去填补的，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7)干部的等级任命制削弱了人民对“公仆”的监督；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存在，成为特权、官僚主义、家长制等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党内民主生活的薄弱使党内的分歧成为党内外动荡的根源；加之缺乏法制观念和以法治国的相应措施，从而使“文革”的发生成为可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是“文革”发生的经济根源。其依据是：(1)“文革”的序幕之所以从批判《海瑞罢官》揭开，是因牵扯到庐山会议的“罢官”问题，而“罢官”是因对“大跃进”的分歧及错误处理所致的。(2)“文革”的重点是“炮打司令部”，整“走资派”，无非是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冒犯了“又大又公又统”的模式。(3)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模式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为“文

革”的重要因素——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社会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

第四种观点认为，对改革的误解和抵触，是“文革”得以发生的一个因素。其理由是：(1)苏共领导的种种背信弃义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斗争中我们难于冷静、深入地认识当代国际共运的另外一面，即正在缓慢而艰难地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改革。六十年代中苏论战转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后，发生了更“左”的观点，把社会主义改革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相联系。(2)我们党刚刚从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走过来，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知人论事。(3)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历由革命到建设的转折，然后间隔一段时间后提出改革的任务。我国是两个任务(转折)同时产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客观程度，难以深刻理解改革的实践，仍从原有模式，过时的结论和经验，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出发，很容易把改革看成是一种倒退。产生这个错误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加速了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毛泽东要在中国寻找一条反修防修的道路，“文革”就是这一思索的结果。

第五种观点认为，过时的固定观念是“文革”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其理由是：(1)“斗争哲学”是“文革”酝酿发动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和精神准备。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发生许多过火、极端的做法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哲学的指导。(2)“穷则革命富则修”的忧虑，是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严重估计的一个重要原因，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直接来源。(3)被绝对化了的“反作用”思想，实质上就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停顿地进行阶级斗争，以为这是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强

大动力，这是“文革”发生的认识论根源 之一。(4)“大体平均、略有区别”是毛泽东倡导和憧憬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而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物质利益原则中的“修正主义”思想，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国将出现修正主义的危机感，并由此决心发动“文革”。

第六种观点认为，“文革”所以会发生，除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1)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2)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并且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曾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又未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得以滋长，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革”的发动和发展。(4)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所犯错误以及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不健全的利用，也是“文革”发

动并持续10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